

# 目 录

- 德王出走定远营后的一些活动情况……………段塔拉騰岱 ( 1 )
- 回忆三十年代阿拉善旗的社会状况……………魏文锦 ( 6 )
- 概述国民党政府对原阿拉善旗的统治……………成 涛 ( 49 )
- 我们所知道的达理札雅先生
- ……………辛文秀 布音孟柯 玛希巴图 ( 81 )
- 阿拉善旗女子小学建校简史……………朝格图 ( 101 )
- 阿拉善旗保安队沿革……………罗阿日斯楞 魏钟文 ( 109 )
- 阿拉善旗人民在解放初期的对敌斗争……………杨永忠 ( 145 )
- 补** 百灵庙…………… ( 169 )
- 白** 乌兰布和沙漠的汉代屯垦区…………… ( 108 )
- 内蒙古各盟名称解释…………… ( 99 )
- 乌滂守备队…………… ( 80 )

# 德王出走定远营后的一些活动情况

段塔拉騰岱

## (一) 北上与李守信会合

一九四九年九月，兰州已获解放，银川很快也要解放了。在这种形势下，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一手拼凑的所谓“蒙古自治政府”已在定远营（阿拉善旗旗府所在地）站立不住了。德王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将“蒙古自治政府”临时迁往阿拉善旗北部的图克木庙。他令其手下的八十余名军政人员，用七十峰骆驼驮上帐篷、粮食等物品，先期到图克木庙扎营。随后，德王本人于1949年9月20日，带上随从图们德勒格尔、吉利占太等出走定远营，直奔图克木庙而去。

这时，原驻宁夏陶乐县的德王旧部李守信、苏和巴特尔等率部（新一旅）东绕鄂托克旗，西渡黄河，北经磴口县，窜入阿拉善旗境内的克布尔、哈鲁乃巴格一带，不久，开往图克木庙与德王会合。途中，他们边走边抢，对沿途牧民群众造成很大祸害。此外，察哈尔、苏尼特一带数旗叛军及逃亡的旧官吏、宗教上层裹胁部分牧民，经中公旗也相继窜至图克木庙，与德王合为一股。

## (二) “西进计划”与对边民的抢劫

以上三股势力在图克木庙合为一处后，经商议决定，继续打

着“蒙古自治政府”的旗号，就地整顿军政组织机构，并具体拟定了经额济纳旗进入青海的“西进计划”。

1949年10月份，德王、李守信匪部由图克木庙向西北方向进发。他们途经沙尔扎庙、巴音高勒、苏洪图等地，辗转月余，于同年11月末窜抵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拐子湖一带。

德王率领的这批乌合之众，沿途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污妇女，使阿拉善旗北部的图克木、红古尔玉林、巴音诺尔公、东、西沙尔扎、拐子湖等巴格的牧民群众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他们匪性大发作，一路且行且止，见什么抢什么，从牧民的骆驼、马、牛、羊和衣物、帐篷、钱财乃至妇女首饰等，都要洗劫一空，就连锅碗家什，供佛之用小铜盏也不放过。不计他们上千人宰杀吃掉的牲畜，只带进拐子湖的牧民骆驼就达两千多峰。

### （三）在拐子湖被围困

德、李匪部的骚扰和抢掠活动，给阿拉善旗边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当时，我在北部防卡任队长，驻守北部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组织民防队，进行武装警戒和布防，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组织边民搬迁，以躲避德、李匪部的侵扰。不久，旗政府对抗击德、李匪部的斗争作出了具体指示，指示要求我们扩充军队，积极布防，保护边民。同时，还拨给一部分武器弹药。我们扩充军队后，将德、李匪部挤至拐子湖，加以围困。接着，旗政府委派旗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罗瑞光）、左甲木英敖迪布二人负责北部前线的防务。其任务是力争争取德王投诚，争取不成，就用旗保安队继续加以围困，迫使其就范。

## (四) 进行谈判

德王在拐子湖被围困后，进退两难，其处境十分不妙。为了争取德王，罗曹格图盖立勒派段巴特尔与德王联系，德王便派王亲扎布等数人前去与罗曹格图盖立勒接洽派代表进行谈判的时间、地点等问题。罗曹格图盖立勒则按搞定的时间，派甲木英敖迪布和段塔拉腾岱前往德王住地，与德王、苏和巴特尔、吉利占太、塔拉巴等进行了谈判。

谈判中，甲木英敖迪布等先谈了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情况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并向他们转达了宁夏省领导要他们及早投诚，归向人民的诚恳希望。同时，还向他们讲清了利害关系，指出，现正值寒冬季节，你们这么多的人，既没有吃的，又没有住处，靠抢掠牧民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听从共产党的劝告，弃暗投明，早日投诚，才是唯一出路。对此，德王回答说：“我们只是为了蒙古民族的事业，才这样苦斗着，又不是当土匪混日子。现在就是给牧民带来一些困难，哪有什么呢？”“阿拉善旗的所谓和平解放，只不过是从一个火坑里跳到另一个火坑里的事而已，这对达理扎雅王爷和阿拉善旗百姓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真的要投降，也只向他们的老子投降，决不会向他们投降的”。

在这次谈判中，因德王坚持顽固立场，劝降未成，只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协议：

1、德王答应管束其部下，不再抢掠附近牧民，禁止骚扰活动。

2、德王同意派吉利占太、陶布新赴定远营进一步谈判；阿拉善旗方面保证其代表在十五天之内返回住地。

3、双方一致同意，德王与罗曹格图盖立勒二人继续保持联络；德王率部迁至拐子湖纵深地带过冬。

这次谈判结束后，于1949年11月末，德、李匪部在拐子湖纵深地带驻下，在罗曹格图盖立勒、段塔拉腾岱和杨艾立肯木（杨富存）等部的监视和围困下，再未敢出来四处抢东西。

## （五） 德王赴蒙经过

1950年3月初，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派人向德王提出，希望与德王进行会晤。当时，德王接受了蒙方的建议。然后，双方商定了会晤的时间、地点。

德王来阿拉善旗后，首次与蒙方人员接触是1949年3月份的事。当时，蒙方派丹巴仁钦来到阿拉善旗北部防卡，要我提供德王来阿拉善旗搞“蒙古自治”的活动情况，并约定在三十日到查干陶勒盖边防站（蒙方的）碰头。我按约定的时间到查干陶勒盖边防站，向蒙方的官布提供了德王来阿拉善后的一些活动情况。随后官布拿出两封信交给了我，他说，一封是蒙方致德王的公函，一封是德王长子都嘎尔苏隆写给其父的信。望你带回去交给德王本人。此外，还交给了蒙方赠送德王的缎子、哈达等礼品及德王长子的一条哈达，要段一并交给。

我返回定远营后，就将蒙方的两封信及礼品亲手交给了德王。当即，德王写了两封复信，仍通过我交给了蒙方。

1949年9月中旬，蒙方的巴图吉尔嘎朗来找我，说要前往定远营面见德王，有要事相洽。当我将巴图吉尔嘎朗带回定远营时，适逢德王准备北上图克木庙。德王便对我说：“在定远营不便见面，希你告知来人，明日在草地等我。”德王于9月20日出走定远营后，在定远营西北方向的乌兰陶力盖与巴图吉尔嘎朗会晤。

巴图吉尔嘎朗对德王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正在蒙古边境上等候，希你即行前往会晤。德王答道，我到图克木庙后，就

派人前去。当时，双方约定了在中公旗的巴彦陕丹庙会晤的日期。后来，蒙方改变了会晤地点，通知德王前去哈拉敖包赴约。当德王、李守信、苏和巴特尔、敖门巴特尔等，由萨嘎拉团长率领的百余人护送下赶到哈拉敖包时，蒙方再次变更了会晤地点。他们对德王说，这里不便会晤，请到我们准备好的地方去吧。德王见此状况，只好表示同意。他便对萨嘎拉团长安顿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们于第七天上返回这里”。说完就随蒙方人员向蒙方境内走去。

### （六） 德、李残部缴械投诚

德王、李守信等赴蒙后，萨嘎拉率部在边境等候了近一个月。他们见德王一行仍不回来，便跑回拐子湖对众人喊道：“德王回不来了，现在各奔前程吧！”随即，萨嘎拉率百余人向西窜去。葛瓦拉希（团长）也率百余人向东窜去，逃至乌兰察布盟后受阻，就向当地解放军投降了。

这时，留在拐子湖的千余名德、李残部，在孙明海、吉尔嘎朗等军官的率领下，就地缴械投诚，后于1950年3月被送到定远营。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些人作了妥善安置。对于愿当民者，准其在雅布赖、巴音诺尔公等巴格安家落户。

我本人作为上述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历史情况。如有不妥之处，请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予以指正。

（额尔敦仓 译 朝格图 校）

# 回忆三十年代阿拉善旗的 社会状况

魏文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阿拉善和硕特旗（简称阿拉善旗或阿旗）历史上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旧中国国内四分五裂，民族灾难极为深重。达理札雅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继位执旗政的。本文重点记述从达理札雅继位起，他和德王亲善招来日本特务机关及宁夏省马鸿逵用武力突袭定远营的历史事件。为了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必须从当时阿旗的政治环境说起。

我家世属“老四爷”（达理札雅的祖父辈）的哈拉雅图（百姓），居住沙尔布拉都巴格（紫泥湖，今锡林高勒）。自我曾祖玛呢巴德尔在老四爷府内当差，在定远营（今巴彦浩特）赐给土地房屋开始定居。老四爷府在定远营西花园（今园艺场），宫殿式建筑与老府不相上下。四爷的御花园（以前叫“四合园”，也在今园艺场内）内有花亭数处，林木茂盛，中凿一池名曰“如意塘”，贺兰山麓泉水自府外流入四合园直至府内（最早的王府也在西花园，历史上因“回回造反”被烧毁）。四爷府及其花园水池与城内王府、寺庙遥遥相对，各族民舍错落其间，成一整体。三股泉水自东向西流经市区，在市区内架设三座桥。自城门以至南梁贯穿南北的一条大街，与三道河沟构成“王”字形，城墙及城内有一山组成“皇”字形，据说这是阿旗的风水所在。所有布局紧凑，风景秀丽，故定远营素有“小北京”之称。

我的祖父那拉玛、伯父吉布呼冷、父亲乌最司格冷（汉名魏崇德）都相继在老四爷府内当差。我幼时在任老先生的私塾中念了五年书，后来有了新式学校又入校念书。在我十四岁时，达理札雅回旗袭爵，从那时起我就在王府内当小戈什哈（侍从），陪伴达的格格（满语小姐之意）们玩耍，并干一些家庭零星小事。后来来到外地读书，回旗后在旗政府任职，一直追随达理札雅，为阿旗效劳。对于达理札雅的家室生活和政治经历及生平遭遇都知其底细。本文内容为亲历目睹，乃就记忆所及把当时所见所闻详尽记述，俾供各方人士收集史料之参考。

## 一、达理札雅继位

阿拉善和硕特旗辖属于清朝中央理藩院，到了民国以后，阿旗又直属于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旗王塔旺布理甲拉一直住在北平“罗王府”（罗王是第三代旗王，阿旗贵族都姓罗始于此），旗政由历任协理主持。这是清政府遗留的制度（旗王驻京，生活贡奉由本旗负担，协理在旗总揽军政事务），民国时期相沿未变。塔王于一九三一年在北京病逝。不久塔王的次子达都拉旺希格也因骑摩托车肇事身亡，儿媳（次子之妻）为夫表节自杀。王位应由塔王的长子达理札雅承袭。塔王逝世不久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下文准达理札雅袭王位。按惯例袭爵大典必须回旗举行，同时塔王及二爷夫妇的灵柩也必须运回本旗祖陵内安葬。袭爵大典因服孝期间不能举行，俟三年孝满在旗内庆贺，因此只是在北京府内举行了小型的简单仪式。一九三二年“太福晋”（达母）主领达理札雅及全家人等由北京起灵回旗。事先，阿旗政府重新整修了定远营城内王府，又派协理罗巴音都龙率领数十名戈什哈前往北京迎接。北京至包头一段是乘专列火车，包头至定远营则动员全旗组织了庞大的骆驼队和骆驼轿、马轿，分别驮运灵柩和达



理札雅全家老幼及男女侍从人员。抵定远营后，尚不能先回王府，而是住在距定远营十里之遥的扎哈乌素，待选择“黄道吉日”先行安葬死者，按旧例一切应有仪式处理完毕，方得回府安居，然后再择吉日举行袭爵庆贺。

为了迎接老王灵柩及新王归来，在扎哈乌素下了七、八顶蒙古包、二十多顶帐篷。前来欢迎的蒙、汉、回各族居民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盛况可与那达慕大会相比。安葬那天灵柩，用六十四人抬的大杠由扎哈乌素一直抬到老陵滩陵园。棺木外面有棺罩，围子是黄缎子绣有龙凤，抬杠者是青年壮工，沿途不能歇缓，纸人、纸马、牛、羊、车、驼及各种纸幡应有尽有，仪仗和差役人等数以百计，均身披重孝，浩浩荡荡拥护前进，自日出至日落整整一天才结束了葬礼。太福晋率达理札雅全家老幼始回城内王府安居，至于当日及此后若干天内召请大批喇嘛、和尚诵经超度亡灵更乃礼仪之须，不消细说。

老王已经安葬，小王必须迅速登基安抚人心。王府大门内是一幢五间大庭，匾额上是“迎恩堂”三个大金字，这是清代王爷迎接皇帝圣旨的地方，“迎恩”即迎接皇恩浩荡的意思。迎恩堂东侧是“回事处”，西侧是“典仪处”，平时每逢农历年节或其他大典，王爷和福晋（夫人）要在堂内升座接受臣民的大礼参拜。但是应该指明，达理札雅回旗已是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而清代皇封的王爵仍得世袭，袭爵大典依旧沿用清代的礼仪，似乎不合“民国”体制，然而无人提出异议。南京国民政府居然默认这一事实。这次大典虽因服孝期间不能举行全旗性的隆重庆贺，所用的仪仗依然有伞、棍、旗、牌、金、瓜、斧、钺、节、扇等。达理札雅头戴紫宝石顶帽、三眼花翎，身穿马蹄袖绣金蟒袍，足登朝靴；福晋则着阿旗蒙族服装，身穿长袍坎肩儿，头戴两颗珊瑚珠，两条辫子用缎子辫套套着通过坎肩垂挂在胸两侧，珊瑚珠前面戴着用五光十色的宝石镶嵌着的帽结子，足登薄底优

质皮靴。夫妇双双先到大佛堂(即王府的上屋)向列祖列宗行礼,然后至迎恩堂登上宝座,接受群臣的“三跪九叩”拜贺,全部仪式过程庄严肃穆、气势非凡。

达理札雅袭爵后,于第二年(一九三三年)全家又回了北平,旗政由老协理罗巴音都楞、副协理罗恩凯巴图、老管旗章京和尚满吉、副章京图布吉日嘎拉、齐吉兰泰、那筭达来主持。一九三四年达理札雅第二次回旗亲政,将老协理章京准长假请退,起用了年轻的罗恩凯巴图为协理兼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兼任保安总队参谋长,陈爱尔德呢巴图为管旗章京,段巴特尔为副章京。此数人均均为达理札雅袭爵后起用的重要辅弼,是有功于王室的忠贞不二之臣。

早在一九二八年老王塔旺布里甲拉在世时,阿旗发生了著名的“小三爷”事件。贵族(台吉)小三爷德毅忱勾通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为西北军将领),以“革命”和“民主”为号召,在阿旗领导武装暴动,推翻了王权统治,占领定远营,成立“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建立了新政权。阿旗保王派军民则包围定远营,坚决要复辟王室。门致中第一次派军一个营(营长姓彭)支援小三爷,被阿旗南部保王军指挥官毛巴特尔、范布尔古德、罗恩凯巴图率领的蒙古兵击溃歼灭。第二次又派苏雨生旅由贺兰山镇木关进入定远营,始解除了保王军的包围,稳住了小三爷的政权。罗恩凯巴图鉴于保王军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即前往北京向塔王报告(当时塔王在北京遥控局势),塔王亲自率次子达都拉旺希格、罗恩凯巴图、马宾等一同前往东北,向东北军张作霖求援(塔与张素有交往)。张支援了三八式步枪五百支、重机枪两挺,交罗恩凯巴图立即运回阿旗武装保王军,终于击溃苏雨生旅,推翻了小三爷政权,恢复了王权统治。罗恩凯巴图为王室立大功。罗祖上七代均任协理,在阿旗贵族中(台吉)与王室较系近支,此次又保王有功,故达理札雅袭王后,首先委任罗恩凯巴图为副协理兼

保安队队长，不久即晋升为正协理。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由外蒙回到五原，率部途经宁夏前往河南，为便利军需运输，在阿旗磴口巴格设立兵站（后来交宁夏改为县治），并向阿旗派交骆驼七千峰，委任军官姚连帮率军（约一个营）坐镇定远营监督旗政府积极催办。在小三爷事变中姚连帮奉命武装支持小三爷。贵族罗那木吉勒（罗巴图孟柯之父）、罗达喜道尔吉均系旗府的协理，都是当时维护旧政权的主要人物。在一次赴姚连帮的宴会后，罗达喜道尔吉回家即死亡，罗那木吉勒不久亦死去。后来捕获的暴动方面第二旅旅长罗敖有供称罗确系姚连帮下毒害死。后小三爷失败逃亡北京被塔王发现，派罗巴图孟柯追捕，一直追至归绥（今呼市）缉拿归案。因罗巴图孟柯父子两代都对王室忠诚并立过功，其祖辈亦曾担任协理，故达理札雅委任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兼任保安总队参谋长。陈爱尔德呢巴图之父陈莽哈来原系旗政府管旗章京，是旧政权的忠实保卫者，在事变中被杀害。陈本人在事变中对王室有功，达理札雅即以陈爱尔德呢巴图继父职任管旗章京。协理和管旗章京乃王爷之下掌管军政大事的最高官职。达理札雅以三位年轻忠贞有功之臣作为自己的辅弼，改变了阿旗落后瘫痪的局面，王权巩固，民生乐业（小三爷事件的细详内幕在这里不一一记述）。

一九三四年达理札雅偕福晋金允诚及其格格们又由北平返旗，太福晋（达母）和三爷（达之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则仍留北平王府居住，这时小三爷事件造成的混乱局面已被廓清，旗政府主要人物均已替换，上层班子更为年轻，全旗形势安定，达理札雅过着尊荣闲适的贵族生活。王府内的戈什哈都经过挑选，多数为精壮驯服的年轻人，总共有六、七十人之多，侍女、保姆之类有二十人左右。当时达理札雅有四个格格，长者只有十一、二岁，因府内全为成年人，缺少童年人陪伴，颇感枯寂，因而将老戈什哈的子女挑选七、八人进府当小戈什哈，计男的有张宏达、张元

谢、王励德、魏文锦、徐明珍等；女的有徐玉珍、杨风英、喜儿、魏玉霞等，都为十四、五岁的少年。当时能经常出入王府，在王爷福晋跟前当差被视为是件非同小可十分光荣的事，也是王爷的恩赐，照例由我们的父辈带领向王爷福晋叩头谢恩。我们的任务是成天陪伴格格们在府内游戏玩耍，中午在府内吃饭，王爷福晋一家人吃完后我们就和值班的戈什哈老妘妘们一起吃。有时王爷福晋有些零星小事也指使我们小戈什哈去干，但不经常，因为许多大戈什哈在随时听候差使，用不着我们小的。

达理札雅喜爱狼狗，由北京带回一条母狼狗，起名“宁格尔”，来旗后又生下两条小狼狗，起名“古力”和“嘎力”。狼狗性格喜动，活泼、顽皮，不是这里啃就是那里咬。那时府内听差的戈什哈逢年过节都带顶帽，穿袍褂鞋子，夜间戈什哈值班在王府住宿、睡觉时脱下的衣帽往往于第二天早上不翼而飞，原来狼狗给叼走了，有时狼狗叼住帽带一甩，把顶帽扣到头上满屋乱跑。戈什哈找不到帽子恐王爷喊叫急得团团转，可是王爷福晋和格格们见了反而开心大笑。有时狼狗把鞋叼走寻不到，还得回家另找鞋穿。我们小戈什哈每天要为狼狗洗澡，有时还要牵到大街上遛一趟。狼狗洗澡时，有时王爷来了，狗表示为对主人亲热，就跳跃着向王爷身上乱扒，泥水溅满衣襟，达王也不在意，回屋换一件衣服完事。

王府内东院养有一二百只鸽子，都是从北京运来的，有红的、白的、黑的，花色品种很多，专门有个姓焦的喂养，每天早晨要放在天空中飞翔，带有哨子，发出悦耳的哨音，王爷福晋每天都要来东院看鸽子作为消遣。因为王爷福晋身份高贵，不能随意出门上街，处理旗政也是协理、章京亲到王府请示，大事由王爷裁决，小事则由旗政府各主事人员自行处理，由协理总揽其成。那时政简事少，须由王爷亲自裁处的事情不多，达理札雅除偶而会客外，无事可做，就只有玩狗、看鸽子、骑马打枪作为日

常消遣。

达王最爱马，也善于骑马，王府内养有二、三十匹骏马，王府东面有上下两个马厩，设有“达木勒”数人专门负责养马。张倚就是达王的养马专职“达木勒”，还由一名从北京带来的养马、驯马的“马倌”（技师）叫文松波，专门为达理札雅调理走马。达王每星期日要去郊外骑走马奔跑几十里已成惯例，不论冬夏，五六点钟起床，吃完早点，带上戈什哈，骑上他那二三十匹走马，前呼后拥出城而去。随从人员都带有长短枪支、望远镜、照像机等。贺兰山麓或沙漠边缘丛生灌木中常有野兔、野鸡、黄羊等野生动物，骑马打猎就更为有趣，往往是满载而归。每次骑马均在上午十时左右回府。

达很爱玩枪，什么双筒鸟枪、单筒鸟枪、各种步枪如日本的三八式、苏联的水连珠、德国的套筒应有尽有，特别是手枪更为讲究，各式枪支共几十种。新的多了，旧的就卖给他的随从人员。后来国民党高级官员会见他都要送他一把手枪，如蒋介石、戴笠、朱绍良、张学良都曾送过他漂亮的手枪。

达王还擅长照相，他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机，型号有六寸照相机、有120的、有135的，牌号有当时德国最高级的来卡、彩色康太克司等。此外达王还喜欢钟表，有各种怀表、手表数十块，经常取出来独自欣赏。他有个特殊性格，凡是心爱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使用，珍藏起来，只供自己观赏或供客人看稀罕，以示阔气，沾沾自喜。

达王的穿着也是很讲究的，满清的顶戴袍褂整套齐全，民国的军装马靴、长袍、马褂，以至西装革履无不具备，而且都是优质美观，经过认真选择十分考究的上品。

吃的方面设有大厨房，专由北京带来邢雨亭、高松亭两名高级厨师，阿旗当地厨师则有薛五七等四人，每日三餐，按规定每餐十六个菜，主食有大米饭、花卷、面条、大米稀饭，烩米米粥

（把米炒黄易消化）等。这些饭菜吃否不一定，但每餐必备。另有小灶专做达王喜欢的可口饭菜，主持人是王妈（张根敦之妻），大家都称她王大大（北京人称伯母为大大）。张宏达的父亲张九爷（张根敦又称张九爷）是达幼年时的侍从（戈什哈），达当面称他为“老戈”，以示亲昵尊敬之意。

达王本人读书不多，文化程度乃属一般，但颇有教养，讲究排场礼节，善于交际应对，谈吐文雅，态度稳重大方，自幼在北京长大，见识到大都会的生活，接触的达官贵人，崇尚外国新式用品。回旗袭王后深感蒙旗没有学校，文化落后，乃蒙古民族衰弱之根源，要复兴民族必须首先兴办教育，因而于一九三四年秋在定运营成立了第一所小学校。开始学生只有十余人，是王府和旗政府职员子弟，由旗政府抽调一名台吉（贵族）道尔吉僧格任教师。因他识汉字不多，暂时只教蒙文。没有课本，只得教念蒙文佛经——阿拉善桑（佛经名称），但不久即建成完全小学校读汉文，派阿旗的“北公爷”塔旺策林任校长，前旗府秘书长于来堂之子于培根任教导主任，胡湘洲、叶庄之、王枕华任教员，学生也增加到六、七十人。三七年还成立了女子小学校，由达王的福晋金允诚任校长，教员由金慕然、杨秀梅、金凤臣、王志英、聂正举等，学生约有二十名左右，包括达的女儿，旗府官员的女儿，也有少数仕绅的女儿。学生的课本是由北京买来的。为了方便，由北京聘来印刷工人田子扬在定运营开设一所石印局，为学校印刷练习本，描红方格、蒙文课本等（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汉文课本译成蒙文），同时也解决了旗政府公文文件的印刷问题。小学开办后即有五年级，学生有魏文锦、张宏达、王福宝、吴登弟、刘卓元等五人（因这五人都读过私塾），这五人是阿旗有史以来第一次成立新式完全小学的第一期毕业生。

达理札雅回旗袭职后，除政治方面起用两位年轻章京，励精

图治百废复兴外，军事方面成立“区防司令部”，下设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四大处，达自任司令，把原来的亲兵马队改编为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下设八个大队，补充了武器弹药，改换了服装。又从外地聘请了年轻军事人员陈匡、李子元、叶庄之为军事教官进行军事训练。自此达理札雅在阿旗长期定居，逐渐建立威信，王位巩固、境内安谧，民生乐业、盗贼不兴。

## 二 德王的蒙古自治运动对阿旗的影响

三十年代旧中国国内敌对势力错综复杂，军阀政客勾结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国民大众惶惶不可终日。地处西北边陲的阿拉善旗并非“世外桃源”，刚始袭爵的达王自己也不可能永远安于悠闲舒适的贵族生活，满清皇朝早被推翻，民国政局混乱不定，他既没有可资依赖的政治靠山，也很少与外部联系足为援助。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之父马福祥与达理札雅之父塔旺布理甲拉早年在北平时曾为“换贴弟兄”，故达理札雅与马鸿逵青年相识亦为“兄弟”，但马鸿逵自任省主席以来，以阿旗地处宁夏省辖境内，区域辽阔物产丰富，即有吞并之野心。达理札雅自回旗主政之初也有所觉察，故二人虽系“世谊”却是貌合神离，互不相让，此后省旗齟齬时有发生，矛盾日趋尖锐。马无时不思有意制服达，达亦时刻在防范马，颇思取得外援以抗马。但年轻的达理札雅只在北平时曾结识东北的张学良，且仅系青年“公子”吃喝玩乐的“知友”，却非政治上亲密合作的伙伴。虽然“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驻防陕西期间，一九三五年农历十月一日，张学良由北平乘飞机去西安，特经定远营上空飞过，飞得很低，给达扔下一信，也只是旧情往来，尚无具体政治联系。此外达理札雅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素无接触，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对达亦并不



了解，因而当年“初出茅庐”的达理札雅，政治上尚茫无适从，缺乏“外交”，孤立寡助。恰在此时，察哈尔西苏尼特旗札萨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于一九三二年开始奔走蒙古自治运动，一九三四年与达理札雅拉上关系。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盟旗相继沦陷，许多蒙旗上层分子和部分青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支持和指挥下，于东北通辽一带发起所谓“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的运动，企图出卖民族利益充当帝国主义的傀儡。此时身为东西苏尼特旗札萨克的德王看到日本的“满蒙政策”是要并吞全蒙，占领东蒙以后必仍继续西侵，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谈虎色变，采取不抵抗的态度，自然也就无力顾及边远蒙旗的安全。乘此大好时机，如能联合各盟旗封建王公及其上层分子结成一个有组织的蒙旗力量，则可以巩固蒙旗对抗日本侵略保卫边疆为理由，与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而达到自己统一蒙古、建立“蒙古王国”的目的。于是在日本势力深入内蒙，东北蒙旗反动王公在日本扶持下高喊“自治”，国民党政府畏于日本的势力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德王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争取自治运动的领导权，于一九三二年前往北京组织了一个包括十余名盟旗代表的“蒙古王公代表团”，并推锡林郭勒盟东苏尼特旗达尔罕郡王郭尔卓尔扎布为团长，于是年冬前往南京“请愿”，要求蒙古自治，德王本人则不参加代表团，作为幕后操纵指挥划策者。随后具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德王在南京晋见了蒋介石表示了个人的“忠诚”，虽然当时未得到成功，但自此德王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为国民党政府所重视，打下了政治基础。即而奔走呼号，以复兴民族实行自治的神圣目标，得到许多蒙旗王公及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戴。国民党政府鉴于德王确有号召能力，为蒙古民族中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恐被日本帝国主义拉拢利用，终于接受德王的要求，准许蒙古实行“地方自治”，成立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



务委员会”，各盟旗王公（东北日本占领区蒙旗除外）均当为委员，由中央政府拨发自治经费，独立行施“自治权”，并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举行“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委员们宣誓就职，国民党政府特派大员亲临“监誓”，各省地方政府亦派代表前往观礼。这是三十年代蒙古历史上的一次“大团结”，也是蒙古历史上又一次实行“民族自治”，气象庄严，盛况空前。

蒙政会的成立也邀请了阿旗的达理札雅，达未亲自前往参加，派出旗政府参领陈那筭巴图（陈玉峰）和陶密希格二人代表阿旗参加了典礼，自此以后阿旗平静安谧的水面上击起了涟漪，达理札雅悠闲舒适的贵族生活也遭到破坏。后来德王派王枕华携带无线电台前来定远营驻旗联络，以致日本特务“光临”阿旗，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五师和马鸿宾八十一军张海禄团先后驻防阿旗，马鸿逵派军突袭定远营，达理札雅被扣银川转送兰州变向软禁，宁夏省在定远营设立办事处及军警联合稽查处，最后一九四九年德王来阿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等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使全旗各族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从而开始了阿旗历史的动乱时代。

### 三 德王派王枕华携带无线电台来阿旗 进行联络

达理札雅自一九三四年回旗定居亲政以后，虽然环境平静，生活闲适，而政治上尚无外部联系，无所归宿，茫无适从，急需开展“外交”活动，以寻求靠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德王蒙政会的成立，达理札雅派代表参加祝贺，则是他执政以来第一次的“外交”赏试，居然十分成功，德王对达理札雅的慨然合作十分重视。阿旗为亲王旗，疆域辽阔，并且地处内蒙西端，为国防要地，能得到阿旗的拥护合作，德王的声威就更加壮大，也可以得到

内蒙古掌握在他手下的印象，因此后来德王之所以成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双方争夺的对象，根据民族团结和同属王公贵族的立场，与德王拉上关系成为全蒙合作自治的一员，则可依为靠山，政治上有了出路，自是心安理得顺理成章之举，故德王与达理札雅之间虽系初次“合作”，却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彼此有利，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一拍即合。

不过阿旗与百灵庙相距遥远，交通阻塞，人员往来不便，为了互通信息加强联络，德王决定给阿旗无线电台一部，任王枕华（热河蒙族）为台长，徐增坤（现名徐厚田）为报务主任，胡辟、杨秀春为练习生，派往阿旗长驻定远营，而且要求阿旗派员前往百灵庙接运。为此一九三四年冬阿旗政府派梅林吉兰泰、筭布尔巴图二人率领差役数名，骑骆驼到百灵庙，将电台及所有工作人员一起接来。王枕华和电台的到来受到达理札雅的热情欢迎，待为上宾，王亦性情温顺，善于逢迎，对达必恭必敬，得到达的欢心，因而不久即成为达的亲信依为心腹，凡事言听计从。

德王派来的电台是50瓦特收发报机，以蓄电池供电，配备汽油发电机一部进行充电。电台地址在定远营城内头道巷西端路南陈玉峰房院内，首先与百灵庙取得联系，不久又与北平达穆林旺楚克建立了联系，宁夏的马鸿逵则因与达理札雅是世交兄弟，尤其省旗毗邻时有纠纷发生，为方便达马之间经常能直接对话，又与宁夏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后来班禅活佛由百灵庙途经阿旗留住数月后前往玉树（青海省），于是和阿旗也建立了经常的电讯联系。同时因达理札雅喜爱走马，青海是出马的地好方，故达与青海主席马步芳素有往来，此时也以电台通讯。此外与在西安的驻军中央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亦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上述各处通电都有专用密码，往来电报是由王枕华亲自译出交达理札雅阅后处理，与百灵庙还订有蒙文密码。

王枕华来阿旗之前因情况不明，能否站住脚开展工作尚难预

料，故将其家属暂留归绥（呼市），而来阿旗后很快得到达的亲信厚遇，公私关系都奠定了基础，可以长期住留，遂即准备去归绥接着。当时阿旗设立的学校正感课本缺乏，需在北京购买，达王过惯都市生活，也准备在王府内安装电灯（以前用的是煤油灯），器材也须在北京购买，此外为了促进阿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须在北京招雇一名石印工人来阿旗开设印刷局，解决印刷问题。达理札雅把上述各项任务交付王枕华办理，使王一面去北平为达办事，并向住在北平王府的太福晋请安及面禀家务诸事，一面回来时在归绥接着，前来定远营定居。一九三五年春王枕华启程去北平，买回一批课本教材，阿旗小学和女校才开了学，又采购了石印机，招来了石印工人田子扬在定远营开设一个石印局，解决了阿旗的印刷空白问题。王的妻子杨秀梅来阿旗后即充任了女校教员，王本人也兼任了阿旗小学教员。王府内安装了电灯，用汽油发电机充电，以电瓶蓄电。以上是王枕华来阿旗后为达理札雅和阿旗文化教育事业所办的第一件事。

无线电台成立后，达理札雅深感无线电通讯技术必须要有本旗“自己人”掌握才能运用自如，否则通讯不能自主，势必受制于人任摆布，于是选派阿旗青年罗艾立肯巴图（汉名罗锐麟）、张宏达、张元榭三人到电台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同时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又选派魏文锦、罗甲木苏去石印局跟田子扬学习石印技术。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在阿旗小学读书，只能利用早晚和星期日学习技术，后来只有学习无线电的三人学成参加了通讯工作，其余均未学成，小学毕业后即陆续外出升学，然后回旗派任其它军政工作。

总之自从王枕华来阿旗建立了无线电台，达理札雅的外部联系畅通无阻，政治上似乎有了目标信心，并得到王枕华的参赞和帮助，对内（阿旗内部）也大兴大革发愤图强。阿旗社会面貌大大改观，古老而封建落后的阿拉善旗开始接触新潮流（政治方面），

新文化（教育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四 班禅活佛莅临阿旗所起的作用

西藏的活佛班禅和达赖喇嘛同为中国喇嘛教鼻祖宗喀巴的两大弟子，班禅相传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是第九世（今为十世），自古以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日喀则，而全藏政治中心（政权）则在前藏，前后藏历来不和，历史上常有武装冲突发生，互有胜负。例如第六世达赖曾被迫出走到阿拉善旗流浪唵经，阿旗蒙民得知是达赖喇嘛，对其虔诚顶拜，奉为南寺至尊，后来未能返回西藏，园寂南寺制成“木乃伊”，就地筑一金塔（包金）接受香烟，直至“文革”期间始被拆除。一九二三年九世班禅又因前后藏发生冲突被逐离藏，流亡北平、东北、南京等地，欲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军武装护送回藏，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时无力满足班禅的愿望，达赖得英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支持，对国民政府采取对抗态度，班禅只得滞留内蒙。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在锡、乌两盟为班禅盖了庙，请班禅暂住唵经，等待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准备就绪后再行护送班禅回藏。德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籍重班禅在宗教上的威望笼络蒙古民心，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班禅则因得到德王的虔诚贡奉，也对德王怀有好感，赞助德王的蒙古自治事业。迨至一九三五年班禅与国民党政府议定，先到青海省玉树县居住。

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决定是由于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当时东北已经沦陷，日本势力深入到察、绥各地，已在囊囊内蒙，进而侵略华北，鲸吞全中国，诚恐班禅被日本帝国主义拉笼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2）德王的声势正在步步扩大蔓延，并与日本暗中接触往来，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与腐败无能的国民

党政府之间摇摆不定，同时蒙政会虽然已告成立，实行了蒙古“地方自治”，而在财政、税收及自治权限等方面，德王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发生了齟齬，有被日本拉走的可能，国民党政府自然不愿德王再对班禅进行控制，以免德王的威信膨胀更加难以制御；（3）班禅虽已离藏出走流亡，但在广大藏族群众中依然具有崇高无尚的宗教权威，虔诚信仰依然如故，国民党政府如能控制班禅，不但可以收拢藏族民心，而且对达赖控制的西藏政府成为一大威胁，对于解决西藏问题（使之归附国民党政府）可以发挥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4）地处青海南部边缘的玉树县是除达赖控制的前后藏和昌都地区（金沙江以西）以外的甘南、川边以及青海南部和西康金沙江以东广大藏族聚居区域的中心，且为宗教名地及入藏的交通枢纽，班禅移住玉树，即可削弱达赖在宗教上、政治上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又可促使这些地区的藏民以班禅为中心联成一片，对国民党政府增强信仰，在政治上依附国民党政府，稳定西南边疆；（5）国民党政府欲送班禅回藏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争取整个西藏内向（接受国民党的统治），玉树县接近达赖政府控制的昌都地区，班禅回藏较为方便。另外玉树县归青海省辖属，青海统治者马步芳亦思利用班禅在蒙藏民族中取得拥护，班禅驻在青海更可借马步芳的声势对达赖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及早达到回藏的愿望。综合上述，不但国民党政府以班禅移驻玉树可以脱离日本和德王的控制十分适宜，班禅本人也以驻在玉树能得到广大藏民的拥护和马步芳的欢迎，回藏较为方便。于是在国民党政府支持下，一九三四年冬班禅由百灵庙起程，途经伊盟鄂托克旗来阿拉善旗再赴青海，抵达宁夏后达理札雅派员前往欢迎，敦请班禅前来阿旗啐经，接受全旗蒙民的顶扎膜拜。

班禅一行共数百人，其中左右主事的堪布喇嘛二十余人，军乐队数十人，武装侍卫队一个营，以及无线电台、汽车队等，庄

严肃穆气势雄壮，浩浩荡荡来到定远营。阿旗以宗教最高礼节欢迎了班禅，自南梁坡、三道桥、二道桥、头道桥进城直到王府西阿斯门，全部街道都以黄土铺垫、清水泼洒，并因班禅是活佛，人间之尊，身份至高无上，不能由城门入城（因城门楼上有人走过），计划用砖茶摆上阶梯让班禅从城墙上面通过，后因没有那么多的砖茶未能做到而入城，下榻于王府的大上屋（达的佛堂），室内四壁全用黄缎围挂，地板上铺垫黄毯，庄严隆重非同凡响。此外班禅通过的街道上要“禁街”，不许任何人来往走动，为此旗府选派最能干最厉害的“达尔古”（头目）杨达布花藏吾执行铺街和禁街任务，杨奉命后雷厉风行，按户抓差很快把街铺好。当时定远营尚未见自行车，只有杨一人骑自行车执行任务，由于禁街彻底，杨达布花藏吾博得达理札雅的大加赞许。

班禅莅旗以后，全旗三十六个巴格的大部分蒙民，不分男女扶老携幼在数月内陆继来到定远营，向班禅叩头礼拜、敬献哈达及牛、羊、骆驼、元宝、银元等，有些老人病弱不能行动，甚至气息奄奄，也由家人亲属设法驮到定远营向班禅叩头，恳求班禅用手摸一下头顶，死后就可以上西天，认为是最幸福快乐的事。

给班禅叩头时，班禅坐在城内延福寺大殿内的宝座上，叩头的人们则一个跟在一个后面，横贯而入，按次序到班禅面前跪下叩头，班禅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摸一下，并赐一条红线绳戴在脖子上。跟随达理札雅前去叩头的官员，戈什哈则是一条红缎条，这叫“藏嘎”，系由班禅念了经的，中间结有一个结子，据说戴在人身上能消灾免罪长命百岁万事如意，死后因有红线在身牵引可入天堂，也能保六畜兴旺。旗民给班禅叩头必须经过旗政府这一关，记得每人得给旗政府交一枚银元方可到班禅面前叩头，旗政府将收得的三万多银元献上班禅带走。班禅在阿旗居住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为班禅建立了“西陲宣化使公署”，并加尊号为“西陲宣化使圆觉大师”。



当年过春节，达王府内晚上点的是汽灯或煤油灯（此时尚未安电灯），从北平运来的火酒（即酒精）作为燃料，由一名老戈什哈魏光瑞专职负责点汽灯，擦煤油灯罩。正月初某日下午四时，魏照例要为汽灯加油（酒精），五加仑的酒精桶打开倒酒精，桶口不象现在的螺丝扣，而是个小圆孔，孔上盖一片比孔稍大一点的铁片，周围以锡焊封，焊口时要把焊烙铁烧红加锡融化。王府前上屋一进门地中央就是一个大火炉，魏就在炉边操作，本来烙铁不能烧得太红，否则就会着火，孰料他把烧红的烙铁往口上一放，因烙铁温度过高将酒料点燃，霎时酒精桶爆炸，将魏掀倒在门外，酒精扑满全身，其穿的是棉长袍，束着腰带，扯不开脱不下，成了一个火人，头上火苗高尺余，忍耐不住只得在院内乱跑，可能跑起来火苗向后面部好受一些，人们随后追赶不上，而且全身有火，无法抓扯，直到最后来的人很多才将魏按倒在地上把火扑灭，结果魏仅头顶戴帽部分尚稍完好，其余全身伤势严重。当时又无医院，只好在王府东院腾出一间房子，抬去抢救，经王爷的御医金风臣大夫精心医治，亲自护理，始得九死一生。

前上屋酒精桶爆炸，酒精喷上顶棚，很快将屋樑烧着，浓烟滚滚火势甚猛，火是从门口着起而门被封住，人们无法进入，窗户外面装有铁纱十分坚固，该找来工具将窗户打开。人们开始分头救火，一部分人提水（没有自来水，要从前院大厨房提水），一部分人要从城外往来运水，前上屋东半边是饭厅和会客厅，西半边是库房储有武器弹药，如将弹药点燃就更为严重，故另有一部分人须由窗户向外搬运武器弹药，幸好人手众多，经过三个多小时奋力搏斗，终于将火扑灭。火灭之后察看情况，火是从中间屋烧起的，按理屋内无风应是向东西两面同时延伸，然而说也奇怪，火只向东屋烧去，东屋的木樑烧去四分之三几乎塌下，而西屋则安然无恙，当时人们就说是因班禅在西院，只有一墙之隔，班禅听到火起，走出室外向前上屋诵经施法，所以火势只向东不向西。

并能很快得以扑灭（班禅之神威一时传为美谈）。火灭之后，达理札雅发给凡在场救火人员每人大洋一元，以示奖励，我也得到大洋一元。

是年（一九三五年）春班禅由阿旗起程前往青海塔尔寺，然后转往青海南边玉树县。和来时一样，走时仍是黄土垫街清水洒道，禁街清道隆重欢送。在西宁和玉树，国民党中央政府得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的支持，特派水利专家、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部长级大员赵守钰为“护送专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及青海省政府都派代表参加，为工作人员和侍卫人员，大张旗鼓摆出班禅即将回藏的声势，企图以此要胁达赖政府讨价还价（政治解决或军事解决），后班禅圆寂（逝世）青海玉树县，新班禅（即今十世）尚未出世（诞生），历史转入新的时期，斗争遂告一段落。

毫无疑问，班禅莅临阿旗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但表现在班禅与达理札雅建立了良好的感情联系（班禅曾赠送达理札雅新式福特小卧车一辆，达亦贡献走马若干匹），而是在阿旗蒙民中起到了团结同心的作用，尤其班禅以活佛至尊莅临阿旗是对刚始袭爵亲政的达理札雅的庇护，降赐福祉非同小可。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促进达理札雅与德王之间的亲密关系。班禅在锡、乌两盟居住数年，得德王的尊礼贡奉，自然对德王的事业同情赞助，此次莅临阿旗数月又得达理札雅的尊崇厚遇，这不但是达理札雅和德王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一致，也是两人政治立场上的一致，班禅在二人的关系上起到了媒介和促进作用，以致此时年轻而无政治靠山的达理札雅愈益倾心德王，响往德王的事业成功。班禅离阿旗后，在西宁和玉树居住期间，仍与德王和达理札雅三方电讯往来，阿旗与德王和班禅几乎每天通报一次，而且使用密码对外保密，由此可知三方自非宗教上和感情上的联系，而是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其中班禅所发挥的作用是很难估量的。



## 五 日本帝国主义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一九三四年春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拉上关系，成立了“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政府批发蒙政会经费、武器、汽车及无线电台等（德王派给阿旗的电台就是其中的一部），奠定了蒙政会的基础，使德王的蒙古自治事业迅速发展，势力强大，德王的个人声誉也大大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德王早已和日本帝国主义暗中进行勾结，此时日本扶持下的“满州国”已经建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满清发祥地满州（东北）重新复辟，蒙古王公的封地封爵原是清朝的赐与，王公贵族的封建思想自然是向往清代“盛世”，留恋清代的富贵尊荣，而反对汉族建立的“民国”制度，这对德王以及达理札雅等王公贵族来说是一个极大诱惑；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持其现代化洋枪洋炮、战车利舰，称雄东亚、睥睨全世界，“九·一八”事变一举侵占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畏之如虎，竟至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要求“国联”（当时的国际联盟）仲裁，美、英、法、苏等也对日本的凶焰无法遏制，任其横行无忌。此时的德王慑于日本势力不可抗拒，迫于日本的威胁利诱，竟也效尤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拉拢妥协，直到最后蒙政会与绥远省在财政税收问题上发生争执，德王与傅作义闹翻，遂以此为导火线，德王愤而抛弃国民党政府，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叛国投敌。先是于一九三六年一月间在西苏尼特旗王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兼政务部长，嗣于三月间进一步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索王府召开了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扩大反动组织，撤销蒙古军总司令部，于五月间在嘉卜寺（今化德县）另行成立“蒙古军政府”，仍由德王亲自总揽军政大权，操纵一切（抗日战争

期间又改组为“蒙疆自治政府”，设在张家口，直至日本投降为止），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是要灭亡全中国，而灭亡中国必须首先吞并满蒙，因而日、德（德王）勾结后，罪恶的魔掌迅速伸向所有的蒙旗。一九三六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也是德王协助）由百灵庙（这是日本侵略内蒙的重要据点）派出日本特务田中久信，由草地秘密潜来阿旗，这是阿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日本特务的足迹，非同小可，事先德王由无线电台与达理札雅取得联系并得到达的同意。当时达理札雅在政治上还是墙头草两面倒的态度，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立场。因为百灵庙方面的德王距离阿旗太远，中间有绥远省和河套地区相隔，如果明目张胆和百灵庙合作，诚恐惹恼国民党政府会遭到镇压，而且宁夏与阿旗毗连，被马鸿逵发觉也属不便。而拒绝日本人前来，又恐德王有日本帝国主义为后盾，将来统一了蒙古更难对付；此外达穆林旺楚克在北平和日本人也有所接触，北平与阿旗之间每天都有电讯联系。王枕华台长系由德王派来的联络人员，他的主张自然也是倾向百灵庙的。达理札雅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只得同意田中久信秘密前来阿旗。该田中久信到达阿旗之后，首先与达理札雅会面，达理札雅一面将田中久信安置在定远营祥泰隆商号内居住，另一面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电报请示如何处理，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卖国政府对于日本人在中国到处横行，却“无权”过问（当时居住中国的日本侨民及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侨民都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也不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对于达理札雅的电报并无具体指示，复电模棱两可，仅命达理札雅自行“相机应付”，这就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也使达理札雅的两面做法得以顺利施行。田中久信立足之后，即由王枕华的电台和百灵庙取得联系，每天都有电报往来。不几天即有日本飞机一架由嘉卜寺机场飞来定远营城东老陵滩投落，载来日本人、汉奸等约三十多人，在祥泰隆商号内正式成立了日本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名恒田六郎。

此后每天有一架飞机上午飞来、下午飞去。特务机关内设有无线电台，定远营那时没有发电厂，电台是用蓄电瓶以汽油发电机充电，架设了很高的天线，附近居民及来往行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发电机的隆隆声响人们也能听得见。日本特务机关自备电台以后即不再由王枕华的电台发报。不久日本人看准定远营西郊双山子下面的一块平地（今驼绒厂），要修筑正式飞机场，经旗政府同意并代招雇民工迅速完成（稍事平整作出标记工程不大），从此每天来机即由此新机场降落。飞机除载人外还运汽油及汽车部件轮胎等，准备在阿旗装配汽车（后未来得及即被赶走）。

日本在阿旗成立特务机关不久，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头目板垣（中将级）由嘉卜寺飞抵定远营视察特务机关的工作。板垣是上午十时飞抵定远营，因事先即有联系，达理札雅派亲信副官张元忻前往机场迎接。当时阿旗未派汽车，是用走马将板垣接到王府前上屋与达理札雅会谈的，会谈的内容主要是日本特务机关要在定远营长期驻留，逐渐扩大，并要求达理札雅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内（投靠日本），与德王合作，亲善日本，接受日本的“保护”。当时达理札雅考虑到，阿旗的地理环境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直接受到宁夏的控制，与日本势力控制的百灵庙相距遥远，同时全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不敢立即答应板垣的要求，公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先将板垣来阿旗一事通知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宁夏的马鸿逵请示对策，而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仍然采取放任主义，仅派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柏石前来阿旗，与达理札雅共同会见板垣，企图以“亲善”的姿态与板垣妥协敷衍了事。板垣在会谈中鉴于达理札雅对问题不作肯定具体答复，模棱两可，十分不满，大发脾气，并施展野蛮手段对达理札雅威胁，特别对刘柏石态度更蛮横之极，结果会见不欢而散，板垣遂去祥泰隆商号内日本特务机关会见他的部属，指示以后如何开展工作，对达理札雅进行控制。日本的“武士道”精

神在军队中非常严格，板垣在室内就座，特务机关的所有人员由特务机关长率领，在室外一路纵队排列，全体垂手九十度弯腰站立，等候点名晋见，叫一个进去一个（室内如何行礼听训，外人则不得而知），其神圣不可侵犯，比蒙古人晋见王爷活佛还要严重。会见完毕当日中午板垣在特务机关内吃饭，饭毕乘原机飞回嘉卜寺。

特务机关内有个叫龟野的日本人，搭乘宁夏省来阿旗办事官员的汽车前往银川与马鸿逵会晤。马鸿逵对日本人也是笑脸相迎，自不免热情招待一番，谈了些什么，事关机密外人无从得知，第二日仍将龟野送回定远营。可是随后不久即闻司机被马鸿逵下令枪毙，罪名是私将日本人载来宁夏，这位司机真乃冤哉乎也，天知道日本人龟野搭乘汽车是经乘坐该车的省方官员许可的（那时汽车司机地位卑下，官方汽车司机等同奴隶，哪有擅自载人的权利，更何况是日人呢）。很明显，马鸿逵的做法是“杀人灭口”，然而欲盖弥彰，即当时（抗日战争前夕）马鸿逵与日本人来来往往（不止这一次）也是人所共知的实事（虽不知其内容如何）。马鸿逵冤杀司机的目的是给国民党蒋介石看的，表明日本人在阿旗设立特务机关，那是达理札雅的事情，与我马鸿逵无关，我的司机把日本人拉来银川，我把日本人送走，司机枪毙，我马鸿逵是坚决抗日的。

马鸿逵的先辈马福祥是著名的北洋军阀，善于钻营拉拢，举凡满清遗老、蒙族王公、各省军阀政客、以及国民党蒋介石都能拉上关系，为民国史上历久不衰的风云人物。马鸿逵托其父的福，青年统兵，也曾戎马倥偬，在军阀乱战中纵横捭阖左右中国政局，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先是马鸿逵为冯玉祥的骁将，在蒋冯大战中，马和冯部其他两师长韩复榘、石友三勾结蒋介石临阵倒戈（俗称韩、石、马倒戈），致使冯玉祥一败涂地，从此马鸿逵得以青云直上，终于当上了宁夏省的主席，集全省的党政军大权

于一身，成了宁夏一方的“土皇帝”。不过马鸿逵与蒋介石虽系“世谊”（马福祥与蒋介石互称“兄弟”，蒋对马鸿逵又称“兄弟”），且在蒋、冯争雄中，马曾为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蒋马之间终非嫡系，依然同床异梦，蒋以马桀骜不驯朝秦暮楚后必为患，极思削弱或消灭马的势力；马亦以蒋为天下枭雄、反复无常，时刻防范警惕巩固自己的地盘，以免被蒋并吞。此为军阀之间复杂交错的矛盾斗争不足为怪，马鸿逵之所以表面服从中央（蒋介石）而暗中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接触，也是那时各省军阀为了保全势力，谋求自身生存的普遍现象。

此外阿旗与宁夏毗连，地广人稀物产丰富，马鸿逵为扩张地盘掠夺财源，对阿旗这块“宝地”久已垂涎，也是自然之理。故马鸿逵与达理札雅虽亦为亲密“世交”，而因利权所在生存所系，马与达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自从达理札雅回旗袭爵执旗政以来，省旗争执时有发生，马无时不思打击摧残达理札雅，达亦深知马鸿逵的野心，时刻警惕防范，双方都向国民党蒋介石告状。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年轻无知缺乏政治经验的达理札雅，与老奸巨猾的马鸿逵，所采取的作法虽然大不相同，虽然这是由于双方的政治环境、历史背景及势力强弱种种条件之不同所使然，但因此给了马鸿逵以可乘之机，以致最后阿旗遭到马鸿逵的武装蹂躏，则是达理札雅始料所不及的。

## 六 关麟征部进驻阿旗定远营

一九三六年冬，傅作义在绥远奋起抗日，十一月中旬一举击溃进犯绥东红格尔图之敌，接着即对敌人在绥远的战略要点百灵庙发起进攻，三百里雪夜长途奇袭，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全歼守敌，收复了百灵庙。此时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万众一心敌忾同仇，蒋介石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于十一月下旬下令调遣嫡系部

队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率部前来阿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二十五师到达定远营后，即行修筑军事工事，向飞机场采取了包围形势，限期迫令日本人全部撤出阿旗。当时驻在阿旗的日本人鉴于日本军队在百灵庙受挫，二十五师来势不善，甚为恐慌，尤其与日本人一起前来阿旗的汉奸、蒙奸，深恐遭到军队惩办（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中国政府对日本人还不敢扣捕，但对汉奸、蒙奸则可公开捕拿惩办），于关军到后第一次来飞机先行狼狈逃走。日本人每天来一架飞机载运特务机关的人员和物资，有时还来两架飞机转运，二十五师的期限是十二月上旬撤完，约在十二月七、八日人员已经撤清，剩下少量汽车轮胎、部件及一部分汽油，因限期已到未能运走，交由达理札雅接收。

蒋介石其精锐的嫡系部队二十五师前来阿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准备长期驻防阿旗的用意有两个方面：第一、防止阿旗与德王勾结引进日本势力深入西北边疆；第二，借机对宁夏的马鸿逵起到钳制的作用。盖因蒋介石一方面防备马鸿逵与日本勾结，与国民党政府离心，另一方面则恐马鸿逵并吞了阿旗，势力膨胀更难控制。所以“中央军”进驻阿旗，马鸿逵忧心忡忡，不但并吞阿旗的美梦破灭，而且在他的腹背多了一个钉子。然而中央军却是前来驱逐日本特务机关，切断达理札雅与蒙奸德王的联系，防止阿旗投敌，名正言顺，马鸿逵虽不称心，但也无可奈何。另一方面达理札雅对中央军的到来则是诚意欢迎；其一、不致得罪日本人和德王，赶走特务机关是中央军不是阿旗；其二、中央军驻防不须地方负担，军纪严明不骚扰百姓。例如某次该师士兵集体到澡堂洗澡（私人营业澡堂），听到集合号响穿衣时误将一条毛巾穿在衣内带走，澡堂人员向师部反映丢失一条毛巾，副师长杜聿明亲自检查，结果在一个士兵上衣内查出毛巾（士兵还不知道），为了显示中央纪律严明，集合全师士兵下令当场把该士兵立即枪毙，达理札雅闻讯亲向杜聿明说情竟毫无效果；其三、马鸿逵对阿旗虎



视耿耿，经常寻衅，直欲产除达理札雅而后快，有中央军驻旗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因而自该二十五师驻防阿旗未久，达理札雅与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都相处融洽，双方往还感情颇佳，关、杜两师长执行国民党政府对阿旗的政策——拉拢怀柔，赠送阿旗武器数百件，达理札雅也回赠两师长骏马数匹，这是达札雅第一次与国民党高级人员接触，印象极好，直到若干年后达还经常称颂关、杜两师长开明大度难能可贵。可惜事有凑巧，正在二十五师驱走日本特务机关后不数日，突然爆发“西安事变”，关麟征、杜聿明率部于十二月二十日夜悄然撤离阿旗开赴陕西营救蒋介石去了，天明后人们发觉中央军走了个净光，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十五师的撤走，对阿旗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征兆，尤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国民党政府手忙脚乱无暇他顾，中国的政局又呈动荡不定。达理札雅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以对抗马鸿逵的设想又告落空，此后处在宁夏马鸿逵的势力范围内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但对马鸿逵来说，中央军撤离阿旗则正中下怀，喜出望外，不但背后的钉子一旦拔除十分痛快，而且蒋介石被扣，南京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并吞阿旗的野心也可如愿以偿。于是机不可失，立即请示国民党政府，阿旗日本人虽被赶走，但不可无军队驻防，否则日本人还会重新返来，况达理札雅与德王仍有联系，后患难免，请调他的军队驻防阿旗以策安全。然而国民党政府考虑到，如果调派马鸿逵的军队驻防阿旗达理札雅势必坚决反对，弄得不好，达理札雅可能被迫立即投靠日本或德王反为不美，同时马鸿逵控制了阿旗如虎添翼，亦为中央政府所不欲，因而决定改派八十一军马鸿宾部的一个团开进阿旗定远营驻防。该团团长叫马赞良，后由张海禄继任，马鸿宾为人性情平和，与达理札雅欣然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决定；而马鸿逵阴谋的未能得逞则大失所望，只因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并未立即被处死，南京国民党政府扬言要对事变

“祸首”——“叛将”杨虎城、张学良进行“讨伐”，国内外各种势力则对事变进行调停，要求以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仍在全国发号施令，故马鸿逵虽感失望，而仍不敢轻举妄动，只得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张海禄团驻防定远营后，为了与宁夏通讯方便，银川和定远营同时成立了电话局，由马鸿逵派两名电话兵韩福钧、王殿英来定远营管理业务，名义上是为达理札雅与马鸿逵联络之用，实际则是军用电话。当时宁夏的电话均属马军统一管理，马鸿逵的用意仍在继续注视达理札雅的动向。盖因国民党政府对于宁夏省和阿旗的控制采取的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使旗省对立相互牵制以便分而治之的手法，这次拒绝马鸿逵的要求而改派马逵宾的张海禄团驻防阿旗，又是这一手法的具体应用，以致省旗之间更加相互猜疑，激烈的矛盾斗争从此开始。

## 七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阿旗定远营设军事专员办事处

绥远百灵庙大捷，全国民众抗日呼声高涨，要求惩办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才派二十五师前来阿旗驱走日本特务机关，接着西安事变爆发，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国内政治形势为之焕然一新。在新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为了安定后方巩固国防，对于宁夏省和阿拉善旗十分重视，于一九三七年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派驻阿拉善旗定远营军事专员办事处”（地址在定远营西关，今第五小学东），该办事处设少将专员一人郑子猷，另有校级秘书一人，科长二人，尉级副官数人，办事员若干人，武装警卫一个班，配备无线电台与南京联系，台长陶达三。其主要任务：第一、监视阿拉善旗与德王（包括日本）的联系；第二、监视阿拉善旗有无共产党活动和与外蒙



来往；第三、监视宁夏马鸿逵和日本人来往；第四、调和省旗纠纷。

可是郑子献到任后与达理札雅相处极不投机，原因是郑以中央所派大员自居，负有监督阿旗的责任，官架子十足，盛气凌人，对达颇不尊重。尤其认为达有勾结日本人行为，一切应该服从军事专员的节制支配，更为达所不能接受。达理札雅自认身为亲王，一旗之尊，骑马可上金銮殿皇帝也不在乎，军事专员不过是个少将，卑职小官微不足道，尤其阿旗地处西北边陲，国民党政府远在南京，鞭长莫及，对阿旗难以控制不足为惧，况日本人前来，阿旗曾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报告请示，遵照指令处理。随后二十五师来阿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阿旗亦曾表示拥护，不承认有勾结日本人行为，军事专员以中央势力欺人太甚，决不接受。因而郑与达互相顶牛，各不相让，关系极为恶劣。

定远营西关有个姓阎的小商人，山西人，经营磨房、醋房。阎的妻子李存存颇有姿色，与阎是老夫少妻，阎对她是一切顺从。李存存则不安分，任意结交男友公开来往，阎亦对之无可奈何。有一天该李存存忽到王府总管张仁家中，向张透露：军事专员郑子献教她说，南寺前面的馒头山上有神，远看有什么，近看有什么。原话是段顺口溜，说来活灵活现，内容大致是说馒头山上出现神灵，对阿拉善旗的祸福有关，旗王应该前去拜祭，以保平安云云。继而李存存密告张仁，郑子献的目的是赚王爷去南寺，军事专员办事处派人半路埋伏要把王爷打死。张总管听到此种情况，非同小可，立即禀报达理札雅，将李存存拘押于理事官厅（当时叫堆子即法院），派专人看管，饮食则给予优待。至于达理札雅与旗政府协理章京等主事官员怎样研究这一问题，作出什么决策，事关重大机密无从具体得知，但为时不久即将该李存存释放。李存存获释后，多次到军专处门口，扬言郑专员曾到她家住宿过，没有给钱，她来向郑专员要钱（这可能就是旗政府的

对策吧)。而如此当众宣扬，使郑专员颜面扫地无法立足，只得悄然离去。郑专员离职后，旗政府少不得向中央报告一番：中央派来的高级官员竟是这样的不肖之徒，阿旗实难为力（挽留），请求中央审查裁夺澄清。然而郑子献是个会说话的人，他怎能甘心受此侮辱，回南京后自己不免也要向军事委员会（全国最高统帅机关，蒋介石亲任委员长）陈述达理札雅如何反对中央，指示妓女到军专处门口闹事，目的在驱逐中央机关，以便和德王勾结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恶劣行径。年轻的达理札雅万没想到为了一时的快意，驱走军事专员虽属小事，而由此国民党政府种下了达理札雅反对中央图谋投敌（日本）的印象，也为马鸿逵向国民党政府进谗、挑拨离间制造了事实依据，这都是后来阿旗遭受军事蹂躏，达理札雅本人被俘软禁的重要前因和伏线。

郑子献走后，国民党政府再未派遣军事专员前来阿旗，军专处无形撤销，人员撤走，无线电台由马鸿逵派菊光记为台长接收，作为宁夏驻军通讯之用。

## 八 一九三七年阿拉善旗的乌热斯大会

阿拉善旗定远营老陵滩南面有一寺庙名雅尔庙（俗称雅雅庙），每年农历八月初一日举行一次庙会，每逢这个会日，由十五日起就开始由延福寺（城内大寺）喇嘛主持诵经拜佛，到八月初一举行跑马会（即那达慕会）。一般的跑马会只有定远营附近的几个巴格前来参加。善男信女向寺内布施，烧香叩拜，祈求佛爷保佑平安。初一那天举行跑马赛、摔跤比赛和跑马射箭，即挖一长百米、宽一米余、深八十公分的壕沟，沟左边设两个箭靶，一个悬空，一个放在土台上，沟右边一个箭靶也放在土台上，射箭手骑马在壕沟内疾驰，同时拉弓射箭，连中三箭者奖。这个庙会阿拉善旗的传统节日，参加者上自旗王、寺庙活佛、喇嘛，

下至平民百姓均可。如逢雨水多草场好，羊肥马壮之年，则举行大跑马（“乌热斯”和八月初一的跑马会是不同的），由旗王下令全旗三十六个巴格都来参加，届时旗王在雅雅庙设起蒙古包多顶，王府人等全体搬去居住半月，尽情游乐。全旗牧民也全家老少驮着帐篷和蒙古包，带上馐食、羊只到雅雅庙周围安营扎寨，蒙古包和帐篷连成一片，人山人海十分壮观。

这年（一九三七年）达理札雅看到阿旗降雨甚多，草场茂盛，牲畜膘满肥壮，是自他袭爵后的好年景，决定举行轰轰烈烈的庆贺大典，并打算把他的母亲太福晋、他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从北平接来全家团聚，共享幸福。并想把他的老岳父陶贝勒（载涛）也请来参加女儿女婿袭爵庆贺大典，以表敬意。六月底即派王府总管张仁前往北平迎接，只因张仁走到归绥（今呼市）适逢“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平绥铁路不通车，只得返回。

这次的“乌热斯”大会异常隆重，为时半月有余（农历七月廿一日至八月十五止）始告结束，达理札雅全家都搬去会场居住，因为这次乌热斯跑马大会是专为庆贺达理札雅登基而开，故一切都用清王朝的礼仪进行，达头戴紫宝石顶帽三眼大花翎，身穿蟒袍，绣龙谱褂，项悬朝珠，足登朝靴，神采奕奕地接受臣民的顶礼膜拜。此外跟随达王到会的侍卫人员，除规定穿民国军装的副官人员外，其余也都按清代品级穿着顶戴袍褂行叩拜礼，旗政府亦均搬到会场办公，连无线电台也在会场架设向外通讯。我们几个在王府当差的小戈什哈每人赐给一套崭新的袍褂，顶戴也由铜顶晋升为水晶顶子。

在这半月之内前来参加“乌热斯”大会的人们开怀畅饮，尽情歌唱，并踊跃参加赛马、摔跤、射箭等各项比赛活动，会开得空前盛大。

这次大会还邀请了外宾，其中有额济纳旗的代表苏宝峰，蒙藏委员会调查组代表刘伯石，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也都派代表前

来观看。

可是人们在狂欢幸福之中却没有想到，这次大会依然为阿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盖以当时（一九三七年）正值“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鸿逵为了打击阿旗，摧残达理札雅，竟向国民党政府进谏谗言说：达理札雅在全民抗战开始之际，不积极支持抗战，而集合全旗蒙民召开“乌热斯”大会，身穿清王朝的顶戴朝服，按照清朝的礼仪接受臣民的叩拜，是在向全旗臣民宣誓决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复辟满清皇朝。虽然国民党政府并未立即有所行动，但无疑在军事专员郑子献被侮离职之后，马鸿逵的谗言必定发挥作用，对后来国民党政府决定使用马鸿逵的军队袭击定远营，俘虏达理札雅，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 九 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来宁夏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军兴，平津沦陷，日寇由平绥线向西进军，可能波及宁夏省和阿拉善旗。一九三七年九月间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来宁夏，一面对马鸿逵安抚，使其坚定抗战立场，避免倒向日本；一面察看阿旗的动向，并拟邀请达理札雅赴南京晋见蒋介石，以便拉住达王，团结抗战。因为达王曾与德王的蒙政会亲善，蒙政会也曾与达王拨发武器弹药和无线电台，双方拉拢颇为密切。日本特务机关在定远营停留时近一年，军委会驻阿旗军事专员郑子献被迫离职。目前阿旗的无线电台仍与德王的嘉卜寺“蒙古军政府”保持每天通讯。北平虽已沦陷，而住在北平的达穆林旺楚克与日本人有所接触，仍与阿旗每天保持通电，所有的电报密码并不机密，宁夏收抄后大都能够破译，达理札雅与嘉卜寺及北平的来往电报内容均为马鸿逵所知悉，马即据以报告国民党蒋介石，建议由他将达理札雅立即逮捕扣押，但蒋介石仍持慎重态度，未即冒然采纳马的建议，而特派陈诚前来宁

夏察看达理札雅的真正意向。

陈诚抵宁后，即邀请达理札雅去银川会面，达与旗府协理章京等高级仕官会商是否可以接受陈的邀请，结果大家都同意达王前去，特别是副协理罗巴图孟柯力主前去，以便与陈诚一起赴南京晋见蒋介石，当面表明抗日的决心。因为抗战已经开始，平津沦陷，日本军队大举向西进犯，绥远吃紧，宁夏乃西北之门户，阿旗又为宁夏的腹背之地，马鸿逵早就觊觎并吞阿旗这块地盘，历次向中央谗言阿旗勾结德王投靠日本，现在如不去宁夏与陈诚见面，则正坠入马的奸计之中，后果将难以预料，故极力主张达去银川向陈诚表明心迹，以免马鸿逵的阴谋得逞，使阿旗灾难临头。然而达理札雅胆小怕事，尤其儿女情长，深恐一去不返（被扣），妻儿悲苦，特别是绥西后旗的札萨克因抗日不利被捕，这一消息使达更感不安；达信佛教讲迷信，向南寺活佛问卦（祖拉亥奇），亦云不去宁夏为好。因而不论众人如何相劝，终也下不了决心，最后只好决定改派他的亲信副官张元忻前往宁夏面见马鸿逵，探个究竟再作计议。

张元忻到银川晋见马鸿逵，将达王的有所顾虑，不愿来宁夏晤见陈诚的意思向马报告，并说：王爷请求大哥在陈总长面前妥为善言解释。马鸿逵即对张元忻云：你回去告诉达王，现在抗战军兴，阿旗和宁夏都是国防要地，中央特别重视，所以特派陈总长来宁与我和达王见面，都是为了大家团结抗战，别无他意，希望达王免去顾虑，立即来宁共同聆听总长的指示和安排。另外陈总长的意思，如达王愿意可与总长一起赴南京晋见蒋委员长，只要为团结抗战，达王有什么要求（如需武器弹药、经费等），蒋委员长都会答应的。

张元忻回旗后，将上述情况向达王如实作了汇报，达王听说要他去南京更加害怕，认为到南京定会被扣，甚至在宁夏与陈诚见面即有被扣的危险，遂即回音马鸿逵决定不去宁夏。马鸿逵将达

王不愿去宁夏的意思报告陈诚，而陈诚坚持要面见达王才好回南京复命，最后由马鸿逵提议：可以请总长到阿旗境内贺兰山麓的长流水，通知达王前来相见，总长的安全由省方派军队保护。然而这样一来，达理札雅断定一定是扣他无疑，愈加不敢答应，于是干脆长流水也不去，回绝与陈诚见面。

马鸿逵一见达理札雅坚决拒绝，避不与陈诚见面，贼心大喜，即向陈诚献谗说：达王拒绝与总长会面，表明过去我向中央的屡次报告属实，目前达王仍与德王及北平的三弟密电来往，决心投敌勿庸置疑，请速将达理札雅扣押，迟则有变，变则难收拾，这一任务可交宁夏就近执行。陈诚回到南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主张马鸿逵的建议应当采纳，蒋介石同意陈的主张，于第二年二月间批准下令马鸿逵采取行动。

## 十 宁夏军突袭定远营

马鸿逵奉命后，自是喜出望外，多年的愿望一旦实现真有难以形容的滋味，事不宜迟，立刻作出安排：首先进军定远营要有个借口，因为大部队不便秘密行动，如被达王发觉，逃入牧区沙漠地带，就成了狗咬刺猬无处下口，不但对蒋介石难以交待，自己扩充地盘也将落空，所以必须作出慎密计划。目前驻防定远营的部队是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张海禄团，不如与马鸿宾商议，把蒋介石的真实使命告诉他，对外则伪称奉中央命令张海禄团要调防他地，改由马鸿逵部接防。这样达理札雅就不致怀疑有军事行动，任务可以顺利完成。于是决定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三八年）开始行动，事先通知达理札雅：奉中央命令，阿旗驻军换防，定于二月二十四日驻防阿旗的马鸿宾军张海禄团另有任务撤回宁夏，由马鸿逵军马宝麟旅何玉魁团同时接防进入定远营。果然阿旗政府接到通知后，并未发觉异样的征兆，认为是正常的换防，

只是感到马鸿逵的部队换走马鸿宾部队，使马鸿逵的魔爪伸进阿旗，此后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但碍于中央的命令也无可奈何。遂决定先欢送张团，二十四日派员迎接何团，然后再举行欢迎。当日（二十四日）达理札雅派亲信副官张元忻，会同张海禄团所派袁营长一起前往南梁迎接何团，但一直走出十里外直至周家田候至傍晚，仍未见何团的部队到来，二人返回。张元忻为人精细，在与袁营长一路接触中，发现在候何团不到，天色已晚之后，袁营长的举止言谈极不自然，躲躲闪闪，十分可疑，于是张回家吃过晚饭后即到稽查局（张为局长），派出王韞德、沈应麟等数人，到定远营四周巡逻，察看有何异样动静。张的用意一是唯恐何团夜间开进，仍须前去迎接，二是怕张团士兵乘换防混乱之际，在定远营偷盗抢掠。王、沈等人在晚八时许天色正黑时巡行至东门外营盘山坡下（现大水库处），忽然发现有白桩晃动，不知何物，即向前走去察看是什么东西，孰料白桩见多人走近便拔腿逃跑，原来是穿白皮袄的人在跑，王、沈等人立即追上前去抓住带回稽查局。张元忻一见抓到的是驻军张海禄团的军人，更觉今夜必然有事。遂将情况立即报告达理札雅及旗政府协理等人：日间去南梁直至周家田迎接换防部队未到，袁营长神情有异，晚间后营盘山边又发现张团派人站哨，事属可疑，深恐今夜有事，建议把抓到的张团士兵带到王府回事处以礼相待，或可吐露一些情况云云。张的建议得到达理札雅的同意，由副协理罗巴图孟柯亲自打开城门（稽查局在城外），将抓到的张团士兵带到城内王府回事处。回事处对面是王府的大厨房，当时命令厨房置备酒肉招待这个士兵，果然这一招发生了效果，该士兵酒肉下肚之后很受感动，自动开口说：你们这样待我，我真没料到，我实对你们说了吧！我是张团某营某连的连长，今天换防是假，宁夏要调一个旅来包围定远营，抓达王去银川。白天说迎接换防部队都是放烟幕，部队根本不从三关大路来，而是张海禄团傍晚撤到南梁坡，



任务是包围定远营的南面，马宝麟旅的两个团夜间由贺兰山苏峪口小路进军定远营攻取后营盘山，包围东、北、西三面，捉拿达理札雅。我的任务是在后营盘山下站哨，迎接马宝麟的部队当向导，指示包围的方向。这一突如其来的惊人消息，使达王府上下乱作一团，不知如何应付这一事变。达理札雅在王府内召集了旗政府协理、章京、总管以及达王左右随从的亲信副官等开了紧急会议（召集这些人都是张元忻亲自到各家通知的）。但达理札雅为人忠厚老实、胆小怕事、优柔寡断，未经过“大风雨”，这时则束手无策，而且儿女情长，只是一家人相对流涕，茫然无从。旗政府官员们也都面面相觑，拿不出任何应变办法，不过说些安慰宽解的话罢了。惟有副协理罗巴图孟柯，年轻刚正，有胆有识，提出了一个勇敢而有作为的建议：根据掌握的情况，张海禄团已经布防南梁一带，而东、北、西三面马宝麟旅尚未到来，尤其西面居民很少完全空虚，乘此时机，我们以轻骑由西关出走紫泥湖（沙尔布日都，今锡林高勒）沙尔扎庙，让马军围城扑空，我们则带上无线电台，在牧区向国民党政府报告马鸿逵派军围攻定远营城，欺压本旗，本王（达理札雅）坚决反对，请中央惩办宁夏马鸿逵，武装阿旗蒙民参加抗日，这样一可表明阿旗并未勾结德王投靠日本，中央纵容马鸿逵陈兵阿旗实属荒谬；二可将马鸿逵置于进退维谷之境，阿旗达王并未向绥远德王处逃跑，而是在牧区向中央联络陈述冤屈要求抗战，且看马鸿逵如何向中央交待，中央又如何处理这次事件。

当时如能采纳罗巴图孟柯的这一建议，则阿旗可以赢得时间，使马鸿逵处境狼狈非撤兵不可，中央也无理由在阿旗再用重兵驻防；如不撤军，达理札雅即可名正言顺地率领阿旗蒙古骑兵对马军进行骚扰袭击，形势的发展必然会对阿旗有利，坚持下去，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大敌当前，自然不愿后方发生纠纷，问题就可得到良好的解决（命令马鸿逵撤军，给阿旗装备蒙古军队，保



旗抗日)。只因达理札雅没有这样的胆识，罗的建议未被采纳，不得已思其次，采取了一个坐待饶幸的下策，决定坚守后营盘山和定远营城（显然不足恃），等候马家军到来看其如何举动（直至此时达理札雅尚企图饶幸，认为马军不会立即攻城，或可在马鸿逵念起世交的条件下双方妥协），再作计议。其实当时已能判断，马军以一旅三团的兵力夜袭定远营，来意凶恶，阿旗保安队力量相差悬殊，众寡不敌。达理札雅竟不知本人躲避（出走牧区），反凭一厢愿望冀得马鸿逵看在世交的分上慈悲为怀，此乃庸人自误的作法，而达理札雅却认为是可策安全的唯一出路。决策后由两位协理——罗恩凯巴图和罗巴图孟柯领首进行军事布置，斯时正值正月二十五日春节刚过，阿旗兵役制度是轮流换班，每班三个月或半年，春节过后正是换班时节，下班的已去，上班的尚未到齐，因为“太平”已久，制度也不严格，正是兵员缺乏的时候，遇上此种紧急情况，确感左右为难。二位协理一个是保安总队长，一个是副总队长，在总队部召集全体士兵，上班者不足百人，留下守城而后营盘山无人防守，抽人上山则守城人数又过少，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把延福寺的喇嘛召来，也只有十余人，再加上军号十余人，七拼八凑共计二十七人，派上后营盘山。上山不敢开城门出走，而是由后城墙用绳子把人吊下去，再把枪支、弹药吊下去，爬上山分布在三个营盘里防守。其余不足百人的保安队全部调上城墙戒备迎敌。

是夜（二十四日）十一时后，我家尚未就寝，忽听院内有人上了房，我和父亲出去一看是军队，我父不知何事而对他们发牢骚说，军队太不象话，我家院门关着，也不打招呼就爬墙上房。这时军士中有一人答话，我们是奉命执行任务，你们不许出来乱走动，进屋睡觉，什么事明天就会知道的。我把父亲劝回屋说，事情有异，不能再和人家争执，明天看情况再作计较。即而由窗口看去，我院各房顶上都有士兵站哨，至下半夜一、二点钟枪声大

作，显然是双方开了火，枪声时紧时松，持续了约两三个小时才逐渐停止，我家一夜也未敢就寝。

原来事变的当夜（二十四日）一、二点钟，马鸿逵的警备第一旅由旅长马宝麟率全旅两个团（何玉魁团和王有楼团），抄捷径小路苏峪口、范家营子偷偷开进定远营，从老陵滩、柳树沟往西一直到西关把定远营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布置就绪后即开始向营盘山发起进攻，凌晨二时许至拂晓向山上三次猛攻，均被二十七名兵和喇嘛击退。交火后两位协理一个率保安队官兵坚守城的东、南、西三面，一个在北城墙上往后营盘山上运送子弹，指挥坚守营盘山。王府内则有总管张仁、副管张元忻、张倚和府内居住的老戈什哈张根敦及其妻王妈、儿子张宏达、还有张元恒、魏双贵、李福海及其妻小罗等十多人陪侍达王全家，等待命运的安排。枪声紧急时，唯恐敌人炮轰城内王府，临时又决定达王全家暂避到李福海家中住宿，以防万一。

次日早晨，守在我房顶士兵班长向我们提出，把后院的两间仓房腾出让士兵在里面休息，并命令我们只许在院内走动，不准走出院门。从军士的言谈中我始得知是包围定远营城扣捕达王去宁夏。过一、二日军士们较熟悉后，又告诉我们：街上各处都有岗哨戒严，白天一般老百姓可以走动，达王府内及旗政府的职员都禁止出院门，而且有军士在院内监视。

另外，当天（二十四日）夜里还有两件事尚须说明：第一、当晚九、十点钟时张元悫（无线电报务员）收到北平来电，面交达王（以往北平及德王的电报都是由王枕华译送，当时王不在），达即将密码本交张翻译，该电系北平达穆林旺楚克发来的，内容是：让达王伪称福晋有病，到阿贵庙代母诵经祈祷。何时去，先告北平，我派飞机（日本飞机）去接。张元悫将电报译后呈交达王，达王看后大惊，对张说：此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许对任何人泄漏。张答，既然不信任我，以后不再代你译电就是。达

说：我是嘱咐你而已，你怎么要起小孩子脾气了。由此足见当时达王的慌乱情绪，原因是达王将阿旗的形势及他的处境与北平通电互相研究对策，马鸿逵收抄无线电报破译有所发觉；第二、一九三七年秋有人为达王介绍一位武术艺人，回族，名叫马子良，住在王府内给达王教武术，并兼保镖，达王很高兴，除自己每天锻炼外，命我们年轻的戈什哈也每天早起跟马子良学武术。定远营被包围的当天夜间，达命人去叫马子良来身边保护，而马子良却早已不知去向，这才发现马子良是马鸿逵派来的奸细，知道今夜有行动事先离去。

第二天清晨，马家军在南梁街马金虎的万盛店内（今七产公司）以迫击炮向城内发射，目标是轰击电台和总管张仁的家。打电台是为切断阿旗与德王及北平的联系，打张仁的家则是由于达王听张仁的话私通北京（日本）。共发射十余发炮弹，都落在城内后山坡刘延庆家门口附近（即城内西北角）。发炮的另一目的是进行威胁，使达理札雅听从摆布。在马军开炮时有几位有声望的回族老仕绅马金虎、周四爷（周生祥）等（都和马军的首领是同族又系亲戚）跪在炮前恳请不要打炮，派人进城接头和平解决（这表明达王袭爵执旗政以来甚得人心）。停止炮击之后，即派定远营商会会长王兴斋（永盛和商号经理），叫开城门到电台告诉台长王枕华，军队叫把电台交出，否则即用炮打平。此时王枕华正在收报机上与马鸿宾的电台通报，王见会长进来即将耳机交给报务员张元惻继续收报，自己即与王兴斋接谈。张收抄完毕拿上电报和王枕华一起去王府见达王，到王府时正好达王也接到马鸿宾打来的电话，马鸿宾首先要求达王先把后营盘山的喇嘛兵撤下徽枪，其它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其次是交出电台，张元惻刚刚抄收的电报内容也是撤喇嘛兵，交出电台。为什么对二十几个喇嘛兵如此重视？后来据参加打后营盘山的军士们说：他们打营盘山几个小时未能攻克，只见山上全是黄人黄马，非常踊跃，

夜间马家军见状未敢轻举冒进，所以第二天头一条就提出撤掉喇嘛兵什么都好办。自此阿旗即有迷信传言，说那夜关公显圣（后城墙有关帝庙香烟颇盛），实则乃马家军素质太差，怕死怯战罢了。

经马鸿宾从中斡旋，达理札雅同意撤掉后营盘山的喇嘛兵，交出无线电台，是日上午即将电台交由军队接收，并派罗巴图孟柯副总队长陪同马家军团长何玉魁、王有楼到后营盘山，将守营的二十七名喇嘛兵叫出当面缴枪。可是何、王二团长不相信，质问罗副总队长：山上就这几个人吗？你们不要捣鬼，山上一定还有埋伏。罗副总队长遂带领跟随前来的一个营长（马军）走进三个营盘里查看了一遍，该营长回报二位团长：营盘里确实什么也没有。二位团长当场顿足后悔说：这几个人还用枪打，不放枪也上去了。这天国民党中央还派飞机一架飞临定远营上空盘旋侦察配合助威。原因是情报称：定远营周围牧区来的蒙古兵帐篷都下满了。另外马家军还指明，要达王把北平来的电报交出（即二十四日夜的电报），因为阿旗与德王及北平来往的电报马军利用接收军专处的电台都能进行抄收，并研究破译，能够大致获悉电报内容，达王便命张元悫将电报中的阿贵庙改为南寺，派飞机改为坐汽车前往，然后重新抄录，送交马军。

包围定远营的马家军总指挥是马腾蛟师长，当日（二十五日）在三道桥同心店（今副食品加工厂）门前召集老百姓讲话，大意是：马主席和达王之间发生了误会，不日达王就去宁夏见马主席，他们两人一见面就啥事也没有了，希望大家不要惊慌，各安生计，这次事件与你们老百姓丝毫无关。

不过虽然阿旗已经撤掉喇嘛兵交出电台，作出了让步，但马家军仍在围城，问题还没有澄清解决，为防军队炮击城内王府，是夜（二十五日）达理札雅一家仍寄宿李福海家中。

## 十一 马鸿宾来阿旗斡旋达理札雅被扣银川

二月二十六日，马鸿逵派军袭击定远营的第三日，因阿旗已经撤掉喇嘛兵，交出电台、电报，作出了妥协让步，围城的马家军未再进攻，双方成了相峙状态。马鸿宾与甘肃老太太（马鸿逵的生母）同时由宁夏分乘数辆汽车前来阿旗，在定远营南梁街万盛店内下榻，以电话通知城内达理札雅，达即偕同福晋及女儿们出城到万盛店拜见“伯母”（达与马鸿逵是世交兄弟，故达对马母称伯母，此前双方内眷亦有来往，相互熟悉），并与马鸿宾会面。达理札雅见了伯母首先俯首请安，然后倾诉委屈，不免伤心落泪，老伯母见到侄儿侄媳，也表示非常遗憾，埋怨大侄（达理札雅）“不听话”（不听马鸿逵的“劝告”），拒绝到宁夏见陈总长，以致闹到这步田地，伯母这次来是为了侄儿侄媳的“安全”，跟伯母去宁夏暂住一个时期，我以老命担保侄儿全家的安全，以后慢慢解除误会，否则侄儿安全不得保障，伯母于心有所不忍，希望侄儿仔细考虑，听从伯母的话，作好准备与伯母一起去宁夏。达理札雅回城后召集旗政府各协理、章京、总管以及所有亲信副官商议的结果，认定马鸿逵的目的就是要解除阿旗武装，虏走旗王，现已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不走是万万不行，既然甘肃老太太亲自前来，以世交之情相劝去宁也较“体面”，不然就成了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反为不美，事已至此只得缴枪投降，然后作好准备去宁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第四日（二十七日）甘肃老太太在马鸿宾的陪同下，进城到王府看望达王全家，表示亲切关怀，重申保证大侄全家安全，达王也感谢老伯母的爱护，愿意跟随伯母去宁夏居住，只是须要准备几天。老伯母慈悲慨然允许，不要耽误太久就好。同时马鸿宾也与达理札雅商定，保安队的武器，留下步枪二十支，以作站岗守城门之用，其余全部交出，由宁夏军

队接收。会谈完毕设宴招待一番，马鸿宾陪老太太回万盛店住宿。

阿旗在民国后一直仍旧沿用满清的制度和习惯，王爷出门须选择黄道吉日，眼下又在危难之际，此去祸福未卜，更要慎重从事，什么“七不出八不入、九又不吉利”之类的忌讳很多，挟来选去一直延至三月一日（农历正月三十日）才算最佳吉日，遂决定是日全家去宁。

达王在准备全家离开王府去宁夏长期作人质时，精神上是极不好受的，从前在王府内是前护后拥，一呼百诺，现在则要身入虎穴，前途如何很难预料，安排随从人员甚费踌躇。盖于被包围后居住城外的旗政府职员和王府的戈什哈都被军队关在家里不许外出，与王府隔离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叫谁跟着走，是用命令指定，恐其借故不从有失王爷的威望，是征求自愿，又恐无人相随，则更为尴尬。为此达理札雅夫妇多次相对流泪，难以言状。值此旗难家难正在需人之际，副官张元忻首先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全家跟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后张元忻之所以成为达理札雅的心腹亲信乃始于此）。此外总管张仁，副协理罗巴图孟柯也都表示愿随王爷前去，在此数人的带头下，决心随去的人数逐渐增多，达王始有挑选安排的余地，最后决定：随从人员有副协理罗巴图孟柯、总管张仁、张元忻，戈什哈有张根敦老夫妇及子张宏达，张元恒及妻魏双贵、王韞德、罗甲木苏等，女侍有张景霞、王喜喜、某妈妈。至于旗政则由大协理罗恩凯巴图留旗主持，并与马军继续协商处理善后事宜。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农历正月三十日），达理札雅全家乘坐班禅活佛赠送的福特小汽车，由孙玉科驾驶，随从人员乘拉行装用品的大卡车，由万振标驾驶，出城到万盛店会同甘肃老太太及马鸿宾等一同起程由腰坝、三关前往宁夏，旗府协理罗恩凯巴图、章京陈爱尔德呢巴图（陈宝峰）、梅林章京筭布尔巴图等到

城外南梁坡送行，大家心情十分沉重。沿途有马家军的骑兵营、炮兵营严密监护，当日抵达宁夏省银川市，从此达理札雅开始了被软禁的寂寞生涯。

### 附录一 马鸿宾与达理札雅双方的协议书

马鸿逵军包围定远营城，马的生母甘肃老太太和马鸿宾亲自来阿，以马福祥和塔旺布理甲拉的世谊，说服达理札雅携眷赴银川居住（扣押软禁）。他们到达定远营后，与达理札雅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其中还有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伯石及调查员陈永治往来周旋，经过多次协商，始于三月一日达成了九条协议，内容如下，

- 一、城门由旗政府派门岗二名，严禁军队入城（指马军）。
- 二、旗政府保留长枪二十支、手枪四支，八音枪两支。
- 三、请马师长暂留定远营镇慑（指马腾蛟）。
- 四、派巡查官兵维持附近秩序。
- 五、应驻部队及早决定，双方派员安置（指马军长期驻防阿旗部队）。
- 六、请调查员陈永治从中帮忙。
- 七、速撤四周防务，恢复交通（指解围撤军）。
- 八、由旗府派员赴各地宣传解释误会。
- 九、旗府在城外设一办事处，驻军一切用品由团部派一军需员接洽。

马鸿宾 章 达理札雅 签字

三月一日（阿左旗档案馆藏）

### 附录二 陕西日报登载新闻

事件发生后，陕西省“西京日报”登载新闻，大意说：阿拉善旗达理札雅旗王图谋叛变，蒙古军队集中定远营附近下满了帐



蓬，中央下令宁夏省马鸿逵部派军迅速宁息，达理札雅被扣押银川。由此可知，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达理札雅的罪名是“叛变投敌”（日本）。盖因抗战正在紧张阶段，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各地军阀纷纷投降（日本），汉奸卖国贼到处横行，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大肆宣传阿旗事件，旨在镇慑败将投降和各地汉奸活动，以资振作士气及回避舆论的指责（当时全国报纸、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所指责）。

### 附录三 达理札雅在宁夏会见马鸿逵

达理札雅抵银川后，曾与马鸿逵见面，表面上两人仍以“兄弟”相称，保持前辈世交的“感情”，马见达的副官张元忻跟随在侧，即指着张问道：张副官本主席对你说的话，你都转达了王爷没有？你看闹到这步田地，叫我也没有办法。张答：转达了。达理札雅也当面承认已转达了。马鸿逵把袭击定远营的责任完全诿之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命令，装模作样自充好人，这是因为宁夏毗连阿旗，惧怕阿旗蒙古民族反抗的缘故。然而马鸿逵不论怎样施展两面派手法，阿旗蒙古民族终也恨之入骨，达理札雅以奇耻大辱耿耿于心，此后省旗尖锐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盖始于此。

### 附录四 马军突击定远营当夜的一段插曲

马鸿逵在布置突袭定远营时，所派总指挥是师长马腾蛟，当时命马宝麟的警备第一旅两个团由苏峪口小路前往定远营围城，另派一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由三关大路前来定远营沿途设防，以防达理札雅在被挟持来宁途中逃走，或蒙古兵半路劫驾。于二十四日夜间炮兵在先抵达距定远营南二十里的周家田一带，骑兵后到，行至腰坝与周家田之间、先到的炮兵听到马蹄声疑是蒙古骑兵，因事先已奉指示要谨防蒙古骑兵的厉害，须特别警戒，故黑夜里忽听马蹄声神经紧张，距离很远就喊“口令”。骑兵营马

蹄声嘈杂并未听见，且知前面是自己的炮兵并不提防径直前进。炮兵见骑兵不答口令继续前进，认为是蒙古骑兵无疑，立即开枪射击，而骑兵一听枪响又认作是遭到蒙古骑兵的埋伏，亦即下马匍匐路旁还击。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双方只是向着枪声处射击，愈打愈烈，竟至动起了机枪。骑兵方面听到对方的机枪很多，判断蒙古兵何来这多机枪，可能是自己人发生误会了，即命令号兵吹号联络，号音一响双方才知道“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这是宁夏军突袭定远营事件中的一段插曲，由此可知，当时马家军对阿旗的估计是很高的。

#### **附录五 阿旗保安总队第八大队长杨艾立肯木为阿旗争光**

马鸿逵在突袭定远营同时，曾命令驻在磴口县的骑兵两个团，对阿旗驻守沙金套海的保安总队第八大队包围袭击，企图缴械，因该大队长杨富存（杨艾立肯木）机智多谋、英勇善战，对马家军早有戒备，当敌人来袭时率部奋起反击，未被包围，但因众寡不敌，且战且走撤退到阿旗北部巴音乌拉山、沙拉布隆一带，未伤一人，未失一马一枪，为阿旗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立了特等功劳，为阿旗的蒙古民族争了光（杨富存解放后因系起义，曾任巴盟军分区副司令员）。此外，阿旗政府在中央军二十五师撤走，改由马鸿宾的张海禄团驻防定远营之后，亦曾有所警惕，将多余的一部分武器及重要档案移往牧区带尔肯庙储存，以备一旦有事时在牧区中就近武装牧民支援保安队，这一部分武器及杨艾立肯木的第八大队在事变中未被宁夏马军缴去的武器，为后来的阿旗重整军备打下了基础。

# 概述国民党政府对原阿拉善旗的统治

戚 涛

国民党政府对原阿拉善和硕特旗（简称阿拉善旗或阿旗）究竟是怎样进行统治的，都有哪些统治机构，哪些统治措施，这是研究阿旗历史的重要方面，为人们所关心。我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五年）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从事学习、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当时称为边务问题），并实际参加民族事务工作（当时称为边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直至全国解放以前，则在阿旗担任行政工作，因而对于上自国民党中央政府，下至阿旗地方，都有一些亲身经历，现就记忆所及予以概述，俾供研究近代史学者收集参考。

## 一 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重视阿拉善旗

原阿拉善旗包括现在的阿左、阿右两旗和磴口县，不但区域辽阔，其政治地位也较一般蒙旗崇高，这是因为清朝对于阿旗异常恩宠的缘故。在清代开国之初，西北边疆民族复杂，统治基础薄弱，皇室出于国防上的考虑，信赖随征新疆有功的蒙古和硕特部，赐以贺兰山以西之地为其领地，建立阿拉善和硕特旗，并封为亲王尚公主世袭罔替，旗之上不设盟，直隶于大清中央政府理藩院，俾为西北屏障拱卫京师。民国而后，先后历经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国内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侵凌，内忧外患国无宁日，中央政权极不稳定，对于边远的蒙旗地

方实际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政令不能贯彻，蒙旗制度大体原封不动任其自流，较之清代理藩院对于蒙旗严密统治不可同日而语。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首先并吞满洲，随之渗入内蒙。迨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阿旗即已发现日本特务前来活动，一九三七年日本特务竟至公然乘坐飞机降落定远营，大摇大摆直接进入王府与旗王达理札雅公开谈判，企图拉拢阿旗归降“满州国”或“蒙疆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始大为震惊，开始重视阿拉善旗，调进陆军第二十五师对阿旗进行镇慑监督。一九三八年复以“通敌”的罪名命令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派军攻陷定远营，俘虏达理札雅。此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包头，与偏据河套的傅作义部隔河对峙，阿旗成为绥远、宁夏省后方，地位更加重要，国民党政府遂大力经营统治阿拉善旗。

## 二 国民党政府对于阿旗极尽拉拢怀柔之能事

抗日战争以前，阿旗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是淡薄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后，由日本人充当后台建立“满州国”和“蒙疆自治政府”，这些与阿旗具有历史上和民族上的因缘，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外蒙与苏联亲善，事实上已脱离中国而独立，虽为共产制度，阿旗亦可依为外援抗衡国民党势力侵入，则外蒙、苏联都可藉重阿旗向中国腹地渗透，西北将成为多事之地后患无穷，因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西北国防，于一九三八年宁夏省攻陷定远营、俘虏达理札雅后，立即对阿旗进行全面控制，并规定达理札雅常年驻在兰州软禁，由第八战区长官部就近监督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驻军和特务严密监视控制阿旗，一面对于年轻的达理札雅进行拉拢怀柔，保留达理札雅的“亲王”

尊号（兰州第八战区长官部及甘肃省府所有军政大员都对达理札雅尊称“王爷”）及阿旗扎萨克的职衔，继之又陆续给予蒙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顾问、宁夏省政府委员等崇高头衔。此外并准许达理札雅与本旗仕官保持联系，下达指示，由本旗按时供应生活费用，保持清代亲王驻京遥控旗政府的待遇规格，每年春秋两季回旗扫墓。与此同时，达理札雅由于形势所迫，只得依靠国民党政府谅解支援，以寻求自己的政治出路，并开始结交国民党人，熟识了许多国民党、政、军大员，数年之间得到了国民党统治阶层的亲近信赖，尤其得到了国民党内实力派C、C系赏识，由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引荐蒋介石，居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放回归旗执亲政。自此达理札雅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身份尊贵，并由此得以与马鸿逵抗衡，保住了阿旗的地位直属中央，内政自主。

达理札雅自幼在北京长大，过惯都市生活，读书不多却颇有教养，讲排场重礼节，善于交际应对，而且仪容大方谈吐文雅，颇得蒋介石青睐。据说第一次达理札雅赴重庆（抗日时期首都）晋见蒋介石，由“侍从室”按例于宾馆内设鸦片、美女隆盛招待，而达理札雅洁身自好殊不沾染，深得蒋介石器重，认为难能可贵，为此蒋介石把自己戎装小照上亲笔题款“锐荪亲王惠存”“蒋正中赠”，并加盖蒋介石私人印章，由此达理札雅在清代加封的“亲王”尊号复得民国领袖蒋介石的亲笔认可，其尊宠优惠可谓无以复加，直到抗日战争后期，达理札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政治地位已登峰造极，更加依附国民党，国民党政府亦对达理札雅信赖寄予厚望，兹再举下列数例加以说明：

国民党内实力派C、C系所把持的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在阿旗设秘密组织“防奸处”，由国民党中央学院——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具体负责，并得中央党部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C、C系骨干）的大力支持，该处在阿旗各机关学校设秘密

“防奸小组”进行“防共”和其它情况活动。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阿旗政府教育主任兼蒙文學校校長齊文魁和旗政府協理羅巴圖孟柯，先後被特務組織和寧夏省方揭發有“勾通外蒙”和“勾結陝北共產黨”的重大嫌疑，一時風聲鶴唳，旗政府上下人心惶惶，阿旗的安全也成了問題，誠恐省方重演一九三八年對阿旗的軍事行動。結果由達理札雅出面函電並上訴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蒙藏委員會，便兩案均消弭於無形，齊、羅兩人安然無事，阿旗安全也得以保障。

早在抗日以前，寧夏省即呈請國民黨中央政府內政部，擬議在定遠營設縣，定名為“紫湖設治局”，藉以並吞阿旗，使之歸於寧夏省轄屬。抗日戰爭時期，寧夏省又以國防為借口，屢次呈請內政部正式設立“紫湖設治局”。然而終因達理札雅的有力抗爭，國民黨中央政府不得不慎重從事，一再延擱批准寧夏省的要求。

甘肅省民勤縣與阿旗西南部接壤，當時民勤縣地瘠民貧，人口眾多，阿旗大片水草豐美的土地被民勤縣群眾放牧耕地，縣政府因之實施行政管理，據為民勤縣屬地。加之民勤縣與阿旗邊界歷來就有爭執，糾紛時有發生，甘肅省政府偏袒民勤縣，要求阿旗作出让步，歷年旗、縣劃界不歡而散。一九四七年阿旗上控國民黨中央政府，深得中央政府的重視，特派軍令部邊務處上校參謀楚憲祿為代表前來仲裁，會同省旗縣三方代表，終於獲得初步合理解決，阿旗權利得到部分挽回，政治上得到了中央政府支持。此皆因達理札雅深得國民黨政府寵信的緣故。

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政府舉行全國“大選”，開始實施“惠政”，除選舉總統、副總統外，全國應選出國民大會代表二千餘名，立法院委員四百餘名，監察院委員六十多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為全國蒙旗“選舉總監督”。阿旗成立“選舉事務所”，以達理札雅為選舉監督。按名額分配阿旗應選出國大代表一名，立法委員一

名，与额旗会同选出监察委员一名，而且全部“候选人”由达理札雅指定。结果选出达理札雅的亲信部属陈那筭巴图为国大代表，达理札雅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为立法委员，达理札雅的好友，依为心腹的国民党阿旗特别党部书记长王枕华为监察委员（额旗札萨克塔旺嘉布派来的监察委员候选人陈俊卿被达理札指定为“候补监察委员”）。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对阿旗的重视和对达理札雅的尊重信赖殊非一般。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政治协商破裂，军事调动失败，国民党政府颁布“戡乱建国总动员令”，内战全面爆发。西北方面陕甘宁解放区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接近阿旗，同时外蒙独立、中蒙边境不清，阿旗国境线长达千里，又成为国防重地，因而国民党政府更加重视经营阿拉善旗。一九四七年初达理札雅奉召前往南京晋见蒋介石，决定阿旗恢复成立“区防司令部”，由达理札雅亲自担任中将司令，下辖一个骑兵保安总队，按国军待遇（国防军待遇），由兰州西北（甘、宁、青、新四省）军政长官分署就近直接拨发装备和给养，并辖属指挥。此为国民党政府寄厚望于阿旗的又一事例，为其它蒙旗所不及。

综上所述，国民党政府对于阿旗优礼厚遇予而不取（不直接掠夺），其目的要在使阿旗内向（亲向国民党），进而利用阿旗安定后方巩固国防。然而国民党政府对于阿旗仍须牢牢控制防其离心。这一方面除直接派进党政军特人员予以监督和控制外，最重要的则是利用省旗矛盾分而治之。在国民党政府看来，桀骜不驯的马鸿逵和怀有异心的达理札雅都是“杂牌”，都在控制之列，并无亲疏轩轻之别。以阿旗隶属中央，而任由马鸿逵打击掠夺，以致省旗交恶矛盾层出不穷，其始作俑者仍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一面给予阿旗优惠待遇和政治支持，一面对省方妥协让步，默认省方在阿旗驻军施政，矛盾发生后则中央政府充当“和事佬”，两面讨好，而从不考虑制度的改革和权限划分，这是“鹬蚌相争渔



人得利”的作法，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也是国民党政府独出心裁的统治手法。

### 三 国民党阿旗特别党部的活动

国民党在阿旗开展党务活动始于三十年代后期。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党务处在阿旗设立“直属区党部”（相当于县党部），不受宁夏省党部辖属而直隶于中央党部组织部，书记初为白金山，不久即为王枕华，热河蒙族人，原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从事“蒙古自治运动”时期派来阿旗的联络电台台长，王对达理札雅亲近恭顺，颇得达的信任，关系密切，后来达亦参加国民党，并荣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个党部就一直由达理札雅直接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七年阿旗直属区党部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仍直辖于中央党部，由达理札雅任主任委员，王枕华为书记长。一九四八年王枕华在达理札雅支持下当选为阿、额两旗的监察委员，前往南京任职，又由边疆党务处调任额旗直属区党部书记张文弟前来为书记长，直至阿旗和平解放为止。

一九四七年由王枕华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阿拉善旗第一次全旗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定远营机关团体以及牧区各巴格代表共二百余人参加，大开筵宴欢乐一堂。大会进行七、八天，通过了《国民党阿拉善旗第一次全旗代表大会宣言》，选举达理札雅、王枕华、罗巴图孟轲、陈那筭巴图、张元忻、李树德、李文钦、里宪、于培根等九人为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阿拉善旗执行委员会”，以达理札雅为主任委员。另选出金允诚、陈爱尔德尼巴图、张仁等三人为监察委员，组成“国民党阿拉善旗监察委员会”。以陈爱尔德尼巴图为主任委员。“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受执行委员会领导，以王枕华为书记长，下设组训、总务两个科。在定远营和广大牧区遍设区分部约计二、三十个，共

有党员两千余人，全部重新“总登记”。这是国民党在阿旗的一次党务大整顿大检查，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形势的需要。盖因国民党领导阶层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历史上具有国民党党籍的许多开明民主人士也和全国人民一通群起反对。国民党掌权派为了排除共产党，也为了消除“国民党员也反对内战”（反动派叫“内乱”）的尴尬局面，以示党内团结拥护，“戡平内乱”壮观国内外视听，所以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党员总登记”，重新颁发党证，不登记者即作为退党论处取消党籍。这实际是一次“大清党”，虽不捕人杀人却是有目标地开除大批老资格党员。但阿旗的情况有所不同，阿旗党员虽有两千人之多，但大都是以行政命令入党，即由旗政府下令各巴格边官指示牧民集体入党，甚至由旗政府按户口挑选年令适当的牧民（妇女儿童除外）造册送交党部，由党部颁发党证就能入党，连表面的入党仪式也勿须举行。因而党员竟不知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也不知党员应该干些什么；区分部的书记、干事之类是由旗党部指定上报就算完事，他们本身却从不知与旗党部联络办事，也根本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党组织生活。不过党证却也发生作用，可以作为身份证明，有党证就算“好人”，外出旅行可以作为“护照”（即通行证）。这次召开全旗代表大会的代表也都是按名册由旗政府下令调来的，报到后参加“选举”也是由旗政府规定在选票某处划“○”（因牧民都不认汉字）就算是投票。这次的党员总登记更属可笑，竟不询问党员本人愿不愿意登记，一律收缴旧党证颁发新党证，以致经此一次总登记党员总数竟比原来上报的数字增多，原因是嫌原来数字太少，又增报了一些名额而已。这是王枕华在阿旗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的最大成绩。不过在定远营却是有些真正的国民党员，但为数不多，估计不过二十人而已（指经常参加党的活动为党办事的党员）。

国民党阿旗党部设有一个“阿旗简报社”，每晚以收音机收

录中央社“简明新闻”，次日石印八开纸的《阿旗简报》蒙汉文各一份（但因人手和经费不足，有间隔多日始能出刊一次），免费分送各机关团体和群众商号。这是那时阿旗唯一的地方报纸，虽然内容简单，但因阿旗地处边远，交通闭塞（没有铁路公路，以马、驼和畜力车为交通工具），很少有人订阅内地报纸，宁夏省仅有一份简陋的《民国日报》也因省旗交恶阿旗人士拒绝订阅，更无收音机之类的设备（当时仅党部和王府设有收音机）。故耳目蔽塞与外界隔绝，对于国内外大事一无所知，《阿旗简报》可以起到“启蒙”的作用，确也是难能而可贵。但其内容均属中央社歪曲言论，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期间，对共产党经常造谣诬蔑，对阿旗人民为害不浅。此外阿旗党部散布许多国民党中央党部印发的宣传小册子，内容大致可分为总理遗教（孙中山著作），总裁言论（蒋介石的著作），政策法规、时事新闻、边疆动态，以及诬蔑共产党和解放区等。尤其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造谣诬蔑，内容荒诞措辞恶毒，而阿旗各族人民与世隔绝真相不明，身受其毒而不自知。好在那时阿旗党部尚无现代化宣传工具（广播电视之类），并因多数群众都目不识丁，不可能直接阅读，党部工作人员很少，又不可能广泛口头宣传，稍有阅读能力的教员、职员和学生，则以“老僧常谈”（老是那一套内容）久而生厌，故这样的宣传小册子在阿旗发生的作用尚不太大。但一般平民阶层对于共产党恐惧厌恶的印象确也有所存在，不能说国民党的恶毒宣传在阿旗各族人民中一点也没有发生效果。

当时国民党阿旗党部所设的卫生所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有医生和司药一二人，免费为群众治病（门诊）。另外党部还发动中央政府卫生部在阿旗设置的卫生所（规模较大药品较多）会合党部卫生所，联合组成“医疗宣传队”，几乎每年可以赴牧区为牧民免费治疗防疫一次，藉以宣传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德政”和“惠民政策”。以上虽属小恩小惠微不足道，但那时阿旗人民生

活困苦无医无药，几乎过着原始式听天由命的生活，对于这样的“恩赐”却也欢迎不暇颂扬备至。这是国民党“为社会服务”（国民党的口号）在阿旗唯一的一点“成绩”。

抗日战争时期，阿旗也有“三青团”的组织，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甘肃省支团阿拉善旗分团”（县级组织）。干事长（三青团各级组织均设干事会，以干事长为领导）由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轲担任，正副书记（具体负责人）为李文钦和于培根，团员均为各小学学生，由教师指定集体参加，估计约有一二百人。虽有表演话剧歌舞和组织演讲会、运动会以及街头张贴标语等活动，内容不过宣传抗日，歌颂领袖（蒋介石）之类，无可记述。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全国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阿旗分团即行撤销，团员自行解散（因年龄较小当时并未转为党员），此后三青团即在阿旗消声匿迹，再无任何活动。

#### 四 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在阿旗的统治措施

蒙藏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的一个部级委员会，由清代的理藩院和民初北洋政府的蒙藏院相沿而来。顾名思义蒙藏委员会主要管理的是蒙古和西藏事务，为国民党政府办理民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它可以行政院的名义和本身的名义向各省政府和各盟、旗政府以及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和外蒙古都不称省或区而称“地方”，是当时的行政区划名称）直接往来行文下达指示。故蒙古各盟旗（独立旗）名义上都直辖于中央政府行政院而受蒙藏委员会的行政领导。

抗日战争以前，蒙藏委员会在阿旗仅设有一个“调查组”，从事各项社会调查，调查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物产、贸易、军事、交通、宗教、习俗，以及天文气候等项目，均

属静态资料的搜集。该调查组原名“河湟调查组”，组地应设在兰州，调查区域包括甘、宁、青三省，于阿旗定远营设“联络站”。后因人力财力所限，该组人员集中定远营，故事实上阿旗为组部驻地。所调查的区域以宁夏省及阿旗为主。调查的方式可以组的名义（有印信）行文各省、旗、县政府要求调阅档案或供给某些资料，也可以要求提供方便该组自行派遣“调查员”亲赴实地或公开向有关群众调查。调查的结果整理汇编，写成分项分目的“调查报告”呈送蒙藏委员会审查备案归档，作为永久性的行政依据或研究民族问题的第一手参考资料。该组组长，由蒙藏委员会荐呈行政院任命，组员称“调查员”，荐任、委任都有，分别由行政院任命或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直接任命。全组人员生活待遇及活动经费均由蒙藏委员会直接拨发，地方政府不负担。蒙藏委员会先后派在阿旗的调查组人员计有刘柏石、陈永治、顾星五、仲旭、马成浩、陈仲剑、阿格栋噶等人。他们所编写的“调查报告”每篇以数万字计，内容丰富记述详尽，并绘有各种图表，颇为醒目。此外调查组还在定远营开设识字班和图书馆等业务，但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效果不大。抗日战争胜利前二三年（约在一九四二、三年）由于经费不足，或亦由于调查业务告一段落该组撤销，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他调。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安定后方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大力经营绥、宁两省蒙旗（实际当时内蒙大部地区都已沦为日本占领区，所剩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绥远伊盟和乌盟两部及宁夏的两个独立旗。青海和新疆蒙古为军阀马步芳和盛世才分别割据，拒绝国民党政府染指），因而有“驻旗协赞专员”的设置。其目的是加紧控制争取蒙旗内向（亲向国民党），以防被日本帝国主义拉拢与抗战不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则因外蒙独立内战爆发，为防蒙旗离心，驻旗协赞专员的制度依然保留，直至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为止。

协赞专员为荐任官，由蒙藏委员长呈请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任命，下设秘书一人，助理员一人，公役一人，规定于所在旗的政府“办公”，不另设单独的办事机构，接受地方长官（旗札萨克）的领导，所有人员的薪俸待遇及活动经费由蒙藏委员会拨发，不由旗政府负担。故协赞专员为旗政府的官员之一，对外以旗政府的立场发言，维护旗政府的利益。但协赞专员又系中央政府所派，对内（旗政府内）又与旗政府的原任官员有所分别，发言办事直接对蒙藏委员会负责。

按照蒙藏委员会所订“协赞办法”（即协赞专员办事条例）的规定，协赞专员必须为蒙旗“忠心服务”，其职责范围是“襄助地方长官（札萨克）办理一切军政事务”。除个别事项协赞专员可以自己名义向蒙藏委员会请示报告外，一般情况下协赞专员都以旗政府的名义办事，仅两个月定期向蒙藏委员会作出“工作报告”，俾供蒙藏委员会据以考核协赞专员的工作成绩。蒙藏委员会亦可随时下达指示指导协赞专员的工作和活动。此外协赞专员可以不驻在本旗，例如伊盟各旗的协赞专员可以驻在榆林、包头、归绥等地；宁夏阿额两旗的协赞专员可以驻在银川或兰州；甚至可以常年驻在南京，为本旗与省方及中央政府之间联络办事。但不常年驻旗的协赞专员只发给本人的薪俸和生活补贴，其余附属人员及办公活动经费一律停发，并不得晋级奖励，藉以鼓励协赞专员常年驻旗，发挥协赞制度的作用。

协赞专员还有“协调省旗关系”的任务，不过此非明文规定，仅在任命之初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口头安排。盖因中央政府不便公开承认省旗存在矛盾，故只能口头安排协赞专员应该作出努力使省旗关系和睦以利边疆安定。那时绥、宁两省蒙旗都在省辖区内，受省方的严格控制，而蒙旗名义上直隶于中央政府，企望摆脱省方控制独立自主，所谓的省旗矛盾，实际是由于制度混乱造成的，例如绥远省政府在伊盟各旗派有“辅导专员”，直接

控制各旗旗政，较之蒙藏委员会所派协赞专员更有实效；宁夏省政府则在阿旗设立“办事处”，俨然县政府控制保甲征兵征马，与旗政府形成双重政治，协赞专员虽系中央政府所派，却无权干涉这个办事处的所作所为。由是观之，蒙藏委员会在绥，宁蒙旗设置协赞专员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安定边疆，反而促成省政府更加对蒙旗严格控制，绥远省辅导专员之设即系对抗中央政府插手蒙旗事务，省旗矛盾随之层出不穷。甚至省与中央政府也矛盾重重，蒙旗成了多事之地，协赞专员官卑职微，对于“协调省旗关系”实际上无能为力。

此外虽明文规定协赞专员有“襄助地方长官办理一切军政事务”的职权，也是徒俱空谈，实际协赞专员对于旗政只有照例赞成的义务，并无干涉过问的权力；对于省方的措施，只有歌功颂德的本分，也无发表意见的资格。故协赞专员的作用，即在上下联络拉拢怀柔，各方讨好息事宁人，借使蒙旗安定边疆无事，以解除中央政府后顾之忧。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政府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愿望。

首任阿旗协赞专员为陈水治，热河蒙古人，在任三、四年，与旗政府关系尚属融洽，但仅能站住脚步（不受排挤），并无显著建树，后因病亡故；蒙藏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初复派我前来接充，直至一九四九年阿旗解放为止。

我来阿旗后表面上备受尊重，而对于旗政大事却不能有所兴革。协赞者帮助也，“主人”既不求助，“客人”则无从开言，旗政府各级仕官以我为“客卿”，优礼有加而无隶属关系，凡事不向我请示报告，我也无从干涉过问。初次见面达理札雅就规定我的任务是“陪客”，凡中央、大区或省方临时前来阿旗办事的人员，达理札雅都设宴招待而邀我作陪，我则以旗政府和达本人的立场，与客人交谈应酬，此外别无他事。所以我来阿旗之初，确是清闲自在，生活颇为舒适。



然而我来阿旗的初衷是为了“开发边疆”，却不能安于清闲的生活（其实是不得信任被歧视）。于是我极力向地方长官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轲献媚讨好以示亲近，逐渐取得达、罗的欢心，一九四七年开始命我担任旗政府教育处主任，兼任蒙文学校校长，并在我的建议下，创办一所“阿旗中学”（现第一中学前身），我自任校长。从此我虽尚不能过问旗政府内的军政大事，但我可以教育事业开端实现我的“抱负”——开发边疆，并由此可以旗政府职员之一的资格益得与达、罗亲近，因而于一九四八年开始又得达、罗的推荐使我得兼任阿旗区防司令部上校政工主任，并又给我一份薪资待遇，使我感激涕零，更加忠心耿耿向达、罗靠拢。政工主任有监发保安队军饷的职责，我则向不出席，仅命一少尉司书在军饷花册上照例加盖我的印章表示业已审查无误，以便军需室上报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备案报销。此外举凡上级（中央或大区）规定的在保安队官兵中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下达宣传“戡乱建国”的小册子，检查士兵装备和伙食等项任务，我则一律搁置不问，只向上级慌言虚报敷衍塞责，以讨好达、罗二人（达、罗都不愿我多事），巩固我的地位。不过我在政工主任任内曾于定远营城墙上制作永久性大字标语数条。计旗政府大门对面的一条是“拥护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南关东侧的一条是“五族共和振兴中华”，南关西侧的一条是“发扬蒙古精神，巩固西北国防”；西关的一条是“平时重于战时，训练重于作战”。其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写出“反共”二字，是因为避免被误认阿旗保安队有开赴前线参加“戡乱”的任务引起官兵不安。

按照惯例，协赞专员应该被聘为国民党阿旗党部“计划委员”，我来阿旗之初，该党部书记长王枕华就通知我有此职务而未发聘书。我虽愿意效劳却无事可作，同时我也并非国民党员，担任党的职务未免不伦不类，故心存犹豫未遽接受邀请。后来王发现我并非党员，拉我趁机入党，并愿作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我

婉言谢绝。但我仍愿接受王的邀请担任该党部所办的“阿旗简报社”社长，负责指导该简报社编辑人员审稿和排版，并常为该简报撰写短评和社论，借以宣传国民党政府的“德政”和诬蔑共产党，为“戡乱”军事摇旗呐喊，并将该简报在阿旗中学内散布，早晚命人当众宣读毒害青年学生。

我还在阿旗中学内经常集合青年学生“精神训话”，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军事破产进行辩解，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国之所必须，共产主义为“流血革命”不适合中国国情等陈词滥调。在课堂上我则大讲“全国共同校训”——礼义廉耻，强调青年学生必须具备“奉公守法”的品质（礼），慷慨牺牲的精神（义），光明正大的操守（廉），辨别是非的智慧（耻），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圣贤豪杰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归结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蒋介石语），勉励青年学生要为国家尽其大忠，为民族尽其大孝，实际指的则是要为国民党政府奋斗献身。其次我又讲解我所编写的讲义“动的哲学”，内容仿佛唯物论辩证法矛盾统一的规律，强调事物的变化发展，否定唯心论事物一成不变的认识。但其目的则是针对学生们生活艰难前途暗淡，对现世苦闷徬徨的心理，强调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失利以及社会凋敝民生涂炭都是一时的现象。多难才可以兴邦，根据事物矛盾转化的规律，国家必有复兴之日，幸福必有到来之时。青年学生为民先驱，应循奋发图强的途径为社会服务，为人群造福，从而寻求个人的光明前途，反对苦闷徘徊无所作为的颓废心理。这是对辩证法的歪曲利用，目的是麻痹青年学生要安于现状，鼓舞青年学生信赖国民党政府，为国民党的政治目标——实现三民主义奋斗效劳。此外我还准备以同样的方法和目的，对学生们讲解我所编写的“思想方法论”和“生活方法论”两篇讲义，后因时局恶化，我考虑个人去留问题心绪不宁而中辍。

解放前我在阿旗数年所最感处境尴尬的事，莫过于逢到宁夏

省方在定远营征兵、征马、征驼等问题。每年都要征兵，每次征兵动辄为时一月半月，由省方驻定远营办事处责令保甲长到处昼夜搜捕壮丁，名曰“抓兵”，兵为捍卫国家安全的光荣战士，而竟出之于“抓”（捕），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大创造，事虽不近情理却是当时的现实。抓兵时期顿时定远营市区人心惶惶，所有男丁必须放弃生业藏匿逃避，家属妇哭女嚎大祸临头，景象的凄惨不可言状。某次一个屠户由于家中妻病子幼，突被保甲长抓其当兵，愤激之下竟持屠刀当场切腹自杀，遗两子一仅十一岁，一仅八岁，由好事之亲邻带领遍叩各中央机关和旗属各单位首长请求救济，然而却无人敢以代鸣冤屈和不平。盖“反对征兵”的罪名无人担当得起（据闻宁夏某县县长曾因完不成征兵任务而投黄河自杀，可见征兵命令的严厉）。

阿旗中学的学生和工友（当时学校中的工人称工友，是“民国”而后的新名词，也是文化教育部门文明维新的表现）也在被抓之列。我身为校长且系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大员”，对此亦不敢稍有异议（中央政府颁布的“兵役法”明文规定高中以下学生和“独子”均可免服兵役，也无抓兵的规定），只好命学生们寄住校院，夜间大门紧闭。幸而保甲长尚不敢在“王爷”的学校内抓人，可保无虑。然而学生们稍一不慎，在匆忙回家吃饭之际（校内设备简陋无法为炊），有时也遭不幸而被抓去，则必须由我亲赴省方办事处，甘言卑词以种种理由要求放还，虽然经常能蒙办事处主任照顾我的“面子”，但须挨一顿“官腔”，受一些讽刺和奚落，精神上是颇为狼狈的。好在能获得学生们和家长们的好评，聊足自慰。

省方的征马征驼是按商号和户口分摊，每次动辄数百匹，这是定远营商民每年的沉重负担，甚至连旗政府高级仕官包括“王爷”在内也在被征之列。这是“戡乱”军事必须急如星火，没有任何抗拒拖延的余地。有一次旗政府召集“旗务会议”，以达理札

雅领首，按户以牲畜多寡列等分摊，省方辘重团团团长马文炳亲自前来坐索，达理札雅则盛宴招待卑词恭维，借机请求稍予减缓。达并邀我出席，我则必须盛赞马家军勇敢善战为国家干城，马主席（马鸿逵）治军有方韬略广大，阿旗供马供驼支援马家军为党国效力义不容辞。然后才能以甘言蜜语帮助达理札雅恳求马主席体念牧民艰难稍予减缓，借以在省旗之间两面谄媚讨好，为国民党政府安定边疆卖力效忠。

整个抗日战争以及三年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自中央至省县都严格控制粮食，宁夏省当然也不例外。而军阀马鸿逵所割据称雄宁夏省地只不过贺兰山以东十几个贫瘠的县，人口男女老幼不足八十万，但却要豢养军队四五万人，兵员给养完全取之于本省，故宁夏各族居民负担较之内地大省加倍沉重。牧民的皮毛和农民的粮食以及其它土特产均由省政府严格统治。其中粮食一项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除田赋外还要征购征借。农民家无壮年劳力（壮丁都被抓兵）老弱妇孺终年辛勤劳动所获十之六、七都要“归公”，加以县和乡两级办事人员敲诈勒索永无履足之时，以致农村破产民生凋敝，耕者不得其食，只能以野菜糠粃维生，天府之国的河套灌区竟成悲惨世界。阿旗的处境则更有甚于宁夏各县。马鸿逵视阿旗为自己的地盘，却一面对阿旗残酷掠夺，一面又严禁供应阿旗粮食。阿旗纯粹牧区，居民食粮素来即从宁夏农区由农民或小商贩以牲畜驮运远道前来定远营，故阿旗粮价高出宁夏十之二、三，斗升小民本已苦不堪言，而宁夏省“军警监察处”还要到处设卡挡粮“禁运”。凡私人贩运一经查获即全部没收，被害商民叫苦连天，以致定远营粮价有时高出宁夏一半以上，普通平民无法聊生。但“挡粮”并非中央政府明文规定事属“非法”，达理札雅曾经多次要求我以协赞专员的名义具报中央政府责令宁夏省放宽对阿旗的粮食禁运，或由中央政府补贴运费，由绥远后套或甘肃河西等地供应阿旗粮食。而我却终不敢得罪势

力强大且暴戾无常的“土皇帝”——马鸿逵（实际中央政府也无能为力），只能以花言巧语说明达理札雅不宜与省方启衅，息事宁人为上策，而置民生疾苦于不顾。

此外我在阿旗除吃喝民脂民膏外，还有直接参与梁、胡嫌疑案和李天成嫌疑案的审讯工作两宗罪恶事实（另文详述）。所谓“嫌疑”指的是参加或同情共产党。按照“戡乱”时期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规定，事属罪大恶极决无宽贷的余地，各级政府都有严密追究和审讯制裁的职责，我为中央政府所派驻旗官员，自然更应积极过问，然而对于被宁夏省和特务组织诬为同样嫌疑的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柯和教育处主任、蒙校校长齐文魁，我却出于私情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之陈情开脱（我也坚信罗、齐二人无勾结共产党可能），使之安然无事（另文详述），以讨好阿旗当权人物巩固我的地位。一面为国民党政府卖力效忠，一面为阿旗统治阶级帮忙效劳，这就是我在阿旗任职时期的丑恶咀脸。

## 五 国民党政府在阿旗设置“军事委员办事处”的作用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即积极渗入内蒙，地处西北边陲的阿、额两旗日本特务也公然前来活动，以“送礼”和“谈判”的方式拉拢两旗王公贵族企图长期驻留，当时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在两旗仅有的调查工作人员相形见绌，不得两旗重视。乃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热、察、冀、晋各省又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始致力“保卫”绥、宁两省蒙旗，一面驱走各地日本特务，一面凭借黄河天险抵抗日军继续西进。并为了使蒙旗归心（不投敌），特将成吉思汗陵寝由伊盟长途迁往兰州，由国民党政府军

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蒙藏委员会派大员为“护灵专使”，所经沿途各党政军首脑设祭，极尽优礼崇敬之能事，这是国民党政府“怀柔”蒙旗的首次“壮举”；此外伊盟、乌盟准予联合成立“绥远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各旗王公均为当然委员，由中央政府拨给自治经费，待遇优厚以资拉拢。在宁夏境内的阿、额两旗则分别设置“军事委员办事处”，指导和帮办军事及国防事宜。自此国民党政府势力深入乌、伊两盟和阿、额两旗，在八年抗日和三年内战期间相安无事（指投敌大事）。在阿旗设置“军事委员办事处”的目的，初时在于稳定绥、宁两省后方，防止日本势力侵入。后因阿、额两旗毗连外蒙，阿旗并接近边区（解放区），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防共和边防的任务。该办事处的全称抗日时期为“军事委员会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办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则改为“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委员办事处”。专员为上校或少将级，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厅、军令部、行政院军政部及蒙藏委员会四个单位会派，人选则四个单位都可以推荐，一致通过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副专员为中校或上校级，则系应军统局的要求而设，为军统局派遣特务人员作“掩护身份”，故副专员只能由军统局派遣。该办事处的编制共官兵二十九名，专员副专员之下设秘书一人（中校），军需一人（上尉），副官数人（中尉或少尉），另“政宣室”和“参谋室”则系为掩护特务人员而设，并非该办事处原有编制。军令部第二厅边务处以阿旗为据点设有专对宁夏和边区（解放区）的军事情报组，后又改为专对外蒙的情报组（宁夏和边区情报业务改由该办事处直接负责）。该组所有人员以军事专员办事处政宣或参谋人员的身份为掩护，备有专用电台。专员有协助情报组进行工作的职责，并有直接使用该组电台与国防部通报的权力，但无指挥或干涉该组具体工作的权力，该组人事和经费都由边务处直接管理和拨发，与军事专员也不相干。副专员则仅为军统局工



作，与专员的职责各不相关，副专员对军统局直接负责，专员对国防部直接负责，边务处的情报组及其电台都与副专员无涉，只与专员发生联系，军专处的日常业务副专员可以过问和知情，但不负具体责任。至于专员、副专员、情报组长各自进行情报活动都互相保密，互不干涉各行其是，所以三方又有互相监视的权力。该办事处的经费包括副专员个人的薪资待遇，不包括活动费，也不包括情报组人员薪资和活动费，按原有编制由军政部按时拨发。专员的业务活动则由军令部（后为国防部）统一指挥。历任专员郑子猷、鲁邦道、崔骥、吴宗周、罗大燮等人。郑、鲁为军政部所推荐，崔为军委会办公厅所推荐，吴为蒙藏委员会所推荐，罗为军令部所推荐，均系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出身，为国民党老牌嫡系军官。副专员前后计有褚大公、卢景儒等人，则系军统局所培训的正牌特务（似系独立工作并不辖属情报组）。除军事情报外，该办事处的正常业务协助旗政府督办边防和教育训练地方保安部队等军事事项。但是除在鲁、崔两专员任内曾督促阿旗政府在外蒙边境银根等设立五个防卡外，其余历任专员都未能对阿旗军事事务有所干预，甚至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规定由该军事专员监发阿旗保安队军饷，借以检查部队是否满员，有无缺额和舞弊事情，该军事专员也不可能严肃认真，以讨好阿旗领袖息事宁人，巩固个人的身份地位。故军事专员办事处的设置，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严密控制军事和国防事项），仅能以情报为主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耳目，起到监视阿旗不致离心外向（投敌）的作用。这是因为达理札雅已经得到国民党统治阶层的依赖，政治地位很高，相对来说军事专员也有所顾忌不便控制过严，阿旗可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约束进而对中央政府进行抵制的原因。



## 六 在阿旗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政府设在阿旗的特务组织，可以分为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西北行辕二处四个系统。中统宁夏站在阿旗设有情报组，以王君惠为组长，备有专用电台，未悉有无武器；军统全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抗日战争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阿旗军统组织先是“蒙藏查缉所”，负责人宁阎强；后是情报组，负责人魏文锦，具有专用电台和武器；国防部二厅（原称军令部二厅边务处）阿旗情报组负责人先后计有周国良、叶志祥、罗大熠、李海平等，备有专用电台而无武器；西北行辕全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由第八战区长官部改组而来），设在兰州，后又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该行辕或公署第二处（政工处）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至三年内战期间，在阿旗设有情报组，负责人先后计有张开绪、燕振东等人，有无专用电台和武器则不确定；此外军专处副专员，也是军统工作人员，与军统阿旗情报组有无隶属关系不确定；另外还有一个“防奸处”（似为肃反会组织性质），而具体负责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旗政府秘书××担任（兼该处秘书），也是中统组织，一九四七年××离开阿旗以后该处似已不复存在；至于军事专员办事处则属国防部二厅系统，与该厅边务处阿旗情报组同时存在，主要是搜集阿旗、宁夏和外蒙方面的军事情报。

上述各系统特务组织都属秘密工作性质，一般都另有掩护身份。例如魏文锦是阿旗区防司令部少校参谋，阿旗政府磴口总管，周国良、叶志祥、李海平都是军事专员办事处参谋；燕振东、张开绪则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王君惠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阿拉善旗办事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表面看来从事的是“党务工作”；××是旗政府秘书。但是这些人员的特务身份都已暴

露，在阿旗人所共知，他们与阿旗军政领导往来应酬，他们自己之间也往来结交，他们虽然都不设置公开的特务机关（王君惠的办事处被达理札雅迫令撤销，蒙疆查缉所是财政部缉私机关，军专处是国防事务机构，本身都不是特务机关，而是被特务利用掩护身份的机关），对外不谈论各自的业务和内部情况，但在阿旗都是公开存在公开活动，人们习以为常，既不畏惧回避，也不引以为怪，这是其它地区特务组织所未见的特殊情况。盖因国民党政府对阿旗的政策只是消极地防止通敌（日本）或靠拢接近外蒙，其次则是防止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而对阿旗内政避免干涉，力求维持王公贵族的既得利益，以资怀柔羁縻绥靖边疆安定国防。故各系统特务组织在阿旗的作用，重点在于防止外部敌对势力的侵入，和切断阿旗的外部联系，对于阿旗内部的封建落后和腐败无能概取欢迎态度，决不横加指责。原阿旗统治者本身在国民党内也已得到宠信，特务组织虽然很多并不可怕，甚至有时还可利用他们在中央政府为阿旗“申张正义主持公道”（针对宁夏省），因而在阿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大都与阿旗统治阶层私情交厚，能得到阿旗的谅解和某些照顾，所以以公开身份讨好阿旗上层，活动更为方便。

在阿旗的特务组织——军统组织对阿旗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最大，军统进入阿旗始于抗日战争初期的“蒙疆查缉所”，该所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缉私机关，备有武装人员，而为军统控制从事特务活动，著名的“李子元共产党嫌疑案”即发生在这一时期。后来阿旗领导人鉴于可以利用军统的力量抗拒宁夏省马鸿逵对阿旗的并吞野心，遂同意本旗人魏文锦、张元忻等先后参加军统组织，赴重庆（抗日时期首都）接受培训后，回到阿旗建立军统阿旗情报组，并得阿旗方面的支持，掌握阿旗政府稽查局等单位，团结旗政府各级仕官，与宁夏省展开各种形式反并吞活动，终于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谅解，保全了阿旗的独立自主（自然此非军统

力量独立促成，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从此阿旗愈益依靠信赖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保障，与宁夏省分庭抗礼，这是军统组织在阿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其它特务组织所不及。军统组织的所有成员都以本旗人的资格得到阿旗领导人的信任，历任各种军政职务，与闻旗政府的机要大事，甚至在达理札雅“王府”内管理家务，成为达的心腹人员，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维护阿旗利益的缘故；另一面他们能够促进阿旗亲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安定边疆，也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嘉许寄予厚望。总之，当时军统组织能够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和阿旗地方政府双方面的欢心，是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一九四八年以后，魏文锦担任阿旗政府磴口总管，长期驻在磴口，定远营方面改由张元忻负责，军统组织在阿旗遂发展为两个活动据点，直至阿旗和平解放为止。

中统设在阿旗的情报组和防奸处，曾在阿旗各学校和社会人士中建立“党网”（通讯员）和“防奸小组”，顾名思义这是为了监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例如据我所知旗立完小教员赵鸿烈等即曾被该情报组指控为共产党。此外他们也监视中央政府派在阿旗的党政军特人员，向中央政府控告这些人员言行不正或贪污腐化等现象。这是因为中央人员都有监视达理札雅和阿旗其他领导人的作用，所以防奸处对于中央人员实行“反监视”。例如一九四四年军事专员崔骥就是被防奸处指控贪污腐化欺压商民等行为，以及在定远营商号中作非法摊派民不聊生等罪名，而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换的。

西北行辕二处设在阿旗的情报组发挥作用并不显著，他们不得地方长官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轲欢迎，与其他地方人士不熟悉，活动范围较小。然而一九四八年该组负责人燕振东曾在定远营擅自逮捕梁德山、胡开山、胡开科等三人，诬为共产党密探，犯下了滔天罪行（另文评述）。至于国防部二厅在阿旗的情报组

主要是针对外蒙，以收集外蒙军政情报为主，兼防阿旗政府和外蒙接近和往来。但因交通闭塞，中蒙关系断绝已久，该组人员甚少（只有三、四人），经费不足，本应驻在边境银根等地（该组的名称就叫做银根组），却因生活不便长期驻在定远营，工作无法开展，仅以道听途说或独撰假情报向上级敷衍塞责。故虽曾数次揭发阿旗政府“勾结外蒙”，却因证据不足情况不实，未被国民党政府重视。

此外尚须说明的是，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追随德王前来阿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蒙族人士中，有许多美帝新派的“潜伏特务”，其中有各蒙旗军政人员，知识青年，还有青年喇嘛。盖因当时内战已经临近结束阶段，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行将立脚不住，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各系统特务组织在阿旗均已身份暴露，以后无法继续存在而被抛弃，改由美帝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代为培训长期潜伏特务，重新派进阿旗，解放后四散秘密活动，但其详细情况局外人不得而知。

## 七 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阿旗的控制

兰州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统治西北甘、宁、青、新四省的军政中心。那时青海、宁夏、新疆三省分别为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盛世才所长期割据，中央政府在三省内政令不能贯彻。青海、宁夏两省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各行其是；新疆则公开“亲苏”成为独立王国，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甚至内地商民也不得进入新疆，直至一九四四年盛世才与苏联闹翻，新疆各族群众揭竿造反，盛世才的统治土崩瓦解，新疆才正式“归政中央”（归属于国民党政府）。只有甘肃省一直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盘，军政官员都由国民党政府直接任命（青、宁两省则不能由国民党政府擅自任免官吏，而是由两省当局报请任免，新疆更由盛世才

本人直接任官)。“中央军”也可在甘肃省随地驻军(其它三省则不可),所以甘肃省会兰州是国民党政府控制稳定西北四省的军政中心。抗日战争时期在兰州设置“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以朱绍良为长官,马步芳、马鸿逵、盛世才以及退缩在河套一隅的傅作义均为副长官。抗日战争结束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席蒋介石)。内战时期又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治中为长官,马步芳、马鸿逵、陶峙岳为副长官。阿旗因与宁夏省交恶极不相容,又因名义上直隶于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故虽地处宁夏境内,但一直不接受宁夏省的行政领导,并尽量避免与宁夏省接触往来。然而达理札雅却与朱绍良、张治中以及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私情交厚,故阿旗在兰州设置“驻兰州办事处”,接受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军事节制和行政领导。因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是国民党中央政府设在兰州的分支机构,甘、宁、青,新四省都在节制之列,阿旗系直隶于中央政府,接受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领导自是合理合法,宁夏省虽不称心,但也无可非议。

一九四七年内战全面爆发‘达理札雅亲赴南京晋见蒋介石,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批准,阿旗恢复成立“区防司令部”(由阿旗旧有的区防司令部改组并加以充实),由达理札雅亲任中将司令,下辖一个骑兵保安总队,由阿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轲任上校总队长,装备给养都按“国军”(国防军)同等待遇,由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就近按时拨发,并由长官公署直接辖属指挥,同时长官公署派来“军事教官”张甫廷就地监督指导保安总队的教育和训练事项。自此阿旗被置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直接控制之下,为国民党政府绥靖后方和安定边疆发挥作用。此外兰州长官公署还在阿旗大量采购骆驼,从事建设“骆驼兵团”,以适应在阿旗广大沙漠之中作战的需要,为“戡乱”军事增强力量,终因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兰州迅速解放,阿旗和平起义,骆驼兵团未能发挥作用。

一九四八年初,内战形势日趋紧张,青海、宁夏两路兵团负

有援陕（西安胡宗南部）、援榆（榆林邓宝珊部）、援包（包头董其武部）的军事任务，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设“前进指挥所”，以中将高参郑明轩为主任，先来阿旗视察防务，得到热烈欢迎。郑在阿旗共住十余天，曾集合旗属、省属和中央所属各军政机关首脑特别谈话，除赞扬马家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西北稳如泰山，及阿旗地方平静，边境（指外蒙）安谧十分欣慰外，并号召阿旗军民应以“破产保产，破家保家”（长官公署在内战时期的口号）的精神，团结纾难一致对敌（共产党）。此外郑对阿旗协理兼骑兵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轲十分赏识，建议长官公署聘任罗巴图孟轲为该公署“少将参议”，并由长官公署推荐中央政府增补罗巴图孟轲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未果实现）。当时榆林被“共军”（解放军）围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三县）吃紧，郑离阿后又赴宁夏及三边等地视察，并敦促马鸿逵以十余团的兵力大举援榆，终使榆林解围，“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得免于危。综上所述，可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阿旗十分重视，控制之严和期望之切确非寻常。

## 八 国民党政府在阿旗的其它设施

国民党政府在阿旗设有一些事业单位，计有交通部设置的邮政局、电信局（那时邮、电分属两个系统），卫生部设置的“阿旗卫生所”，教育部设置的“国立定远营小学”，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施惠”于边疆的设施，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德政”。其中阿旗卫生所虽然并未设置病床，尚不具备医院的规模，但在当时条件下，阿旗缺医少药，该所药品丰富，内外科医生如王增堂、李云南等都属“高手”，尤其是该所经费由中央政府卫生部直接拨发，十分充足，每天开门应诊，定远营各族居民看病吃药全部免费，另外每年该所还会同国民党阿旗党部卫生所合组“医疗队”



(以该所为主) 远赴牧区为牧民免费治病防疫颇受欢迎。

国立定远营小学系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蒙藏司直接管理并供给充足经费，校长张永成，教职员十余人，学生四百余名，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是六年制完全小学，设备尚属完善，免收学费，学生食宿校方不负责，但有时补助服装（制做统一的“童子军”服）。该校按教育部部颁“课程标准”教学，使用教育部编审的统一课本，有党义（三民主义）、公民（封建伦理道德和国民党政府法制教育内容）等课程，校内并有“童子军分团”（那时全国小学和初级中学学生都以学校为单位编入“童子军分团”，受教育部“童子军”总团统一领导，总团长为蒋介石。高中以上学生则有“军训”课程，由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派“军事教官”驻校主其事）及“学生自治会”（公民训练）等组织。应该说明的是，该校虽为国立小学待遇优厚，但却为阿旗政府所抵制，凡本旗所属蒙族、满族学生都不入该校读书，由旗政府自设定远营中心小学收容（亦为六年制完小），以致该校学生几乎全部是汉族子弟。甚至该校原定名称“国立宁夏定远营小学”也为旗政府反对而改为“国立定远营小学”。这是由于阿旗与宁夏省交恶，仇视“宁夏”字样，以及否定定远营属于宁夏省管辖的缘故。但该校校长张永成和全体教员则与阿旗各方相处融洽，往来无间。不论如何，该校为国民党政府“施惠”于边民，属于怀柔政策和“开发边疆”的一部分，无可非议。

至于邮政局、电信局两个单位纯属公益事业，解放前这样的单位为群众服务，对各族居民一视同仁，无瑕可疵，解放后两局职工一律留用继续为人民服务亦属公允。只是两个局长的表现颇为特殊，也是阿旗历史上的重要章节，则有记叙之必要：邮政局长尤剑秋，于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贺兰山郭匪叛乱之际（郭永胜原为宁夏军营长，宁夏解放后任贺兰山保安大队长，后又叛乱），参加兰州国民党地下组织“反共救国军”（据说在兰州有国民党



大员主持)，与×××勾结一起，企图拉拢郭匪，扩大反共武装，在阿旗复辟国民党反动统治。以致阿旗军警在和平起义后又有少数人勾结郭匪，背叛人民政府，妄想引导阿旗各族人民重新走上黑暗道路。例如阿旗设在贺兰山范家营子防卡上的士兵孟巴图尔等四人，就是因为已经通匪，枪击由银川返旗路过该防卡的共产党阿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及其通讯员二人致死（一九五〇年八月初），造成解放伊始就发生重大血案的惨痛事件（另文记述）。该尤剑秋及孟巴图尔等四人先后被宁夏军区逮捕（×××闻讯潜逃，后亦被捕），分别于银川及定远营两地处决。既而宁夏军区积极部署剿匪，解放军一个营驻防定远营，阿旗人民才获得安宁。电讯局长周明富则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底贺兰山郭匪率众六十余人夜袭定远营时被劫持，连同该局无线电台一部一并被押赴上山，匪众企图胁迫该周局长向兰州等地“反共救国军”匪伙通报，但因匆忙中忘记携带天线（实则周局长故意不带），郭匪的阴谋遂未得逞。周局长在山上被裹胁一星期风餐露宿，后乘黑夜匪众不备只身逃跑下山奔赴银川电信局始脱离险境（另文记述）。两个局长两种表现发人深省。

此外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兰州地质调查所每年派遣技正、技佐（技术职称）等数人前来阿旗一次，勘探贺兰山矿藏。据悉当时的勘探目标为铁矿，未悉成果如何，可能获得若干矿石样品和其它地质资料；另有兰州兽医学院于一九四八年亦两次派员前来调查阿旗骆驼防疫情况，拟议在阿旗定远营建立防疫站为蒙民造福，后亦未果实现。故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奢谈“开发边疆”，而实际并无建树。

## 九 宁夏省对阿旗的统治和压榨

阿旗在行政隶属上虽系直辖于中央政府行政院，受蒙藏委员

会的行政领导,但究其实际阿旗还是处在宁夏省的严密统治之下,与省辖其它各县的处境并无二致,“直隶中央”(政府)反而形成双重统治,苦难更加深重。

宁夏省驻定远营办事处并非省方与阿旗联络办事的机构。原来宁夏省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曾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和内政部,要求在定远营建立“紫湖设治局”(初具规模的县政府),辖区包括定远营和其附近的紫泥湖、头道湖、水磨沟、吉兰太等地。理由是设治(设县)后才能统筹管理“开发边疆”,而果然如此则阿旗的自主权利将被剥夺,属地将被分割。初时内政曾经“准予留案审查”,嗣完成立法手续(由立法院立法通过),即予正式成立。丁文江等编印通行的中国舆地图并已标明“紫湖设治局”的地点紫泥湖亦称定远营,后来才发现定远营和紫泥湖是两个地方,再版复印的舆地图又予更正,定远营之外有一个紫泥湖,只是“紫湖设治局”设在定远营。阿旗闻讯后大为恐慌,分别呈请行政院、内政部、蒙藏委员会坚决抗争,国民党政府鉴于阿旗在国防上处于重要地位,蒙、回隔阂有历史上的长期根源,宁夏统治当局是回族,与阿旗积恶成仇,省旗龃龉时有发生,在定远营设治(设县)诚恐引起民族纠纷,贻患无穷,因而一再迁延,终未予以正式批准,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为使边疆安定,此案遂被搁置再未提及。

然而宁夏省统治者马鸿逵在一九三八年以“通敌”(日本)的罪名攻陷定远营之后,即已设置“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初时以阿旗协理罗恩凯巴图充任该办事处主任,是为了缓和阿旗仕官和群众的反抗,罗徒为傀儡并不主事,实权操在省方所派副主任手中(后来干脆连主任也由省方直接委派)。省方以抗战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民党口号)为借口,利用该办事处在定远营编立保甲,行使行政权,征兵、征马、征驼,俨然是变相县政府。盖因国民党政府历来是军人专政,军权至上,马鸿逵是“第十七

集团军总司令”，拥兵称雄，霸占宁夏，为所欲为，俗称“土皇帝”。省方在定远营设立办事处管理汉族和回族居民，自然无可非议（蒙族管理蒙族，省县管理汉族和回族，叫做“分人而治”，是当时的合法制度，故有一地旗县两个政府并存的怪现象）。然而阿旗各族居民却从此被置于“中央”和宁夏省的双重统治桎梏之下。

更有甚者，为了镇压阿旗的反抗，宁夏省同时还在定远营长期驻军一个营，西花园（地名）有固定营房，西花园广场为练兵场，与驻防城内和西关的阿旗保安总队相互对峙昼夜戒备。更为难堪的是，一九四八年内战紧张阶段，省方借口伊盟某旗（鄂托克或乌审旗）保安队“勾结”陕北八路军“叛乱”，阿旗驻军应该加强戒备以防不测，竟命该工兵营于定远营市区三道桥构筑碉堡，射击口对准城门，这公然视阿旗为敌，一时人心惶惶，似乎灾难即将临头。对此阿旗政府不敢有所异议，只是暗自戒备罢了，故省方驻军的作用不言而喻是为了镇慑阿旗，使之服从省方的管制。

此外宁夏省在定远营设置“军警督察处”，负有缉私、查店（旅店货栈）等任务，以致省方特务人员往来于银川和定远营之间，作为省方耳目监视阿旗的动向。同时该督察处还在定远营“档粮”（禁运粮食来阿旗），商民由宁夏农区贩运粮食前来阿旗，一经查获，人畜拘留粮食全部没收，商民资本亏折叫苦连天，定远营粮价常高于宁夏十分之四、五。斗升小民艰不堪言，旗政府只好视而不见无可奈何。

经济上宁夏省对阿旗的最大压榨莫过于统制皮毛。阿旗为纯粹牧区，广大牧民衣食之源全赖于皮毛收入，皮毛被省方统制则阿旗经济命脉即被操纵。其具体办法是由省方所设的“富宁公司”全盘统制阿旗的皮毛收购和外销业务。阿旗盛产羊毛、驼毛，年产数量以百万斤计（确数未详），十之八九须经富宁公司收购，

一般商民零星收购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该公司属宁夏省银行管理（实际是马鸿逵私人的银行和公司，不受国家财政、经济部门的节制），资本雄厚，于牧区广大牧民中发放“牧业贷款”，年息三至五厘，每年春秋两季按官价（常低于市价三分之一）收购牧民的皮毛（主要是羊毛、驼毛，羊皮则全部官价归公，那时宰羊不限制，但须如数上缴羊皮），如此高利放款低价收毛，两项残酷剥削为省方的大宗经济收益（确数不详）。同时这样的剥削为省方特权，其他私人商号甚至国家银行都不得与之竞争。例如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都在宁夏设有支行，但却不可能在阿旗发放“牧业贷款”，否则省方即加取缔。国家银行在阿旗无事可做，都不在阿旗设立分行，以致连汇兑业务也不能开展，商民小宗汇兑可由邮政局办理，但大宗汇兑，尤其中央政府设在阿旗的党政军机关和其它事业的经费，都只能由中央政府各部门分别拨汇银川国家银行，然后由各该机关单位派员赴银川领取，十分不便，这都是宁夏省以行政和军事压力造成畸形——不合理经济现象，其目的是便于省方在阿旗的经济统制——垄断专利。国民党政府鉴于宁夏是军阀割据的地盘，出于“国家统一”（使省方表面服从中央政令）和边疆稳定（不闹事）的考虑，自然不便和省方争利，只得迁就省方，以达到怀柔（对宁夏省也是怀柔政策）的目的。

解放前包兰铁路尚未修筑，宁夏全境皮毛须驼运至包头，由包头“皮毛行”收购转由铁路运往天津出口（有时外商也直接派员——华人买办来包头坐地收购），换回现金或布匹杂货（多为布匹）。富宁公司在阿旗收购的皮毛也是经由这样的途径出口（国内毛纺工业很少，没有皮毛市场）。所以外轮过天津港口时急待装运，包头及天津毛价即行骤涨，外轮去后无人收购（因不能外运，须积压资金并消耗货栈管理费用），则毛价暴跌。富宁公司因有雄厚资本可以大量屯积等待下次外轮前来毛价上涨时再行出口，仍

然可获大宗利润。小本经营的私人商号则无资金可供积压，无法等待无定期的外轮前来，往往缩手缩脚不敢收进。而一旦外轮前来收购不及，则坐失良机利润丧失，又悔之不及。这是旧中国殖民地经济依赖外商的必然现象，也是官僚资本统制物产垄断国内市场大发横财的原因所在。所苦者不过是小商小贩，因“大鱼吃小鱼”而经济破产，广大劳苦群众被残酷掠夺生活更加艰难。

## 十 国民党政府对阿旗的最后一次希望

综合上述各节，国民党政府对阿旗的统治和经营，自抗日战争以至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可谓登峰造极大有可观，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陆全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对于阿旗仍然寄予莫大的期望，其战略目标是以阿旗为中心，团结绥、宁各蒙旗，与宁、青马家军蒙回合作稳定大西北。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不惜起用野心叵测和桀骜不驯的德王前来阿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当时阿旗是全国瞩目的战略要地，西北局势的安危，端赖德王事业的成败。为示讨好蒙古民族，并便于统筹支持德王的奔走部署，国民党中央政府主管蒙古事务的最高机关——蒙藏委员会实行改组，由国民党元老，蒙古民族中威望攸归的白云梯出任委员长。在国民党政府其它党政军机关任职的高级蒙族人士，以及蒙族国大代表，立法和监察委员也一致赞助德王的事业，并亲自前来阿旗共襄盛举。驻在北平的国民党“华北蒙旗党务特派员”何兆麟（热河蒙族），于北平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初）奉命陪送德王由北平前往南京、广州等地活动，辗转来到阿旗。住在兰州的国民党政府骑兵师长白海风和“绥远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巴文俊（白、巴均为土默特蒙族），也一同赶来阿旗为德王图谋策划，并一致出任“蒙古自治政府”的领导职务。以上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处心积虑为

“保卫大西北”所作出的最大努力，而阿旗附和这一努力则是重要的一环。但因内战形势急转直下，西安、兰州、银川相继解放，阿旗在达理札雅先生率部下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希望终未得逞。

总而言之，国民党政府对阿旗的统治，既有严密控制残酷打击的一面，也有予而不取宽大拉拢的一面，可谓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是历来反动统治者惯用的大汉族主义和愚民政策，其实质依然是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三民主义标榜民族平等自治自决，不过徒托空言毫无实际。回顾历史抚今追昔，人们不难作出公正的结论。

---

## 乌 滂 守 备 队

德王的乌滂守备队五百名，保安队三百名，王府卫队百余名，学生队八十名。乌滂守备队成立于一九二六年，它之经费每月由察哈尔省政府补助四千元，担任滂江（今内蒙古西苏旗境内，蒙古地名哈木呼，意为“野狼”，蒙古人回避该名词）至乌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乌得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商队（当时佯称德华洋行）安全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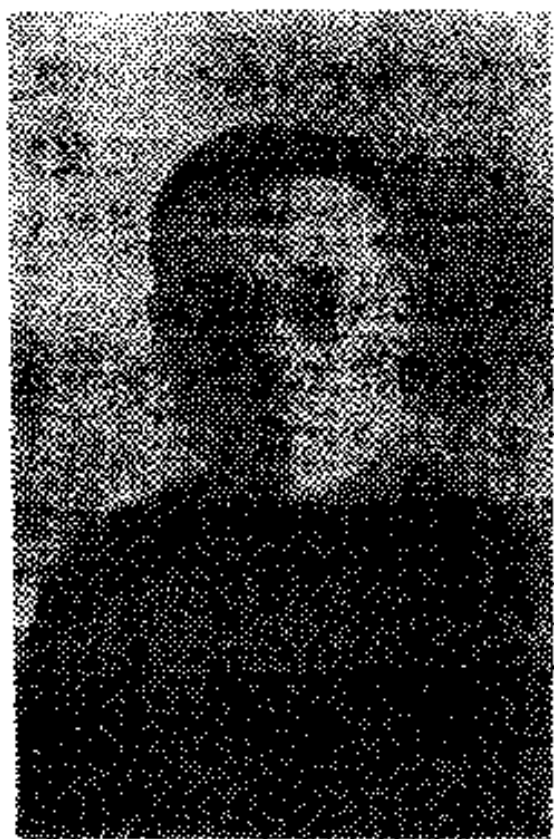
---

# 我们所知道的达理札雅先生

辛文秀 布音孟柯 玛希巴图

**编者按：**原文发表于《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六辑，这次我们刊用时，召集有关知情者，向他们广泛征求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以此说明。

## 一 青年时期



达理札雅字锐荪，于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腊月十二日出生在阿拉善霍硕特旗的定远营。其父塔旺布鲁克甲勒，母名姜静德，共生他们兄弟姊妹五人，他同胞兄幼小夭折，二弟名达都拉旺希格，三弟名达穆林旺楚克，妹名塔祉华。

达理札雅的幼年时代是以阿拉善霍硕特亲王的阿哥身份度过的，其母太福晋姜氏夫人，出自名门，知书识礼，教子甚

严。他在慈母的管教下，自幼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以他天性聪颖，在封建的王公家庭中形成了浓厚的道德伦理观念。



在他十四岁时，其父塔旺布鲁克甲勒携眷居住北京。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政府成立，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塔王曾积极赞助共和，并出任袁世凯政府的京都翊卫使和蒙藏院总裁等职务，因而全家长住北京。

此时的达理札雅正值少年时期，生活习惯已完全城市化了，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并在北京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先跟汉文老师张煜学习汉文，主要课程为四书五经，嗣后又从师蒋先生学习英法文，后又跟阿旗蒙文化程度很高的俞世珍老先生学习蒙文。在老师的精心教导和父母督促指教下，他的学业进步很快，尤其是汉文程度较好，阅读、写作能力大进。

那时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五四”运动后，欧美各国的民主进步思潮和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各方面的革新人物纷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集会结社、建立党派，大力提倡新学，进行革命。

此时住在北京的达理札雅，当然也接触了许多新学知识，经常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广开见闻，并在北京社会上广泛交游，曾和当时的一些名流人物交朋友，如张学良、于学忠、宋哲元等人他都和他有交往，他还曾担任过袁世凯总统的侍卫武官。

同这些人的交往中，极大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政治视野、人情世故等方面的知识，对未来的事业上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在思想、性格、情操等各方面也都日渐成熟，思想已倾向于民主进步。他天性孝友，性情敦厚温和，待下宽厚，平易近人，很少有一般贵族家子弟的纨绔习气。

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他还兼习骑射，尤其对马匹有特殊爱好，曾畜养名马四十余匹，指派专人喂养，雇用有名骑师为他调教训练马匹。他本人的骑马技术是很精良的，经常带领下属及侍卫人员跑马射击为乐。他还有另一爱好就是照相。大公报社的名记者范长江在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曾写道：“骑马，打

枪，照相是达王的三大爱好”。

由于年龄的增长，他已到了结婚年纪，于是和晚清皇室贝勒载涛之女金允诚婚配，婚后伉俪情笃，相敬如宾，先后生下六女一子。

在此期间，发生了不幸事故，即一九三一年春，他二弟达都勒旺希格在北京死于车祸，弟媳服毒殉节。年老的父王因爱子的不幸，悲痛万千，思念成疾，也于同年七月谢世！

塔王逝世后，当即呈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旋即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按蒙旗惯例，正式任命达理札雅继承父职，为阿拉善霍硕特旗札萨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北京府邸就职，受到北京有关方面的大员及友好人士的祝贺。

## 二 袭位后的事迹

阿拉善旗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地面积十八万平方公里，有广阔的牧场；有丰富的煤、盐、硝等矿产资源；还有名贵的药材。虽有如此丰富的物产，但是因地处荒漠偏僻，人烟稀少，风大雨少，交通闭塞，与外界很少往来。加之缺少文化知识，牧业生产落后，牧民生活贫困，除负担王府及旗衙门征收的包道税和差役外，还要受寺庙和商人的剥削。

由于各种剥削压榨，使得广大牧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一但遇到大旱之年，牲畜死亡，粮食短缺，牧民群众只有在饥饿线上挣扎了。

民国初年，因老王爷塔旺布鲁克甲勒在北洋政府供职长住北京，旗内政务委托当时的协理、章京及几个有声望的贵族台吉管理，除有重大事件，派员赴北京请示外，一般事务只是照章行事。但时间一长，便产生矛盾，加上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影响，使这些人为了争权夺利，互不团结，发生磨擦，各自为政。塔王离

阿旗近二十年内，曾连续发生了几起武装内乱的小三爷事件、南寺活佛和毛巴图尔事件等。这些武装叛乱，造成阿拉善旗政治上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局面，极大的破坏了牧业生产，加之连年干旱，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侵袭下，使全旗牧民陷入更加贫困的深渊。

达理札雅正是在这种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牧民生活极端贫困的严重时刻，承袭阿旗札萨克职务的。在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达理札雅并没有畏难退缩，而是以继承祖宗基业，造福于全旗牧民群众的远大理想，毅然肩负起阿拉善霍硕特旗札萨克职务。他首先团结旗内上层人物和贵族，取得他们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蒙旗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沿用满清时代的王公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改变的，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按旧制只任命一个札萨克执掌旗政外，对旗内具体军政事务则不予过问，蒙旗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

当达理札雅担任札萨克后，虽然极力革新，但也局限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完全废除王公制度。他采取的是折衷办法，保留了部分旧制度，也采用了一些新办法。首先撤消了旧衙门（也称印房），成立了新的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他任札萨克，札萨克下设正副二协理，为札萨克的助手，协助札萨克处理全旗军政事务。协理之下设管旗章京数人，为行政事务的执行人，以下设立具体办事机构，计有四个处：政务处、财政处、秘书处、教育处。司法方面，将旧有的听差处（也叫堆子），改为理事官厅。定远营城内设立了综合性机构，名称为定远营稽查局，用以处理汉、回等族居民和商人的行政事宜，办理警务和地方税收工作。

旗以下划为三十六个巴格（相当于乡），管理牧区地方行政事务。又在与外界发生事务较多的磴口、四坝、东努尔盖等地设立三个总管公署，处理汉民和旅蒙商的一般事务。

人事上，选拨了一批有声望、有资历而又具有一定工作能力

和文化知识的中青年人士进入旗政府任职。如任命罗恩凯巴图和罗巴图孟柯为正副协理，任命陈爱尔德尼巴图、段巴图尔、白图布巴依尔为正副管旗章京。任命陈那笋巴图、胡艾立佐巴依尔、黄孟柯艾立佐、李巧格登、左甲木英敖迪布、金对岱、罗月亭、俞世珍、谢尚德等人为旗政府各处正副主任；任命达尔扎布（张仁）为理事官厅总管；张元忻为稽查局局长；艾尔肯木（杨富存）为磴口总管；司巧英为奴尔盖总管。聘用文化程度高而富有行政工作经验的汉人担任旗政府秘书长或秘书职务，负责对外公文起草事项。

各巴格也都选用正直而能干的人担任巴格达木尔和保什哈，这就使旗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地方组织健全完善。

从此之后，立即下令废除旧的陈规陋习，免除封建的跪拜大礼，上下老幼之间以及社会交往中，一律实行鞠躬礼。裁减府内夫役，缩减王府开支，减轻财政负担。

一切公职人员的待遇则仍沿用旧的义务轮换制。上班期间由财政处发给口粮、砖茶等生活用品，其他自理。

接着发布了禁烟、禁赌、禁娼等禁令。严禁盗匪及一切奸宄宵小的不法行为，使全旗各族人民各安其业。

**2、军事方面：**建立了八个保安大队，这八个大队是在满清政府颁令建立的阿拉善霍硕特旗亲王亲兵马队的基础上改建的。任命罗曹格图盖力勒、杨富存等人为各大队长。兵员无定额，沿用历代传下来的寓兵于牧的政策。凡旗内蒙族男性青年，年满十八岁的都要服兵役。平时大部分人在家放牧或打猎，只有少数士兵在旗政府执行保卫任务和维持地方治安，或供其他方面差遣之用，也是轮换制，两个月换班一次。如有重大事变，需用武力时，一声令下，就可以全旗动员，凡是青壮男子，都能自带枪马集中待命。新建立的保安大队概仍其旧，只是在武器装备上和士兵待遇上进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通过他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私人交情，由张学良给补充一批武器弹药。又由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拨给步枪五百支，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若干挺，更换了原来使用的火枪、老套筒等旧式武器，增强了战斗力。

官兵待遇，在上班期间除供给原定的军粮四十五斤，砖茶一块，燃料若干并发给少数另用钱，还发给军装。

聘用汉族教官，以新式操法训练士兵，并曾举办了两期军事训练班，受训人数一百多名，培养骨干力量。

阿拉善旗原在贺兰山各山口及边界周围各个重要道路口，设有边卡四十余处，各派卡长一名，卡兵若干名，用以防守边界，盘查行人，防范盗贼土匪，向旗政府报告消息，对这些防卡也进行了整顿，任用年轻能干的人担任卡长，加强了边防。

**3、财政税收方面：**阿拉善旗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农业很少，只有东北部的磴口至四坝一带有农田五万余亩。沿贺兰山的水土条件较好的沟口和定远营城周围也有一些耕地，约万余亩。

由于经常受旱灾的威胁，阿旗牧业生产落后，牧民生活贫困，而磴口一带农田之利，又于一九〇一年因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趁光绪庚子赔款机会，三圣公天主教堂提出赔款要求，遂定由阿拉善旗赔银五万两，当时阿旗只能交白银二万两，尚欠三万两无力交出，为此教堂方面提出三圣公一带的土地作为抵偿。无乃，把三圣公一带的土地为期十年租给教堂所有。因而多年来阿旗财政收入很少，入不付出，左支右绌。

达理札雅继位后，对这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于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对教案进行清理，收回全部土地所有权，与教堂重新订立合同，令其向旗政府交纳租粮，充实了府库。

阿旗有号称“聚宝盆”的大小盐湖多处，储量丰富，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也是地方财源之一，已开采的有吉

兰太、雅布赖、查干布鲁格、和屯敖包等四大盐湖。多年来都是由官商合资的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年产食盐约数十万担，绝大部分利润均为盐务局所得，阿旗只能收极少数池租，对此也采取措施，设立了自己的盐务所，派陈爱尔德尼巴图为所长，由本旗在吉兰太、和屯敖包开采经营一部份。其他因本旗资金、人力不足，无力开采，仍由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池租作了合理规定，盐务局按年向旗政府交纳。

贺兰山一带煤的储量十分丰富，多年来也都是由富户、把头承包开采，从中牟利，而旗上则没有什么收益。因此对煤矿也加以整顿，将产量大的河拐子（即现在的乌达煤矿）收回，由旗政府派员经营开采。其他几处较小的如呼鲁斯太、古拉本等矿，仍以合理租金包给私人开采。

定远营是旗政府所在地，近百年来就已形成集镇。至民国初年已十分繁华，俗有王爷府“小北京”之称。镇内有大小商号数十家；各种手工业作坊近百家；粮店、旅店十余家；饭馆近十余家。商业交易十分活跃。因其地位适中，东可通宁夏、包、绥以至京津等地，南至甘肃的兰州、平凉及河西的武威张掖等地和青海西宁。北至河套，均有驼马大道相通。每到秋冬季节，骆驼起场后，四方商旅、农牧民云集，进行交易活动，市面一派繁荣景象，是阿旗的主要税源。对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在定远营稽查局内设立税务股，专司税收工作。参照邻近各地收税办法，制定合理税率，向商民征收一定税金。

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得力措施，使阿旗政府的财政面貌大为改观，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4、兴办教育：**在达理札雅继位前的阿拉善旗，从来没有学校，识字的人很少。除政府官员一般都能粗通文字外，全旗牧民几乎全是文盲。记得民国初年只在定远营有三名蒙汉文私人塾师设私塾授徒。再就是旧印房有达司呼即练习生制，选拔青年到衙

门学习蒙文。成绩好的可充当下级官吏，除此再无别的教育设施。

在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着手兴办教育事业，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在定远营设旗立完全小学一所，分蒙汉文两个部份。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任命蒙汉文兼优的公爷塔旺策林为校长，聘用蒙汉文教师数人任教。所授课本是国民党教育部颁行的白话文标准课本，蒙文教材仍用旧本教读。在他的府内设立初级女子小学一所，由他的夫人金允诚亲自担任校长，其后在定远营又设立一所蒙文小学，专收牧区儿童。在磴口设立初级小学一所。这些学校的学费完全是公费，随着入学学生的增加，学校逐年都有扩大，教员人数由原来四五人增加到二十余人。还办了一个简易师范班，培养师资，并把本旗高小毕业生保送到兰州中学、兰州女中、兰州师范、陇东师范、宁夏黄渠桥的绥宁师范等中等学校深造，为本旗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材。

由于上述各项有力措施的执行，使阿拉善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上下齐心协力发展生产的政治局势，初步改变了广大牧民的贫困面貌。加之那几年气候转好，风调雨顺，普降大雨，广阔的草原，到处牧草丰茂，大小牲畜膘肥体壮，牧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广大牧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人欢马壮的兴旺景象。

曾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秋季，在定远营城东郊贺兰山脚下的大草滩上，举办了一次数十年未曾举办过的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在大会上进行了蒙古民族传统的文娱体育活动。全旗大部分牧民，携带帐篷、马匹前来参加。邻近各地的商贩们，也驮载百货前来赶会。这次盛会历时二十余日，热闹非凡，盛况空前，也是当时阿拉善旗繁荣兴旺的标志。



### 三 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马鸿逵 反动势力周旋执争经过

正当达理札雅整顿旗务,带领全旗牧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并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刻,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阿拉善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首先是国民党加紧对这块边疆要地的控制,设立军事专员办事处;蒙藏委员会派来协赞专员,驻在定远营就近监督,建立了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三青团阿拉善旗分团部;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也建立了秘密组织,进行活动。

对国民党的监督、控制,他是无法摆脱的。只能以消极态度与之应付、周旋,以保阿旗安宁。

其次是盘踞宁夏的军阀马鸿逵,早就想把阿拉善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地盘,实现其扩张野心。他以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蒙汉分治的幌子,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强行割去阿旗磴口巴格的大片土地,设立了磴口县。抗日战争初在定远营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阿拉善旗分处,接管市镇的行政工作。在市区内建立保甲,清查户口,为其征兵、收税,又派来宁夏省银行办事处,后改为富宁商行办事处;还设立了一个木料场;派来马宝琳的警备旅驻礼定远营,从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控制了阿拉善旗。

对马鸿逵的这种扩张野心,达理札雅采取的是抗拒办法,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马鸿逵在强占磴口巴格,设立磴口县之后,要在三圣公建造一座城池。此事即遭到阿旗政府的拒绝,并曾使用了武力,迫使马鸿逵取消建城打算。

在定远营镇内加强充实稽查局。在稽局警务股下设一个四十余人的警察队,理事官厅增设三十余人的法警队。并对保甲长、

商会、各手工业行会加以控制，严格禁止保甲长到牧区及定远营城内抓兵。用这些办法与马家势力抗衡，这就触怒了马鸿逵，他便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初，以三个团的兵力围攻定远营，收缴了全部武器和无线电台，强迫达理札雅全家离开阿旗，送往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处软禁达七年之久。

同时马鸿逵对阿旗又使出更加恶毒的手段，实行粮食封锁，想把阿旗人民饿死，他严禁宁夏一带的粮食进入阿旗，由他的军警联合督察处在定远营周围各主要交通要道日夜巡逻，抓获贩运粮食的商贩、驮户，人即治罪，车马、骆驼、粮食等充公，造成阿旗境内粮食奇缺，粮价飞涨，广大劳苦大众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而一些有势力的官僚、奸商趁机屯积居奇，大发横财。

当达理札雅全家被软禁兰州期间，旗内事务则由协理罗恩凯巴图、罗巴图孟柯、章京陈爱尔德呢巴图、段巴图尔、白诚禧等人主持。而他本人虽是身在兰州而心怀故土，经常与旗内函电往还，遇有重大事务则派人联系，指示办法，与国民党应付，与马鸿逵抗争，终于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精神，保住了城镇，稳定了牧区。

趁达理札雅离开旗下之机，马鸿逵又要出花招，以抗战需要为名，编造一些毫无根据的理由，呈报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要在定远营设县，企图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改为县政府，与旗政府对立，造成旗县并存局面。

达理札雅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罗巴图孟柯等取得联系，以阿旗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数百年来都是直属中央政府领导为根据，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举出充足理由，急向蒙藏委员会和第八战区长官部具文呈报，指出定远营不能设县。实际上蒋与马之间是有矛盾的，国民党并不希望马鸿逵的势力扩大，这份呈文报上去后，经蒙藏委员会慎重考虑后，对马鸿逵在定远营设县的报告未予批准。这个阴谋被戳穿，使马鸿逵大为恼

火，曾下令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和驻军把起草这份呈文的秘书王克昌抓往银川处置，幸好旗政府早有准备，暗中派人把王从草地护送兰州，王秘书才幸免于难。

对于他被软禁的不幸事件，他曾费尽周折，亲赴重庆向国民党当局申辩并揭露马鸿逵的扩张野心和对他的诬陷。后又经旗内上层人士罗巴图孟柯、罗恩凯巴图、陈爱尔德尼巴图、段巴图尔、张仁、张元忻等人联名上书蒙藏委员会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申述蒙民对达的深厚民族感情，强烈要求达理札雅回旗执掌旗政，如使他久居兰州，则恐地方生变。这样才迫使蒋、马同意让他回旗。于是他于一九四四年八月携眷由兰州回到阿旗，受到政府官员和牧民的热烈欢迎。

此时抗日战争已近尾声，胜利在望，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准备大打内战，因而对达理札雅的办法也有所改变，由原来的监视、控制改为拉拢、利用，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将銜区防司令部司令等职务。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开始发给粮饷、装备，扩充原有的区防司令部机构，下属一个骑兵保安总队，总队下属五个中队，一个通讯分队，一个勤务分队。共有官兵一千三百余人，战马一千余匹，骆驼四百余峰，作为地方保安团队。

国民党特别党部，三青团分团部，专员办事处等机构此时则加紧进行反共宣传活动，为大打内战制造声势。

但是达理札雅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政策，并没有积极执行。他所抱的宗旨是继承祖业，保境安民。对国民党消极应付，在旗内一面操练士兵保卫地方；一面安抚牧民，加强团结，安心生产。

此时的马鸿逵并未放弃其向阿旗扩张的野心。他积极配合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定远营大肆抓兵、征税，经常派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驻守镇压，使得这一时期的定远营百业凋敝，居民四散逃亡，整个镇内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男子的踪影，市面一片萧

条。当实在无兵可抓时，就改用以马代丁或以骆驼代丁的办法进行压榨。其办法是以四匹好马顶一个兵，或四峰骆驼顶一个兵，残酷压榨老百姓，造成商号倒闭，民不聊生，广大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人民群众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苛政是恨之入骨的。

时至一九四九年，当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在全国各战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彻底垮台时，定远营又演出了一场令人发笑的闹剧，那就是以德王为首的所谓“蒙古自治”活动，他们经过几个月上跳下窜，多方活动，于一九四九年七月急急忙忙在定远营组成了蒙古自治政府。在这场闹剧中他虽被选为副主席，但内心思想并不赞同德李一伙的这种作法，只是因为当时的阿拉善旗还处于各种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迫于形势，只能虚与委蛇，应付而已！他的继承祖业、保境安民的宗旨，并未改变，他曾向旗府官员们表示说：他们失去地盘才跑到我们阿拉善旗来搞蒙古自治的，不是我请来的，他们搞的是蒙古自治运动，在这顶大帽子下面我们不能拒绝他们，但是我们也要绝对保持阿拉善旗的独立性，不能让他们插手或干预我们的旗政。

这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迅速上崩瓦解。西北重镇兰州就要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眼看大势已去。顽固到底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苏和巴图尔等于九月二十日率领残部，匆忙逃出定远营，向中蒙边界的土克木庙、沙尔札、拐子湖一带流窜去了，变成一群流寇，给阿旗北部牧民带来极大祸害。从此，成立不足两个月的蒙古自治政府便短命夭亡。

## 四 和平起义

当国民党反动政权在祖国大陆立足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的时候，反动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利用马鸿逵的残余兵力，组成宁夏兵团，以马鸿逵之次子马敦静为司令，妄想利用贺兰山天然屏障，设防阻止大西北的解放，特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从广州飞来宁夏和绥西陕坝，给这一带的残余势力打气，妄想把河套地区残余反动武力和宁夏马家军撮合在一起，抗拒大西北的解放。

当一九四九年七月徐永昌飞抵银川后，即用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和他见面。当时达理札雅和白海风及他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去银川与徐永昌会面。见面后，徐首先谈了一下当前国内的形势和宁夏地区军事部署情况后，便向达理札雅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关于马家军在贺兰山设防问题，这事至关重要，阿拉善旗必须大力支持，以便贺兰山的防务设施早日建成。第二关于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与德李的新一旅配合问题，必须抓紧进行，以期在贺兰山以北的大草原开展游击战。至于武器弹药以及一切军用物资，可以空运补给，并胡说只要能坚持三年，国军便能反攻回来。第三个问题是徐再三拉拢达理札雅去台湾，并说住在大陆上有危险，人身、财产都不安全。与此同时马敦静也向达理札雅施加压力，提出要阿拉善旗支援他军马三百匹，全付鞍具的运输骆驼一千峰。

此时，达理札雅的头脑是清醒的，冷静的，既没有被徐永昌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也没有被马敦静的威胁所屈服。他首先向徐永昌表示决不去广州和台湾。对马敦静的要求，则用拖延应付的办法，以天旱驼马乏力，无法征用为词，推掉了事。

实际上，此时的达理札雅早已在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了。面

对现实，自己将如何办？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率领全旗各族人民和平起义，站到人民一边来；另一条是自己携眷外逃，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到底，走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何去何从？在选择上他曾感到犹豫、徬徨，有些举棋不定。但在思想上，早已倾向于前一条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达理札雅对和平起义，思想上已经有了准备。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与思考，他的思想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政治态度，也日趋于明朗化。特别是当他听到老朋友张治中将军脱离国民党政府，到革命阵营中来的消息，对他的思想启发更大。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兰州进军之际，适值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门正在兰州公干，达理札雅遂电令朱门就近与西北野战军取得联系。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阿拉善旗代表朱门，随同兰州各界民主人士、起义人员欢迎了西北野战军，晋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彭总见了很高兴地说：“达理札雅先生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随后让联络部长范明转告朱门随十九兵团赴宁夏，早日返回定远营。朱门一回来就他在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的情况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向达理札雅及政府官员们作了详细汇报。大家是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态度，感到亲切、温暖，心中有了底，消除了疑虑。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以阿拉善霍硕特旗扎萨克的名义，代表全旗向会议主席毛泽东发去致敬电。电报内容大意是：热忱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现在我郑重宣布，我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束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分别向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发去了电报，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阿拉善旗，并派出罗瑞光、张光耀、

司乌图那筭，翻译蒙太等人星夜前往银川黄河渡口仁存渡欢迎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会见时杨司令员对阿拉善旗的行动甚表满意，重申了不向阿拉善旗进军的决定，要求蒙旗地方部队，要确保地方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邀请达理札雅在适当的时候来银川会晤，当面商谈阿旗起义后的有关事项。达理札雅便于十月十一日亲自前往银川，受到了杨司令员和宁夏省党政军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使达理札雅深感安慰和鼓舞。经过会谈达成了有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口头协议。

从此，一个完整无缺的阿拉善霍硕特旗，在达理札雅的率领下，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祖国的和平统一，各民族的大团结，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一定的贡献。

达理札雅的这一爱国明智行动，是他一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由一个封建王公出身的人，经过许多坎坷曲折的道路，冲破蒋马反动势力的阻挠，终于投入伟大革命阵营中来，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他的这一行动是正义的，称得上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人们赞颂的！

达理札雅便依据宁夏省委和军管会关于处理阿拉善旗和平起义的口头协议，着手作好旗政府改组和军队整编的准备工作。

同年十月间宁夏省委派云祥生、郭全德等人带领工作组来到阿旗工作，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由曹动之任书记，云祥生为副书记。从此，阿拉善旗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民主建政和改革工作。

首先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原则，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将旧旗政府改组为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达理札雅为主席，罗巴图孟柯、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副主席。并以曹动之、段巴图尔等十六人组成政府委员会，以巴文峻为秘书长，以李文钦、朱门为副秘书长。



在旗人民政府下设的职能机构有：政务处，处长胡艾立佐巴依尔；财政处，处长左甲木英敖迪布；文教处，处长齐图门巴雅尔（齐文魁）；秘书处，处长谢尚德；生产事业处，处长张仁；卫生保健处，处长王栋云；公安局，局长斯琴别力格（李树德）；人民法厅，法官于培根。基层三十六个巴格也都建立了巴格人民政府。

撤销了区防司令部，将骑兵保安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任命罗巴图孟柯为总队长，朱子春为政治委员，罗曹格图盖立勒（罗瑞光）为副总队长，罗布音特古勒德尔（罗永寿）为参谋长。

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诞生，标志着统治阿拉善旗有二百六十多年历史的封建制度的结束。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全旗各族人民充分地享受着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

自从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有：（一）在旗与巴格之间，建立了区一级的苏木公署六个，成立了苏木工委，加强了党对牧区的领导；（二）根据党对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份，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原则，规定了牧工的合理报酬，促使牧业生产的大发展，牲畜头数迅速增加；（三）调整了定远营市区的房租，并承认了回、汉族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四）在磴口县实行土地改革，将旗地、庙地及上层人士的私有土地分给了农民；（五）八大寺的大喇嘛、僧官由寺庙自由选举，政府不再任命；（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全旗各族人民捐献人民币一百六十多万元；（七）根据宪法实行普选，召开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八）在达理札雅的带动下，政府官员与富户，把他们在定远营四郊及沿贺兰山一带所有的土地，自愿献出，分给农民，实现了定远营地区和沿山

四巴格的农业合作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动下，又实现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曾于一九五二年七月间，召开了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那达慕大会，用以庆祝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参加大会的牧（农）民共一万五千余人，会上进行了民族传统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和球类、田径等比赛，宁夏省党政领导对此也非常重视，副主席孙殿才、马腾霄等领导同志都来祝贺，还带来歌舞团、电影队为大会助兴。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可以说是阿拉善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盛会。

至一九五四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阿拉善旗自治区划归甘肃省领导，改为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达理札雅担任州长，并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一九五六年划归内蒙后，又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达理札雅仍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盟盟长，还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担任上述各项重要领导职务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他一直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五 文革中的不幸

当达理札雅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许多革命老前辈，各民主党派，各界专家学者，知名人士都遭受迫害，有的致死。达理札雅这样一个封建王公出身

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他的家遭到冲击、抄查，财物被劫持一空；在巴彦浩特镇的祖坟被挖掘，灵堂被折毁，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此时的达理札雅，因年老体弱，患了严重疾病，与年老多病的夫人金允诚居北京住宅，在家休养。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的追随者，还不放松对他的迫害。最后派去“红卫兵”多人，到北京把达理札雅揪回呼和浩特又转前巴盟公署所在地巴彦高勒市批斗，终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在巴盟二中批斗时，死在会场上！

我们认为达理札雅先生的一生是值得赞颂的，他自从一九三一年二十八岁时起，承袭父职，执掌阿拉善旗旗政以来，费尽心机，历经许多艰难险阻，团结全旗人民，为阿拉善旗的地方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维护阿旗这块边防要地的完整和广大牧民群众的利益，费尽苦心，竭尽全力，与蒋马反动势力进行不懈地斗争，因此，曾被蒋马反动派软禁于兰州达七年之久，始终没有被蒋马反动派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所屈服。

当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即将胜利的时刻，他又机智地摆脱蒋马反动派和德李一伙的种种阻挠，毅然率部起义，为解放阿拉善旗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的这一功绩是肯定的。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对达理札雅先生十分关心，曾几次接见过他，当面教育、鼓励他，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曾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敬献锦旗，以表示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的忠心。他关心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蒙古民族中的上层人物，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进步思想的人士，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的反革

命极左路线的迫害，含冤去世！不能不使人们痛惜！

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落实了政策，达理札雅先生的这一大冤案才得到了彻底纠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为他和夫人金允诚女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追随者强加给达理札雅先生和金允诚女士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他们夫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对其子女亲属和受株连的其他亲友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会隆重举行，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英明、伟大、正确的，也可以告慰达理札雅先生和金允诚女士在天之灵了！

这篇资料，是我们记忆所得，因限于文化水平，写的很不完全，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和达先生的子女亲属给予批评指正。

---

## 内蒙古各盟名称解释

**哲里木盟** 哲里木，即山名，位于今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王府北，当时科尔沁六旗、郭尔罗斯二旗、札赉特一旗、杜尔伯特一旗，共十旗在此地会盟，故称哲里木盟。

**卓索图盟** 卓索图，即有颜料之意，是地盛产一种颜料，称谓卓索图川（红土川），位在原翁牛特右翼旗，今赤峰市西北约二百里围场县东南。当时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共五旗在此地会盟，故称卓索图盟。

**昭乌达盟** 昭，蒙语中有丘陵、庙宇、百数之意；这里是一百之意，是指复数而言。乌达，即柳树。是地盛产柳树，位在阿鲁科尔沁旗南部。当时敖汉一旗、巴林二旗、翁牛特二旗、札鲁特二旗、阿鲁科尔沁一旗、喀尔喀左翼一旗、克什克腾一旗、奈曼一旗，共十一旗在此地会盟，故称昭乌达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即高原上的平野，郭勒，即河川。该河在今锡林浩特。当时乌珠穆沁二旗、浩济特二旗、苏尼特二旗、阿巴噶二旗、阿巴哈纳尔二旗，共十旗在此地会盟，故称锡林郭勒盟。

**乌兰察布盟** 乌兰，即红色，察布，即崖口，位在今呼和浩特北红山口。最初，乌喇特三旗、喀尔喀右翼一旗、茂明安一旗、四子王一旗、归化土默特旗在此地会盟，故称乌兰察布盟。第一次会盟地点在今呼和浩特市公主府（今呼市第一师范校址），并建一藏式白塔为纪念（该塔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后土默特旗改特别旗，不属乌兰察布盟管辖，故会盟地改迁到今武川县召河东与四子王旗西境交界处的“汪滚”地方，但仍沿用乌兰察布盟名称。

**伊克昭盟** 伊克，即大，昭，即庙，该庙在今达拉特旗境内，原郡王旗的王乃召（亦写作王爱召）。因伊克昭盟第一个建庙处，当时鄂尔多斯两翼六旗（六旗七个扎萨克）在此地会盟，故称伊克昭盟。

呼伦贝尔、巴彦淖尔、阿拉善，兴安原清代未设盟制，是解放后新建盟。呼盟一九五三年二月设，巴盟一九五六年四月设，阿盟一九八〇年四月设，兴安盟于一九八〇年四月恢复。

# 阿拉善旗女子小学校简史

朝 格 图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阿拉善霍硕特蒙古迁居阿拉善地区，迄今虽则三百年，但正式在该地区设置旗政却是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的事。阿拉善旗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旗王先后袭位九代十世，受清朝封建统治二百多年，相继又遭受国民党残酷统治达数十年之久。

当时，在这十八万多平方公里的阿拉善土地上，四万多旗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特别是阿拉善旗的妇女，在长期的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和歧视下，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女子读书被视为异端而遭到种种非难。“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读书于朝政不吉利”等封建说教及陈腐偏见，剥夺了广大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正当权利，造成了旗中识字的妇女稀如晨星的可悲局面。因此，对当时的阿拉善旗来说，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业已成为关系到拯救民族、振兴地方的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了。

阿拉善旗第九代十世旗王达理札雅的夫人金韞慧（又名金允诚，系宣统皇帝溥仪的堂妹）女士，自幼生活在皇宫之中，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加之曾受辛亥革命的一定影响，她本人很推崇国人的文化教育事业。

1932年，达理札雅袭任旗王后，金韞慧女士由北京首次前来阿拉善旗定居。当她目睹这里的落后状况，尤其是看到目不识丁的妇女在社会各阶层中比比皆是，有心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状况，

遂向旗府提出应在定远营建一所女子学校的建议。当时旗府虽采纳了她的此项建议，但果真兴办一所学校谈何容易，面临的困难不少。一则由于封建陈腐思想的束缚，人们不愿将女孩送往学校读书，二则校舍、教员、课本等还全无着落。

达理札雅、金韞慧二人，为早日开办定远营女子学校，在王府东院的五间房子腾出以作校舍的同时，从本旗文人中物选和聘请教师，又拨一笔款项购置桌椅板凳及课本等。此外，还以旗府名义发布通告，要求定远营城中学龄女孩进校读书。经过达理札雅夫妇的几年努力，于1937年4月15日（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五），“阿拉善霍硕特旗立定远营女子小学校”得以正式开学，学校印章正式启用，在开学典礼上，达理札雅携夫人金韞慧女士莅临，旗府一些官员及城中男子学校教师也纷纷前来祝贺。驻定远营的基督教传教士包××（女，系外国人）也应邀参加了典礼。

女子小学校的校舍就设在旗王府东院里，校长由金韞慧女士担任。正式教师共五名（含校长），兼职教师三名，另聘请传教士包××任英语教师。招生学生计46名，其中最小的七岁，最大的十四岁，平均年龄为十一岁。校方根据学生的原有文化程度，设半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等四个班，分在两个教室里上课。上课时，两个学生共坐一条长板凳。学生所用课本均免费发给。当时，还免费发一些





笔墨纸张（金韞慧将自己每月三十六元的薪金全部交校以作公用）。学生在校期间，一律穿由学校统一发的校服（分冬、夏装）。

课程设置情况如下：

女子小学校设有国语（含毛笔练方）、蒙语、算术、社会（课）、自然（课）、体育、音乐、图画、卫生、公民（课）、劳作、英语等十二课程。国语：主要学习《四书》、《三字经》、《百家姓》，并练习毛笔字；算术：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算盘；蒙语：从字母（蒙文正字详解语饰）开始学，掌握读和写的基本知识；社会课：以学社会常识为主；自然课：学自然常识和有关经济、地理方面的一些常识；体育课：以学军体为主，其中包括队列训练；音乐课：学唱歌曲及学舞蹈；图画课：学一点绘画基本知识；卫生课：学卫生常识；公民课：学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劳作课：学刺绣、剪纸、编织技巧；英语：从字母开始学。

金韞慧校长兼教公民、练方课，有时还代教国语、英语。

虽说女子小学校设施简陋，条件较差，但因执教严而有力，学生成绩提高很快，故获家长们的好评。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阿拉善旗于1938年横遭不测后，该校被迫解散，以后再也未能得到恢复。

阿拉善旗女子小学校被迫停办的大致经过是：1938年2月末，宁夏军阀马鸿逵诬陷阿拉善旗王达理札雅私通日本人，他一面调集重兵围攻定远营城，一面进行政治欺骗，迫使达理札雅就范。随后，他将达理札雅“接”往银川，不久又移至兰州变向软禁近七年之久。由此，阿拉善旗方面不但蒙受奇耻大辱，而且旗政也陷于瘫痪而处境凄惨。当时，旗内人心浮动，加之金韞慧校长也在兰州软禁，无人问津校务。阿拉善旗女子小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停办解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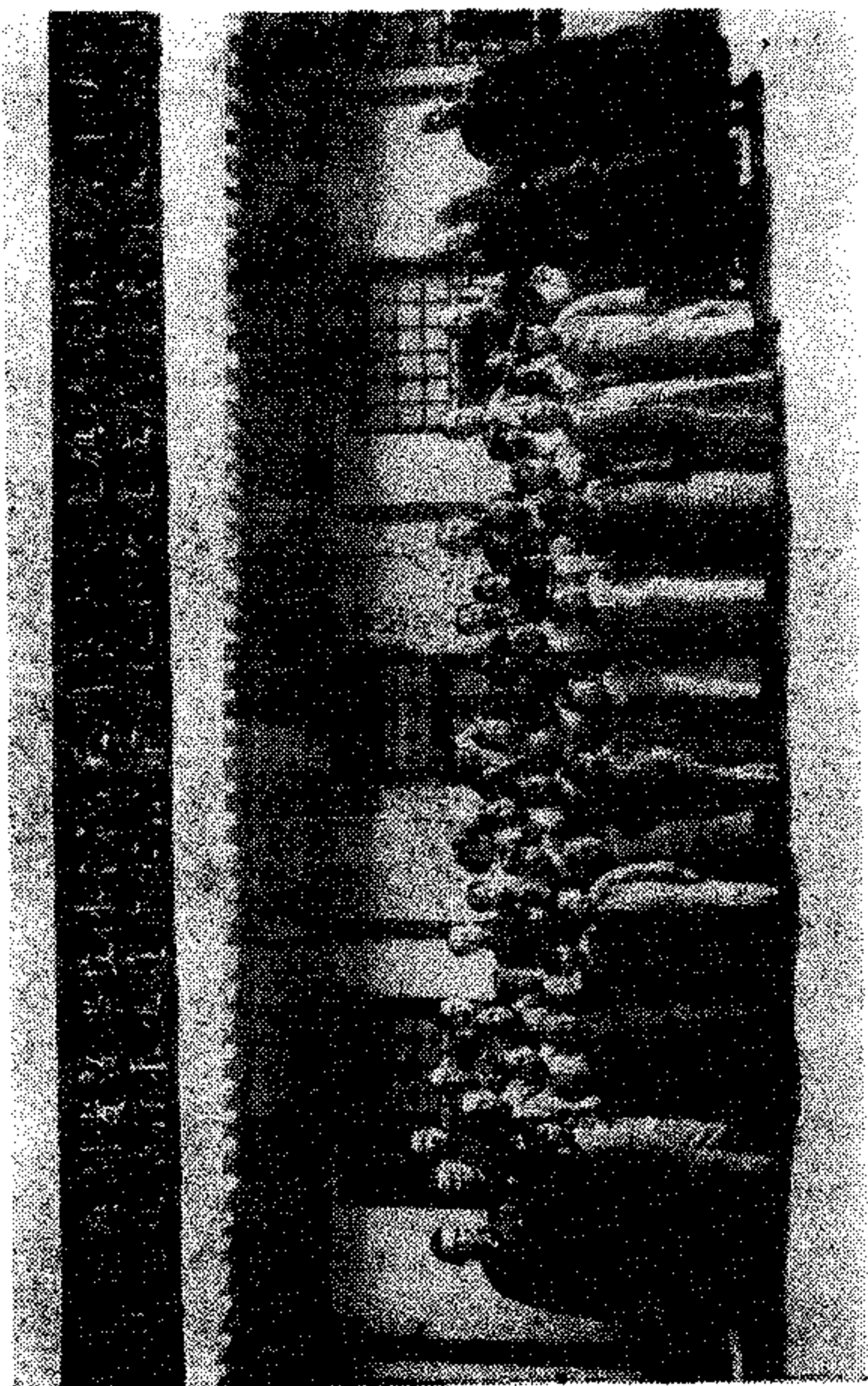
193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定远营开办“国立试验小学校”，并委派薛公武出任校长职。当时，旗府针对这一情况，特下通知告旗人说，旗属女子小学校将与男子小学合并，望本旗学龄儿童勿往“国立试验小学校”报名。旗府通知中虽提及女子小学校，但这时女子小学校已名存实亡了。

1940年，达理札雅从兰州派李阴国出任阿拉善旗“男女混合小学校”校长。但该校的女子班一直拖至1941年才正式开课。在校内男子班和女子班是被隔离的，分别单独上课，互不往来。1941年，该校第一届女子班得以毕业。

阿拉善旗女子小学校，开办不久就夭折了。但是，不管它的命运如何，它确对阿拉善旗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重要推动作用。它的出现，使得广大妇女冲破封建罗网，争得接受文化教育的平等权利。女子小学校培养出了一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妇女。解放后，她们在党的领导下，为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并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以上所述，就是阿拉善霍硕特旗立定远营女子小学校的概略历史情况供参考。

（注：编写此史稿时，除参阅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有关资料外，还走访了曾就读于女子小学校的罗桂芳、魏冬桂、杨淑兰、王淑敏等十多位同志。现借此机会，谨表谢意。）



阿城定远营女子小学开学典礼合影

定远营女子小学校正式教员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文化程度	教学科目	职务
达金慧	女	31	北平	汉文优长	公民 卫生	校 长
金幼臣	"	19	"	初中毕业	算术、劳作、 美术、音乐	班 主 任
刘延庆	男	42	阿旗	中等文化	国语、体育	教 师
谢尚德	"	33	"	"	社会、自然	"
俞世珍	"	58	"	"	蒙 文	"
包××	女	50余岁	瑞典	大 学	英 语	特邀教师

定远营女子小学校学生名册

姓名	年龄	民族	入学时间	姓名	年龄	民族	入学时间
达倩芬	12	蒙古	1937.4.15	王俊英	15	汉	1937.4.15
达芟芬	11	"	"	王淑敏	14	蒙古	"
罗桂芳	14	"	"	张素纹	14	汉	"
陶风霞	14	"	"	罗彩琴	12	蒙古	"
俞桂芳	12	满	"	魏冬贵	10	"	"
罗慧芳	12	蒙古	"	薛兰香	11	满	"
罗彩雯	14	"	"	刘淑卿	12	"	"
金少琴	13	满	"	赵连娣	13	"	"
刘俊霞	13	汉	"	赵从嫒	12	汉	"

续表一

姓名	年龄	民族	入学时间	姓名	年龄	民族	入学时间
金小琴	11	满	1937.4.15	席素馨	11	汉	1937.4.15
于培锐	11	汉	"	王秀蓉	13	"	"
达亚男	7	蒙古	"	王玉蓉	11	"	"
赵连娥	11	满	"	杨雷英	9	"	"
达书萤	7	蒙古	"	何秀华	11	"	"
杨淑兰	8	"	"	郑希珍	13	"	"
王承贞	10	满	"	李冬林	11	"	"
王承漱	9	"	"	郝跟弟	11	"	"
李丽容	9	蒙古	"	郝菊香	10	"	"
沈玉梅	8	满	"	朱镜心	13	"	"
金佩纹	8	"	"				
王维娜	14	汉	"				
王菊英	11	"	"				
王存香	11	"	"				
李月英	11	"	"				
张香兰	10	"	"				
程秀菊	8	"	"				
王淑英	9	"	"				

## 乌兰布和沙漠的汉代屯垦区

在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有三座汉代古城废墟。据其所在方位并结合文献考察，这三座城址应该是汉代朔方郡的临戎、三封、窳浑三县的故城。临戎在布隆淖尔附近，三封在陶生井西南，窳浑则偏北，在阴山脚下。

朔方郡设置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一百二十七年）。当时，西汉国力渐强，对匈奴一改防御而为主动出击，遂于公元前一百二十九年开始对匈奴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卫青、霍去病等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兴十万人筑卫朔方”，并屡越阴山，匈奴遂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因此汉朝的势力推进到今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临戎、三封、窳浑是朔方郡最西边的三个县城。

朔方郡设置后，派重兵守卫，为就地解决军粮，迁来“六十万人戍田之”，“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形成了屯垦地区，促进了这一地区人口繁盛和经济发展。“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正是当时繁荣富庶的真实景象。在三城的附近和三城之间遍布汉代墓群，数以千计，正是当时繁荣发达的证明。呼韩邪单于由长安返漠北就是出窳浑县西北的鸡鹿塞。汉王朝不但派兵护行，“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贍其食”。“边谷米糒”，当是垦区所产。

东汉初年，匈奴内讧，南匈奴内迁，并利用南匈奴开北边诸郡，这里的汉代屯垦区也就逐渐衰落了。

## 阿拉善旗保安队沿革

罗阿日斯楞 魏钟文

阿拉善旗位于我国西北边陲，总面积近十九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陆地最大的纯牧业旗县之一。阿拉善旗矿产丰富，尤其无烟煤、天然盐湖等闻名全国。其它为麝香、大芸、鹿茸、甘草、麻黄、锁阳等土特产品也很丰富。磴口一带地处河套黄灌区，农产品丰富，是历代王爷屯兵养马的粮秣基地。阿拉善旗的确是我国的一块宝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康熙十六年（1677年）和硕特部首领额尔克济农和罗理率部先入青海，后沿河西走廊北部草地进入阿拉善西境，原驻龙首的以北，雅布赖山一带。后逐渐东移，最后定居在贺兰山北麓紫泥湖一带。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和罗理被封为阿拉善札萨克，多罗贝勒，阿拉善第一代王爷。后来其子阿宝、孙罗卜藏多尔济先后多次平定青海等地“叛乱”，战功显赫，即被清王朝格外重视，相继晋升为郡王，亲王，参赞大臣，尚公主，诏“世袭罔替”。在此形势下，清廷为了在阿拉善旗设立起一支足以抵挡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青海边陲区戡乱的劲旅，即命令在阿拉善旗成立“阿拉善勤王兵马队”，即“亲兵马队”。共八个苏木（每个苏木相当于一个连，150人左右），实际已有两千人左右。这就是阿拉善旗武装部队最前身。

这支军队达理札雅继任最末一代王爷之时仍保持有两千人的数量。乾隆十九年，第四代王爷旺沁班布尔就任宁夏梅林章京（督军）之后，又改称“亲军马队”。同治二年（即公元1863



年)为了保卫旗政府和王府, 丞相协理阿布尔勒围绕定远营修建了五座营盘: 后营盘山上两座, 察库尔梁(馒头山)上一座, 南梁上两座。后来由四公太太自己出钱在后营盘山上又修了一座。直到解放时, 后营盘山上的三座营盘还依然存在。

## 一 编制始末

罗卜藏多尔济晋封为阿拉善旗亲王之时, 清政府命令成立“阿拉善兵马队”, 即亲兵马队, 编制为八个苏木, 每个苏木一百五十人。每个苏木设正副苏木长各一人, 文书一人。十人为一个班, 设班长, 五人为一个“包希呼”(即副班长)分层管理。在旗上设立总兵营, 由协理负责武装部队总指挥。乾隆十九年将“亲兵马队”改为“亲军马队”, 编制照旧。



在国民党时期，一九三六年正式批准成立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达理札雅任少将司令，陈爱尔德尼巴图任少将参谋长，下设副官股，军需股，参谋股，秘书股等。

一九三七年成立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上校总队长罗恩凯巴图，中校参谋长罗巴图孟柯，下设八个大队。

第一大队队长少校罗曹格图盖尔勒，副队长上尉罗都固尔扎布。第二大队队长少校马二里，副队长上尉齐图门巴依尔。第三大队队长少校根东端迪布，副队长上尉巴拉登藏武。第四大队队长少校毛丑鲁岱，副队长上尉却立图木（喇嘛），第五大队队长少校陶塞尔布吉，副队长上尉达瓦，第六大队队长少校西尔布，副队长上尉乔英，第七大队队长少校王毕立功，副队长上尉田义马马。第八大队队长少校杨富存，副队长上尉马图门巴依尔。

每一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共计二十四中队，约三千人左右。一、二大队驻地在定远营；三大队驻地在南寺头道湖庙及三关以南各防卡；四大队驻地在北寺、宗别立各防卡；五大队驻地在查汉池、二、三道湖南部各防卡；六大队驻地在雅布赖盐池西部各防卡；七大队驻地在吉兰太盐池、磴口；八大队驻地在四坝、大水沟、图克木各防卡。

## 二 部署设施及任务

满清时期，八个苏木的兵力除旗所在地定远营设立总兵营之外，大部分兵力是分布在全旗范围的长期性的四十三个防卡（有时根据形势需要也有过增减防卡的情况）上，以保护领土，防止匪徒，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一九三八年以前，虽然已经推翻满清政府二十五年之久，建立了民国，但是各省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也互相倾轧，无暇边顾，明文下达要成立保安队，也没有明确的任务，只是维持地方

治安而已。一九三八年以后，因为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对阿拉善旗垂涎三尺。据悉：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古自治运动以挑拨民族关系为手段，企图拉拢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同时西侵额济纳旗，达到控制西部蒙古地区为目的。于是千方百计施展阴谋渗透活动，当年秋天，即派飞机运输特务人员，电台及所需物资多次着陆，住在定远营祥泰隆商号。并曾派当时驻关东军参谋长板元征四郎来旗游说，虽然当时并没有达到日本帝国主义霸占阿旗的目的，但贼心不死，不断扩充特务机关规模，并在双山子西边修建一个飞机场，企图从东北佳木斯起飞，途经百灵庙至定远营，再飞往额济纳旗的下庙。这些日本特务仅仅半年时间，活动极为嚣张，在街上骑摩托车任意撞人，阿旗人民极为反感。鉴于当时形势紧迫，达理札雅便向国民党政府报告日本人的活动情况，并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据此，国民党中央派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率两个团的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开进定远营，以武力胁迫赶走日本驻在阿旗的全部人员，摧毁日本修建的飞机场，烧毁日本人的文件及一些诱骗蒙古人的迷信和宣传物资、材料等。当时公开烧毁人心大快。

关麟征在阿拉善旗时曾多次与达理札雅会谈阿拉善旗的防务问题。关的意见是加强地方武装，保卫边陲国土，建立有同国民党中央有密切联系的边防地方武装部队。当时由关与国民党国防部后勤部联系批拨给汉阳造的仿二四式步枪500枝，轻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子弹五万发。从此阿旗的军队又有新的起步，有亲军马队演变为国民军的过程，按照国民党规定的一切要求训练军队，但时隔不久马鸿逵则以造谣诬陷手段，声称达理札雅有“叛国投日”等罪名。于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悍然出动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包围了定远营城，强迫解除保安队武装，胁迫达理札雅全家，送兰州五泉

山软禁七年之久。以后通过多种关系，消除了怀疑，只好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即一九四四年秋，将达理札雅一家送回阿拉善旗主持旗务。

在达理札雅被迫离旗之后的七年中，阿拉善旗的工作主要是以罗恩凯巴图（旗政府协理）和罗巴图孟柯（旗政府副协理）为首的官员主持。马鸿逵这时乘机把军队驻扎在定远营西花园一带，接近一个团的兵力，驻了近十年之久。直到解放前夕尚驻有一个特务营。与此同时，国民党设立了中国国民党阿拉善旗区党部，国民党国防部设立了军事专员办事处，三青团设立了阿拉善旗分团部，蒙藏委员会也派了协赞专员，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以视察边境教育事业为名，又在南龙王庙增设了国立试验中心小学（现巴镇一校的前身）。因而中统、军统，CC派特务，以各种名目钻进政府、学校等部门。政治形势复杂尖锐，明争暗斗，血肉人民。特别是马鸿逵派驻定远营的办事处（驻在杠房巷）建立保甲制度，巧立名目，抓兵拉伕，搜刮民脂民膏，使定远营的工商业接近倒闭边缘。这时的骑兵保安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广大牧区，必要时以罗巴图孟柯为首的官员也站在阿旗人民一边，出面保护旗所在地居民。特别当抓兵派伕季节，一些在定远营的适龄男青年多移居在城内或临时穿着保安队军装，借以逃避抓兵之祸，有时借机制止一些甲长的罪恶活动。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定远营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

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的炮声，也给阿拉善旗送来了喜悦。一九四四年八月达理札雅回旗后也想重整旗务。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准备打内战全面进行扩军备战。由于国民党军事部署的需要，又重新装备了阿旗的保安总队，列入西北军事部署体系以内，由西北长官直接督导训练。于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正式恢复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达理札雅晋升为中将司令，少将参谋长陈

爱尔德尼巴图，司令办公室上校主任朱门，司令办公室少校秘书金巴图道尔吉，政工室上校主任戚涛，参谋处上校主任李文钦，副官处上校副官长张仁，副官处上校主任之张元忻，军需处中校主任郑礼范，医务室上校主任王增堂，区防司令部派驻兰州办事处上校主任张德熙等。

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部：少将总队长罗巴图孟柯，上校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尔勒，中校总队副罗永寿（兼参谋长），一中队少校中队长杨富存，二中队少校中队长陶曹格德勒格尔，三中队少校中队长范乌尔图那筭，四中队少校中队长罗都古尔扎布，五中队少校中队长罗步云，通讯分队上尉分队长张元尉，勤务分队上尉分队长王振华。

以上五个中队的部署情况是：一中队驻巴彦套海，主要负责磴口、三盛公、四坝一带的防务；二、三、四中队驻定远营，负责对付马鸿逵，保卫旗政府和定远营人民的安全；五中队名义上驻定远营以南地区，实际驻在定远营。在三关、乌达、额日布盖等防卡也驻有小分队。一九四六年冬又成立了一个三十六人的分队，驻防在北部苏呼木图防卡，由段塔拉腾岱任中尉分队长。从此阿拉善旗与外蒙古关系较为融洽，也有过秘密的友好来往。

一九四六年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成立后，旧历十一月上旬西北行辕曾派陶、洪两位参谋来阿旗视察保安总队部的装备及服装情况。当时二中队全体官兵穿军服，三中队都是喇嘛兵穿的便服。为了视察第一中队，由金对岱给洪参谋（张治中的小舅子）带路经宗别立、磴口到四坝视察一中队后，路过北部几个防卡再经民勤县回兰州。

与此同时，建立了以定远营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为中心的通讯联络网。总台设在定远营。有电台两部：一中队设两个分台，北部温都尔毛道设一个电台；额日布盖设一个分台。总台每天除与兰州西北行辕通讯联络两次之外，和每个分台联络一次。一九四



八年以前还要与兰州甘肃省政府总台每天联络一次。其他临时联络任务不在此列。通讯联络在名义上是以“防共”为主，其实除了一般军事业务工作之外，多数情况是传递牧业降雨情况、灾情、政府方面下达的紧急任务以及收税、商情等工作。不过在解放初期，德、李残部（德王、李守信）在我旗北部十个巴格骚扰时，通讯电台尾随敌军侦察情报，促使该残部投诚方面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三 装备及训练

满清时期的马队没有统一服装，服役的官兵在平时都穿着自己的便衣。只有在重要集会时和站岗放哨时才在自己的便衣之上套一件公家发给的黄色坎肩。衣边统统用白色布镶着白边，坎肩前面写有“阿拉善旗亲军马队”八个大字，背后写有“卫士”两个字。头上包有一块黑色的布。这就等于官服。武器多是土枪土炮，并兼有马刀、弓箭之类的武器。即使有洋枪也很有限，只有一些当官的才有。平时不多训练，每当三、六、九是训练日。以军事骑射技术为主，每年春秋两季在王府马群里挑选一百匹好马，五十匹轮换训练。没有政治训练制度。军事训练分步训、骑训两种。步训分步战和射击两种：步战即格斗，摔跤，劈刀等类似民族形式的体育健身基本训练；射击跟现在差不多，每人射击三发子弹，第一枪是立射，第二枪是坐射，第三枪是卧射。马战也分两种：一种是火器射击。因为是土枪，射手必须事先点燃好导火索，然后上马边炮边射击。第二种是骑射，引弓射箭，首先要修好长五十米左右的跑道工事，设三个箭靶，左边两个右边一个。第一靶设在左面，用木杆子挑着一个约有直径五十公分大的中间带有红心皮囊，靶高约五尺，约摸着士兵骑在马上能和引弓成平行，距离为两米；第二靶也设在左面，是在已修好的土墩子上

放高约一尺的圆锥形的白布做成的靶标，尖端有一撮红缨子；第三靶是设在右面，这是反方向引射，难度较大，靶标和第二靶相同。在训练中每着一靶即擂鼓一通，三通鼓响，即为优秀射手。在一定时期将给予不同形式的奖励。

平时“亲军马队”要站岗放哨，在定远营城门口每天都要轮流站岗。每一个时辰（即两小时）一班，日夜不停。王府门口也是同样。每日天一放亮就要放“亮炮”（是用一个铸铁筒子装好火药的土炮，点燃地点设在城内后坡上，经常住有两个炮手和号手）。傍晚要放“定更炮”，并要在山坡上吹五尺长的红铜号。号声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号一响马队就要点名集合；第二个用意是号一响约十分钟后就要关城门。表示在城外的人，特别是在城外摆摊设点的（家在城内的）商贩要很快入城。这时的城门不上锁，而是用铁索练扣起来，只留能通过一个人的小缝。十点钟时就要放“二更炮”，这一炮就是通知城门要上锁，禁止行人出入。上锁后并要把钥匙送交旗政府值班室。平时只关闭头道城门，只有在战时或特殊情况时才关闭二道城门。“二更炮”响过之后，打更人就要在城墙上通夜行走。每到几更就敲几下鼓，每到几点就敲几下钟。钟和鼓也都设在后山坡上的放炮之处，通宵按时报更，不得有误。

一九三二年以后，虽然国民党中央改变“亲军马队”为“保安队”，但一不给装备，二不给粮食，军费开支自备。加之不能开发资源，财力有限，凡是上班当兵的人每月给三十斤粮、两块大洋之外，其余一概自备。后来因日本人来阿旗，关麟征师长带兵二十五师来赶走日本人之后才决定拨给枪枝弹药，这才搭起了保安总队的架子。从此对士兵开始训练。阿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军事训练班共四十人。达理札雅任主任，于来堂、陈匡任副主任，领导训练工作。本旗官员全部参加军事训练。从训练课目看，也只能学到一点基本姿势和一些军人的礼节。受训人员毕业



后，根据本人情况分别分配到区防司令部、总队部和各大队任军职。这就是阿拉善旗武装部队由封建旧式队伍变为新型队伍的开始。

从此以后广大士兵轮班训练，由陈匡任总教官，叶庄之、李自源（据悉他从绥远警训班毕业后来阿拉善旗）为教官。军训科目多属基本教练，如单个教练，班排教练，因弹药缺乏，不进行实弹演习。马匹不全，也无马术教员，不进行马术训练。平时出操教唱军歌，抗日战争开始后教唱的军歌和学校学生教唱的相同，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同时又成立了号班，进行军乐器训练。集合时军乐队走在队列之前，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散兵状态了。

时隔不久，部队编制尚未健全，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五日马鸿逵围攻定远营事件一发生，直到一九四四年的七年中这支部队名存而实亡，司令部也自然消失了。阿拉善旗定远营实际上成了旗县并存状态。

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后，国民党中央重申骑兵保安总队要整顿，增拨了枪枝弹药（具体装备见附表），每人有步枪一枝，军官还有手枪。实行统一服装，统一军衔，被服由西北行辕后勤部代发。在此期间的军事训练比以前大进了一步。除了一些当地有声望的民族上层的高级军官外，上、中、下三级军官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人。他们受过正规训练，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分别充任司令部和总队部以及各中队的主要职务。从此军队训练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首先是正规化了。每天除了按时坚持基本训练之外，还有计划地进行器械操作训练，队列教训，打靶射击，实弹演习；对内务也有了正规要求，根据骑兵的特点请来了马术教官，西北行辕也派来了教官监训。此外，还进行了战刀武术教训，因没有坚持下来故在这方面的收获不大。根据现代战争要求，成立了通讯人员训练班，训练了一批无线电通讯人员。实践


证明，训练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在各中队派出的电台都是这一批人担任主要工作。

训练军队的场地，除了各中队自行安排之外，在定远营训练多在延福寺前院和后山上修建的小校场进行。马术训练和实弹演习就在丫丫庙以东的吉林井平滩上。

民国十七年，姚连邦来阿拉善旗，为了配合当时的北伐，名曰工商自卫，曾组织一次商团训练。时隔不久，便随着北伐混战自生自灭。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以维护工商业利益为宗旨，国民党号召全国组织商号团训练。阿拉善旗也在此浪潮中，即一九三七年秋由商会出面，抽调工商业中的青年人约百十余人，搭起了一个连的架子。由阿旗政府每人发给仿二四式步枪一枝，子弹十发。每人又由商会出钱做了黑布棉军装一套。当时由李子源任教官，开始训练。在几个月的过程中，也颇有成效，达理札雅和一些政府要员还曾检阅过两次。一九三八年以后，无人抓此项工作，也自行流产了，这也算阿拉善旗武装中的一个插曲。

#### 四 兵役制及其他

满清时期的“亲军马队”的军旗是中间红色间黄色套制，外缘四周是镶有白边的四角旗。在三、六、九日和大的节日里必须在城门、东当（即旗杆樑）和后山的三个营盘上插双旗。一九四六年的骑兵保安总队的队旗是红心黄边带穗四方旗。上面写着“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字样，平时由总队部掌旗副官保管，节日和战时列队出行时必须打出来，由掌旗副官打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一九三六年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的臂章是三寸长方形的灰布，中间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党徽，内有《A·M·A》三个英文字母。一九四〇年以后，改为同样大小的兰底白圈，中间印有《》

字的笔体字样。解放后即是“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臂章。

阿拉善旗骑兵服役办法很独特，是长期以来一直沿用的一种既符合军事训练和实践要求，又便于参加牧业生产劳动两不误的行之有效的特殊义务兵役制度。即每个十八岁至五十五岁的男性公民，每年有四个月的服兵役义务。一年三班轮流，由旗总队部统筹安排，通知每个适龄兵士，按时到达指定的连队报到，参加军事训练。期满下班回家参加牧业生产。有紧急任务时，政府下令全部适龄兵员集训。必要时适龄喇嘛也可以参加军队。总队部的官兵多是常任制，不参加义务兵轮训。

这种“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制度，满清时期是这样，国民党时期也是这样的。长期实践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它发挥了机动灵活的蒙古骑兵特有的优势，呼之则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不难想象，满清政府过去为什么曾多次利用阿拉善骑兵平定“叛乱”，保持祖国统一。马鸿逵在一九三八年虽然以突然袭击方式拿下了定远营，可对近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牧区仍然是束手无策。在解放初期这支军队既保卫了家乡，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多股匪军，为祖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五 和平起义的经过

历史的演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醒悟到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阿拉善旗自古以来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阿拉善旗的各族人民早就盼望着祖国解放。这天终于到来了，长期统治人民的封建枷锁被全国解放的炮声轰得粉碎。一个崭新的、团结的、民主的阿拉善旗在祖国的大西北诞生了。千里草原，一片欢腾。

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消息传来。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达理札雅、罗巴图孟

柯权衡利弊，立即派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门前往兰州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朱门到兰州后，通过达理札雅的好友白海凤的私人介绍，到兰州与范明取得联系之后，找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向彭司令员表达了达理札雅和全旗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赤子之心，当即受到了彭司令员的热情接待，并给予了宝贵的指示：“安定人心，照常生产，尽力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容散兵游勇和他们的枪枝武器”。

同年八月，兰州解放。阿拉善旗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张德熙和朱门随同十九兵团一起来到宁夏中卫后，转回阿拉善旗向达理札雅再三传达了彭司令员的问候和指示。在九月二十三日宁夏军管会成立时，达理札雅公开发表了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声明，并派骑兵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瑞光等三人，代表阿旗前往宁夏仁存渡口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当即受到十九兵团联络处长甄华的引荐和接待，并由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带他们晋见了杨得志司令员，受到杨司令员的赞扬。

九月二十三日起义电文：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代电（善秘字第120号）

为派代表罗曹格图盖立勒等前往宁夏欢迎解放军由。

西北区人民解放军代表先生勋鉴并转呈彭司令员毛主席钧鉴蒙旗荒漠地方瘠苦并以年来灾侵迭见人民生活愈益艰困渴望解放已久今幸我人民解放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西北万众欢腾而本旗亦同沾雨露无任忭慰特电致敬并申贺忱兹谨派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筭等三人代表本旗政府及全旗人民前来谨致敬意并面陈一切敬请惠予延接指导为禱。阿拉善特别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暨全旗仕官率全旗人民叩申（九月）漾（二十三日）

给马子寅的电文：

宁夏省政府请转马子寅兄钧鉴兹派罗曹格图盖立勒等三人于申漾赴宁转往前方代表本旗与人民解放军会晤一切请烦转电解放军代表知照为感弟达理札雅申漾叩  
(九月廿三日)

杨得志的回电电文：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来电敬悉对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甚表欣愉望努力维持阿拉善秩序共同建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新宁夏杨得志

罗瑞光等在受到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接待后，立即发来回电说：

“杨司令员对阿拉善旗的起义行动甚为满意，并重申不进军阿拉善旗的决定。要求蒙旗地方部队当前在确保地方治安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方面要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杨司令员希望在适当的时候邀请达理札雅先生来银川会面，以便晤谈。”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于九月二十三日以阿拉善旗札萨克的名义向毛主席发去了致敬电。电文内容是：

“我谨代表阿拉善旗各族人民向您致敬，并热忱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现在，我郑重宣布：我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国政协在接到达理札雅贺电后，当即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义发出电报，邀请达去北京参加会议。当时阿拉善旗邮电局局长尤剑秋（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起义，故意扣压回电两天，因误时达未能去参加。虽然达理札雅没有去成，但全旗人民

确感欣慰。

九月十九日宁夏马家军军长马敦静偷偷乘徐永昌（国民党军令部副部长）的飞机不辞而逃。宁夏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散兵到处乱窜。这一消息传到定远营后，马匪驻定远营的特务营的士兵在九月二十日立即哗变，当晚九点钟鸣枪四散。原计划先抢商号 and 居民，可是哗变后因感到我旗保安队已预先早有布置防御，于是未敢入市区。只是在附近稍有掠夺即分头四散而逃。九月二十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闻讯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一旅李守信部已于九月中旬从宁夏陶乐县北上，窜入阿拉善旗境内，而达理札雅又坚持和平解放，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立场，德无可奈何便自己在当日带领部分旧部随员出走定远营，前往图克木，准备垂死挣扎。他的出走，谣言很多，说什么“如果不跟他走，最后就没有看到太阳的一天”等等谣言。

总之，从马敦静、德王出走到特务营的哗变，定远营当时确实是处在动荡之中。一些不明真象的人举棋不定，可在这危机关头（9月中旬）达理札雅给保安总队全体官兵说：“我们共同处事多年，在这非常时刻你们要同我安心职守，再过十来天情况会好转。”达身为主帅，坚定不移地要死守在定远营，又在官兵中如此讲话，这对稳定全旗局势，使全旗以后能完整无损地参加和平起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管从当时广大牧区人民对王爷的传统思想而言，还是从定远营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言，非达理札雅是难以控制当时局势的，这一事实不可磨灭。

九月二十三日公开宣布阿拉善旗和平起义，二十四日十九兵团徐成功团长奉命率部追击马家军散兵收缴武器，进入阿拉善旗，到腰坝时由罗步云代表阿拉善旗政府和札萨克达理札雅向解放军和徐团长表示欢迎。杨乌力根达来代表巴伦别立巴格政府向解放军献了旗后，罗步云前往定远营向达理札雅汇报了情况。阿旗政府派梅林章京胡艾力在巴依尔、戚涛、何兆麟、李文钦、李树德

前往腰坝欢迎解放军。

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是阿拉善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解放也影响了邻近旗县的和平起义，减少了战争破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历史是无情的，但也是最公正的。前进就是胜利，后退自取灭亡。何去何从，谁是谁非，不言而喻。达理札雅和他周围的上层决策者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全体保安总队的广大指战员为人民立了一大功。从此起步，为人民继续忘我战斗和工作。事实不可磨灭，在此以后的剿匪战斗中，英勇奋斗，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的培养。解放三十六年来，天空不论出现什么样的乌云，他们总是一心一意，始终不渝地跟着党奋勇前进，为振兴中华，为建设美好的未来战斗不懈！

但是，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情况是错综复杂，有各种阻力，主要人物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人都有弱点，想和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一时也找不到渠道，为此，达理札雅召集亲信要员先后开过两次绝密会议。另外，为了迎接解放军，也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如派朱门前往兰州与人民解放军接洽，东面有第一中队负责接洽。派出去的人在接洽中碰到不少的困难，也有弱点，就是没有及时向旗里回音。当时达、罗等都很着急，于是，九月二十一日又派陈那筭巴图、段塔拉腾岱（现任阿盟政协副主席）二人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蒙方向中国共产党说明事由，达到接洽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开赴宁夏之前，达理札雅又听到人民解放军已开进了毗邻的民勤县，估计也有可能从那里再来阿旗，于是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派贺希格太前往民勤了解情况，之后又派佐领苏德那木旺希格、陶图布吉尔格勒二人负责，在西北部沙拉布尔都、巴音乌拉、库科布尔都、巴音布尔都、查汉淖尔五巴嘎的哈希雅图、库科布尔都、库科宝力格、祖尔冈阿拉得、科图等五处设立欢迎解放军接待站。这五个站至到九月二



十七日贺希格太从民勤回来汇报人民解放军不来阿拉善旗的可靠消息才撤回。

在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这一重要问题上，该旗上层决策人物，主观上确实做了积极主动的不少准备工作，因此，阿旗的和平起义是阿旗自己起到了主导作用。当然，在当时外来人员也有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如朱门前往兰州时，白海风写给范明的有关联系方面的私信，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他在定远营的国民党方面的外来人员感到，他们的处境微妙，自身难保，未起到多大作用。

（注：阿旗和平解放详细经过请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第一辑。）

## 六 战斗侧记二则

### 1、马鸿逵攻打阿拉善旗前后

宁夏军阀马鸿逵父子早就对阿拉善旗这块宝地垂涎三尺，以保护边疆为名，先后多次派部队驻定远营。最初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马赞良团来定远营驻防。于此同时，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告黑状，不得其逞而感到恼火，不时伺机寻事。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席卷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办汉奸卖国贼的呼声，使马鸿逵心惊肉颤。他作贼心虚，唯恐其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之罪行即将败露，狗急跳墙，施出偷梁换柱的卑鄙伎俩，寻找替罪羊，借日本特务曾来过阿拉善旗以及达王曾和德王有过来往为由，夸大是事诬陷“达理札雅要投靠日本人出走”等罪名，从而取得了既诬陷达理札雅，又可以掩盖自己罪行的一箭双雕之效果，趁机进兵阿拉善旗，实现其多年来想统治阿拉善旗的迷梦。

马鸿逵严密监视阿拉善旗及其王爷达理札雅的密令早已被国

民党中央批准。一九三七年初冬马鸿逵驻定远营的军队以防空为由修筑了三个碉堡，西花园坡上一个、南梁两个。这个行动早已被敏感人士所发现，碉堡既以防空为名，为什么射击口均对准定远营城。这一行动使阿旗方面提引了警惕，也曾作了一些准备。如把旗政府的一些重要文件档案和部分银元、枪枝偷偷转移到牧区巴音乌拉巴格则勒毛道密藏起来。同时也决定过完春节再派人把马家军的这种行动向兰州朱绍良反映。由于当时达理札雅及协理都很年轻，不太懂人间险恶，没有认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和不幸的事情会接踵而来。马鸿逵经过“周密”精心策划，日期定在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突然袭击定远营，兵力布置是：以换防为由，二三七团的张海禄，警备一团的王有楼，各一个步兵团，另增派骑兵、炮兵各一个营来围攻定远营，派马腾蛟为总指挥。

马家军为了解阿旗军事部署，用二百大洋收买一女人，秘密探视阿旗军事设施情况。这女人进出王府，打听到有不少武器弹药，向马部作了报告。为防止达理札雅骑马冲出定远营出走沙漠地，后果难以收，故又重新作了布署。

重新部署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一六八师师长马光宗负责占领三关口、腰坝、科白那木嘎一带，一夜之间动用三十二辆汽车，把军队送到腰坝。李中魁营长具体守卫腰坝据点的同时切断南寺通往定远营的交通要道。警备三团从平罗进入吉兰太，防止达理札雅北去。马得贵指挥两个骑兵团包围磴口、四坝一带的阿旗保安总队第八大队（杨富存部）。八十一军从中卫县进入通湖、头道湖、查汉池一带，防止达理札雅从草地南走。马步青骑五军的一个骑兵团从民勤县进入巴音布勒都一带，防止达理札雅西行。所谓在这种“天罗地网”的情况下，达理札雅冲出定远营是不可能的。一旦要出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了，但事态并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因而终止进军。

马鸿逵平时同达理札雅称兄道弟，表示关心等假仁假义的手

腕，无意侵犯阿旗的伪善面目，真是老虎戴捻珠假装好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正月二十五日黄昏时，稽查局派人侦察情况时，在东门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追捕归案后，经过审讯才知道他是西花园驻军张海禄部下的一个连长。化装侦察后营盘山，口供全部暴露了所谓换防是假，突袭定远营是真。但时间紧迫，达理札雅立即召开要员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调兵已是无济于事，当时，刘伯石等人提出一切问题以谈判途径来解决的主张，于是会议最后决定：不出走，日本人来阿旗早已报告中央处理，相信南京方面会正确对待。如果一出走，不仅默认自己投降日本，同时会给全旗带来重大损失。

当时保安总队有三百多人的兵力，从南北寺抽调来延福寺念经的喇嘛有一百多人左右。旗政府各处的人都发枪，都上城墙预备战斗同时从后山城墙上用绳子坠下二十七名士兵上后山三座营盘。

其实晚上十点以后城外已经戒严，西花园、西关、东门外、南梁，南大街商号群众房屋上已站满岗哨，不准群众走动。马家军两个步兵团分别从东西两面偷偷向定远营接近，骑兵营从正面突击，炮兵营在南梁上列阵以待。炮口对准城内三个点：一是总队部，二是达王府，三是张总管住宅。午夜两点，马家军先从东关、西关、红沟向后营盘山发起猛攻。然而我保安队守营盘的二十余名士兵怀着仇恨的心情，奋力阻击。城墙上的守军也从背后射击，使马家军腹背受击，连续发起多次强攻，都被守军打退了。四个小时以后，天已拂晓，不得不停止攻击，枪声稀疏，战斗暂时停止。炮兵虽然打了四发弹，最后一发落在城隍庙后空地上却没有爆炸。这是因为想活捉达理札雅一家，未向政府开炮。

正月廿六回民中有名望的周生祥、马金虎等向马腾蛟送厚礼（两千银元）说情，提出不要再打了，以和谈解决的请求。同时又

从银川弄来河州老太太（即马鸿逵之生母，因达理札雅的父亲塔王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为拜把兄弟，故达称老太太为伯母），进城亲自游说，让达理札雅一家去银川，由她保证人身安全。经过三天的软硬兼用的谈判，达为了避免定远营群众再受战祸之苦，决定签订城下之盟，缴械受降。计交出迫击炮三门，高射机枪一挺，轻机枪一挺，步枪和手枪约五百余枝，子弹五万余发。达理札雅一家于正月三十日离开定远营被胁去银川后转兰州，软禁近七年，直到抗日战争快胜利前夕才回到阿旗。在兰州软禁时期，达理札雅总觉蒙此不白之冤，这口气咽不下去。通过张治中、朱绍良等人的关系，在一九三九年秋到重庆去亲自谒见蒋介石。同时去的有罗巴图孟柯、李树德、金巴图道尔吉等三人。蒋介石单独召见，有张治中主任陪同。蒋当时表示：“保证让你回旗，但你应主动与马鸿逵搞好关系，我给你把关系疏通（指马的关系）以后再回去比较好”。这可能是四四年达能回旗的一个关键所在吧？！

与此同时，马得贵也偷偷进入四坝、磴口一带，企图实现其包围亭子驻军——阿拉善旗保安第八大队杨富存部，一举歼灭，统治河套。但事与愿违，杨富存自幼土生土长，地理熟悉，多年来与当地多少土匪周旋，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自从一九三六年起在阿旗东部独当一面，为人机警，善于用兵，勇敢果断，又多次维护当地农民利益，深受群众信任（据悉多次打跑过土匪，并在一九三四年群众起来和三盛公教堂洋人高神父为淌水争执动了武。当时杨坚决站在群众一边，武力胁迫洋人，为群众解决了淌水问题）。马家军突然来临，不管行动如何诡秘，总逃不过群众的眼睛。当天下午就有群众向杨富存报告了情况。第二天一早马得贵带领几个随从到杨的营部，外穿大衣，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其实衣袋里有手枪。杨富存裤带上也有手枪，手不离小枪。两人相见气氛有些紧张。马得贵说：杨队长我们都是好朋友，无话不谈，兄弟这次奉命来同杨队长谈几件事。阿拉善旗是宁夏省的

一部分,我们有责任防御阿拉善旗的安全,省旗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家人等等。但始终没有说出交枪一事。谈了一个小时后他要走,此时他的部队接近营房没有来得及全面包围。杨富存率领全部军队在枪林弹雨中冲出来,到北部哈鲁乃山口、沙拉布伦一带驻军。马得贵没有完成任务,只好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通过这次事件,可见马家军素质稀松,两个步兵团未攻下二十多人所守卫的后营盘山,两个骑兵团千里迢迢来包围城(只有一个大队的蒙古军)。事后还不相信在后营盘山上只有二十多个蒙古军普通战士,认为是有千军万马。经过和谈结束,缴械验证,才后悔莫及。其实他们当晚自相惊扰,据知还去周家田附近演了一场骑军营混战前往联系的步兵连的自相惨杀的丑剧。为了掩盖其丑面目,曾扬言在当晚围攻后山中看见了无数拿大刀骑兵在后山坡追杀,是关公显圣等荒唐流言。

## 2、剿除德李残部见闻

阿旗和平起义后,于十月初达理札雅带领段巴特尔、齐文奎、白海风、何兆麟、朱门、李文钦、戚涛等第一次前往银川,与杨得志同志会晤,并献了旗(详看文史第一辑插图)。达与杨得志会晤,明确了自身职责,接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急待去做的一系列工作任务之后,迅速返旗,开展了工作。嗣后,把保安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人民保安队,由宁夏军区任命罗巴图孟柯为总队长,朱子春为政治委员,罗曹格图盖日勒为副总队长,罗永寿为参谋长,杨富存、陶光锐、罗步云分别任为中队长,1951年提升段塔拉腾岱为五中队队长,提升左敬忠为四中队队长。其主要任务是维持全旗地方秩序,清剿散兵土匪。为此,四九年旧历十月份就开始把主力集中在阿旗北部地区,阻止德李匪部纵兵抢掠的罪恶活动,保护广大牧民的生命财产。

德王的蒙古自治的黄粱美梦破产后,在一九四九年元月南京

国民党政府发出和谈的当天，又乘飞机到南京，奔走四方，投机钻营，想从中捞取资本，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东山再起，重温“蒙古王国”之迷梦，纠集其日伪时期的一些旧部，打起三色条旗，自封为“蒙古军总司令”，拼凑出一个“西蒙自治政府”，自封为主席，给了达理札雅一个副主席，想与解放军顽抗到底。

李守信，原系国民党军阀，新编骑兵第一旅（简称新一旅）即其旧部，辽沈战役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以后，西行流窜，先后曾被绥远和宁夏改编，仍沿用新一旅番号。后闻讯德王在阿拉善旗成立“西蒙自治政府”，便又流窜到阿拉善旗磴口、贺兰山西麓。德李网罗察盟、锡盟散部整编为两个师，即第一师由苏和巴图尔任师长，孙明海任副师长。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团长萨布音，第二团团团长韩萨嘎拉。第二师由吉利占太任师长，塔拉巴任副师长。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团长罗布僧巴克什格根，第二团团团长翁盖。阿拉善旗人民把这股匪军称之为德李匪部。号称两千余人，其实连同家属也不过一千五百余人。

这股匪军，全系国民党溃军，人数不多，但武器装备较强，并有大型电台，缺乏给养，无人约束，破坏性很大。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后彻底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匪，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在磴口、宗别立、吉兰太、图克木、红古尔玉林、巴音诺尔公、宗沙勒扎、巴伦沙勒扎、宗乃、拐子、树贵十一个巴格，任意胡为，牧民群众遭受空前浩劫，人人恨之入骨。从十岁以上的女孩到七十岁以下的妇女被强奸者有之；行商走路，遭受洗劫杀戮者有之；闯入民房，抢劫衣物首饰、粮食财物者有之；驱赶牛羊骡马等牲畜者不计其数；仅拐子湖投诚时就有三千峰骆驼，尸骨堆积如山，目不忍睹。

根据党的宽大政策，宁夏军区首长多次通过达理札雅派员来往劝降。在十二月初全部集中啸居在水草丰富的拐子湖，虽然多次谈判，晓以大义，但内部情况复杂，难以统一。为了造成其走



投无路，必须投诚的形势，我军采取两种措施：一面继续派人劝降，一面增兵包围，张掖驻军从额旗截止其西窜的道口，阿拉善旗保安总队派出副总队长罗曹格图格日勒、段巴图尔、左甲木英等人组织了前线指挥部。总部设在巴伦沙勒扎海子库图勒，后又移驻淖尔格嘎顺。随同去的有四中队罗都固尔甲布、黄孟柯乌力吉、巴音毕力格、达希段迪布等，一部分卫队保卫总部。部队分布在东南两面，北面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必防守，料想他们不敢突击。北部各巴格负责人都听令组织民兵武装，计有宗沙勒扎旦必尼玛负责30人小分队，达西策林负责雅布赖40人的小分队，旦大尔负责图克木，胡对岱负责克白那木嘎，公毕力格、桑吉负责吉兰太，毕子雅、巴图斯迪、田曹格都伦负责沙勒希尔都、库克布勒都，达木林、陶图布吉尔格勒负责巴音乌拉。这些人的小分队共计率有70多人。布音特固勒德尔率有30多人的小分队，金藏吾、乌图那生率有44人小分队。这些人集中在总指挥部周围。后又从磴口、亭子一带调来第一中队杨富存部70人，段塔拉腾岱70余人的民兵队伍，从拐子湖东南形成一个半月形包围圈。总兵力约350人左右。

德王几次使用缓兵之计，口称和谈，实想寻找出路。但形势逼人，越来越使他感到穷途末路。于是在第二次派出和谈代表之后，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要求避难被扣留。直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底，蒙古人民共和国才答应他写信给拐子湖，召集他的主要部下到外蒙的察汉套尔盖会面。同时蒙古当局秘密逮捕了他派往拐子湖送信的随员贡其格，用德王信件召集李守信、宝贵廷、都古仍仓、苏和巴图、敖门巴图尔、托克托胡六人在国境线外予以扣留。到此为止，与人民为敌的德李一伙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之中。

德李一伙走后，拐子湖残部则群龙无首，三月一日，拐子军政头目二十余人，在我旗代表左甲木英、段塔拉腾岱，人民解放军酒泉驻军代表一人参加下，召开三天会议，商讨投诚问题。经



过反复争吵，我旗代表反复解释宁夏军政领导的希望和解放军的政策，最后达成协议，组织了“接受投诚委员会”。孙明海、塔拉巴、赵殿臣、王亲扎布等二十人为常委会委员。三月四日晨反动思想较顽固的一师一团团长萨嘎拉带领近二百人（内有80余人非军事人员），携武器向额济纳旗西窜，该团副团长嘎瓦拉喜率部二百零三人向东逃窜，到乌盟后大部分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截止四月十二日，拐子湖所留残部基本受降结束。最先受降的是塔拉巴部，约500余人；四月三日孙明海部受降约420人；四月三日有王亲扎布等率领政府文职人员209人投诚；四月七日一师残部369人也投诚受降。共计军、政、民940人，各类枪械266件，电台一部。受降人员根据个人表现和志愿做了适当安置，剿匪战争基本结束，大队撤回，只留段塔拉腾岱部和各苏木民兵少数打扫战场。

在这次清剿德李匪部中，大小战斗不下二十次，但总的情况是：从人数和武器上看是敌强我弱。但从性质上看敌人是非正义的，我们是正义的；敌人地生，人民群众反对它，我们是地熟，有人民拥护。从战斗士气上看，敌人如丧家之犬，心惊胆战，我军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盾，士气高昂。因而总的看我们有利因素多，所以能以少胜多。现只举几个战斗实例：

（1）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段塔拉腾岱刚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陈那筭巴图联系起义事项回来，听到德李匪部已在巴音诺尔公一带大肆抢劫，他非常气愤，立即组织弟兄五人即段图布新巴依尔、段敖子尔、段忠尼、段都古尔扎布，根据群众反映在夜间包围了七个土匪，经过英勇奋战七个土匪全部击毙。

从此他立即组织本巴格群众，扩大组织，很快组成70人的强有力的民兵组织。处处灵活机动打击敌人，德李小股匪军最怕这支小分队，敌人恨之入骨。

(2) 又一次在哈尔扎干以北，时间是在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敌人二十余人抢劫许多财物、牲畜，从一个小山口出来，与段塔拉腾岱的部分人相遇，立即展开激烈战斗。因为这次是双方突然相遇，准备不够，敌人虽然人多武器好，但他们心虚，又怕已抢到的东西丢失，故战斗情绪不高，一面开枪还击，一面四散溃逃。当时打死打伤七名，我方只轻伤二人。

(3) 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照例每天黄昏拔营，第二天拂晓宿营休息工作。这已是20多天的习惯性行军了。人们身体也很累了，白天轮流休息。我们这支小分队是专门保护电台，尾随德李匪部以侦察敌情为主，尽量避免与敌人接触，这是上级的指示。敌人也已经发现我们有一个电台小分队，监视他们的行动，扬言要抓获我们，搞掉这个“尾巴”。可是他们人生地不熟，根本找不到我们。我们有20多人，分队长巴勒扎，总管达西策林，台长魏钟文。这一天宿营在榆树沟北口，太阳刚出山，一切就绪。固定哨两人已爬上了两个山头的制高点，电机声嗡嗡响着，已经开始与定远营总部联系上了。负责做饭的人也已升起了炊烟，因为当时回旗的路被匪切断，我们的粮食接济不上了。经请示用枪打牛，暂时充饥，把牛身上的火印保存起来，以后照价赔偿。刚吃完饭，第一班哨兵换班不久，哨兵报告有情况，我们怕被敌人大队发现，立即集合命令五个人连同台长魏钟文以最快的速度收骆驼，装电台，准备躲避。大部分人由巴勒扎、达西策林指挥，先埋两面山顶上，经过望远镜观察肯定不是大队，而是小股土匪，拉伏在着十多个骆驼，满载抢来的东西，骑着骆驼，喝着酒，唱着小调向我们占据的山口而来。我们决定伏击这股匪军，隐蔽十分严密，敌人事先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等到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入山口伏击圈之后，巴勒扎队长一声号令枪响，二十多支枪口射出的子弹全落在敌人堆里了。当即击毙五人、击伤一人，其余四人在交枪不杀的喊声下，脱去了上衣，只穿着一一个裤衩，举着双手过来

投降。经过审讯才知道是苏和巴图师的人，出来抢劫粮食。但经过检查，衣服、首饰、粮食、油、盐、金银器用具、牲畜无所不抢。还有一个是大烟鬼，烟瘾大发，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全身颤动，请求“饶命”。

(4) 一九五〇年夏，郭永胜（即郭拴子）这股土匪在阿旗东部宗别立、乌达、布固图一带进行捣乱破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蒙蔽利诱少数思想落后、立场不坚定的阿旗防卡上的官兵及群众，后来在围攻定远营的同时，樊家营子防卡卡长孟巴特尔在郭拴子的指示下，杀害了阿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这股土匪活动非常疯狂，由宁夏军区担任剿匪任务。阿旗保安队共派出三个分队，协助宁夏军区部队，包围贺兰山，阻止郭匪往外逃跑。同时彭德怀给达理札雅来了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两次来信，都收到了。您将西安会议精神向干部传达，他们了解政策，稳步进行工作，对于增强团结，安定社使会秩序是有很大帮助的，望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额旗偏僻贫困，函宜协助发展，塔主席如能来西安面商，尤所欢迎！阿旗剿匪任务，已由省军区担任，是否需再拨子弹，请考虑见复为荷。

此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

宁夏军区包围贺兰山剿匪中，孟巴特尔逃跑到巴音布尔都巴格，由当地巴格边官捉拿归案后以法判处死刑，大快人心。

(5) 一九五〇年八月初的一天，一中队杨富存根据群众反映得知在太阳庙以南，沙金套海的豪依尔乌素南面白茨疙瘩内有土匪30—40人。杨队长立即率领两个分队出发，即第二分队长岳明征和第一分队副马吉拉共58人，快速进军到苏海敖尔布格附近，

从南面截住，不使其南窜。经过周密侦察不是三四十人，而是九十多人。敌人分别休息在三个坑内，他们正在按锅做饭，等到饭刚熟，准备吃饭时，我们吹了冲锋号，发起猛攻，敌人晕头转向，连一口饭也没顾上吃，四散逃跑。当时击毙一少部分，大部向北逃窜。第二天正好又遇到内蒙骑兵第四师的白马队。当时，他们也闻讯这股土匪西窜的消息，于是两家商议分兵合击。经侦察漏网七十多名股匪并未走远。在沙巴格图克木、查汉楚鲁（土城子）一带。这天又来了阿旗政府官员巴音敖其尔组织的民兵武装22人，于是从三面包围了敌人。敌人缺吃少穿，连日逃窜，疲劳不堪，于第四天拂晓，三面包围袭击，敌人还在熟睡，听到枪声，慌做一团，当场打死多人，并生擒了匪首张疤子。仅有30多人漏网逃走。白马队担任追击，其余部队打扫战场，战果辉煌。从此以后，阿拉善旗北部土匪基本肃清。

（6）一九五一年冬，从西窜逃过来的散兵土匪六七十人，进入巴音诺尔公巴格的豪依尔毛道一带，段塔拉腾岱当时在定远营，得知后速返巴音诺尔公时，这股土匪已经从此离去，到了民勤县北部的陶家井一带，土匪又从这里转到民勤县东部陶素图井进入我旗西部一带骚扰。为此，旗保安总队派第三中队队长罗步云（原巴盟军分区副司令员）、指导员张汉庆、分队长王振华（小）、杨宪忠等率两个分队五十余人前往查汉池，同时又命在哈沙图的第四中队队长陶光锐、指导员马明德、分队长胡策尔道、胡乌图那生率两个分队五十余人火速前往查汉池迎接第三中队，与第三中队协同作战。四中队前往查汉池与三中队会合，并带路到察拉格尔时，土匪得知这一行动，早已逃之夭夭。这次行动就这样未放一枪把土匪赶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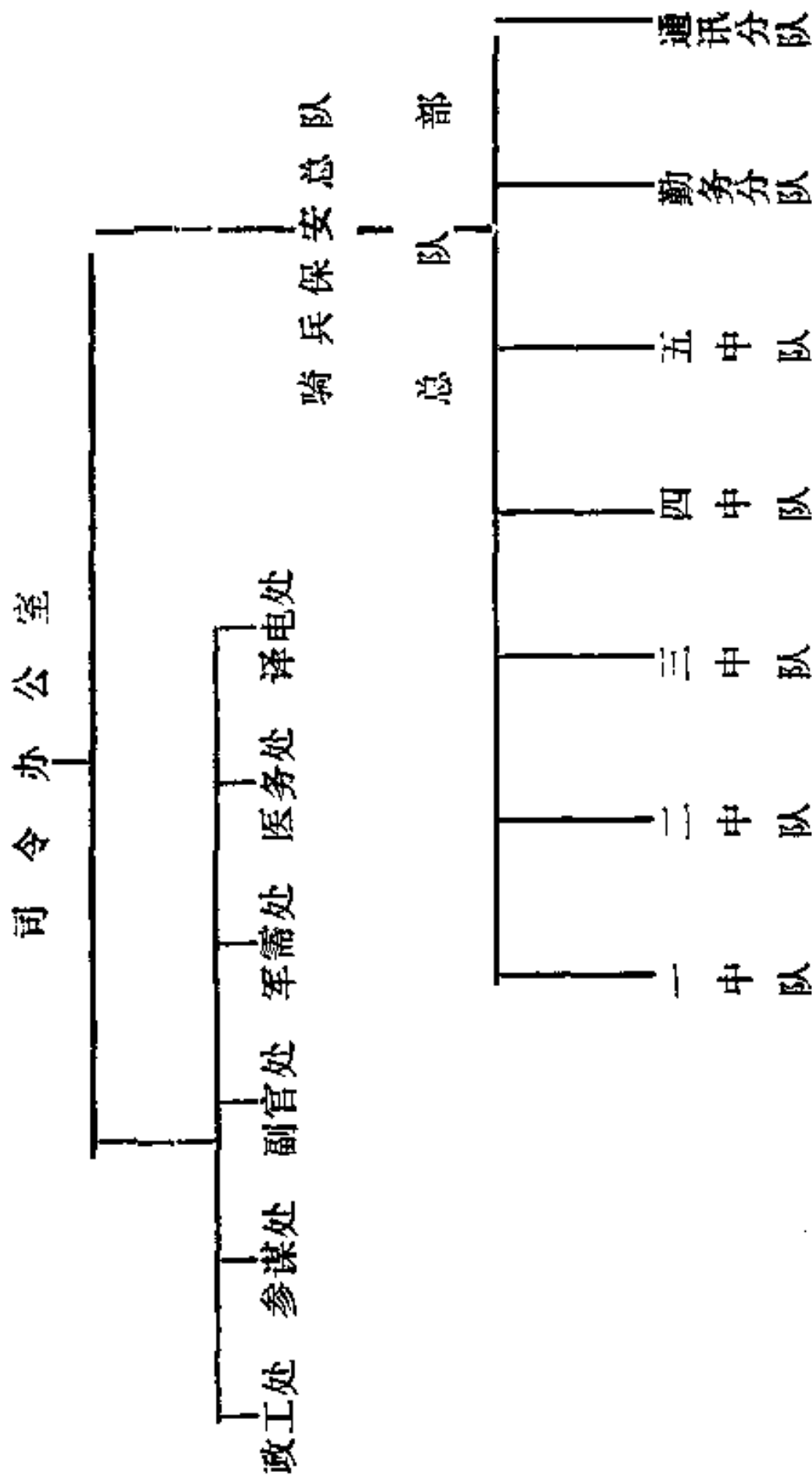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是根据当事人的提供和我们的记忆而整理，仅供大家参考，并批评指正，加以完善。

（附表1—4）



(表二)

一九四六年成立的阿拉善盟防司令部机构编制表



(表三) 一九四六年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保安总队员额编制表

番号	主管人	驻地	官兵编制			备注
			官员	士兵	合计	
区防司令部	达理札雅	定远营	50	22	72	马64匹
总队部	罗巴图孟柯	"	24	64	88	马64匹、骆驼25峰
一中队	杨富存	磴口、四坝	7	197	204	马175匹、骆驼44峰
二中队	陶光锐	定远营	7	197	204	"
三中队	范乌图那筭	"	7	197	204	"
四中队	罗都古尔札布	吉兰太一带	7	197	204	"
五中队	罗步云	阿旗南部一带	7	197	204	"
通讯分队	张元懋	定远营	26	134	160	马10匹、骆驼166峰
勤务分队	王振华	"	1	45	46	马40匹、骆驼6峰
总计			136	1250	1386	马1053匹、骆驼417峰
附注:	全总队共电台7部, 电话机若干部, 每个中队枪150枝, 子弹10000发, 机枪若干挺, 全总队有机枪24挺, 迫击炮三门。军官有手枪。					



(表四)

## 一九四九年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军官名册

序号	姓名	起义时职务
1	达理札雅	中将司令
2	陈爱尔德尼巴图	少将参谋长
3	朱门(子馨)	上校主任
4	张仁	上校副官长
5	郑礼范	上校主任
6	戚涛	" "
7	李文钦	" "
8	张元忻	" "
9	张德熙	" "
10	胡艾立佐巴依尔	中校副主任
11	王增堂	中校主任
12	郑铨元	中校股长
13	金巴图道尔吉	少校秘书
14	种建章	少校干事
15	张琦庭	" "
16	王相德	少校军需
17	金风臣	少校主任
18	刘翔如	少校股长
19	王荫卿	" "
20	魏文锦	" "
21	杨宝山	" "
22	赵治华	上尉
23	达遵	上尉政训员

(续一)

序号	姓	名	起	义	时	职	务
24	王	宝	上	尉	干	事	
25	史	章	上	尉	指	导	员
26	魏	聪	"				"
27	魏	荣	"				"
28	王	国	"				"
29	罗	麟	上	尉	参	谋	
30	辛	秀	"				"
31	谢	彬	上	尉	军	需	
32	鲁	智	"				"
33	张	惇	上	尉	副	官	
34	罗	平	"				"
35	田	宾	"				"
36	胡	卜	中	尉	副	官	
37	罗	素	"				"
38	申	国	中	尉	参	谋	
39	张	元	中	尉	军	需	
40	王	德	"				"
41	毛	民	少			尉	
42	陶	吉	"				"
43	陈	旺	"				"
44	王	瑞	"				"
45	张	鑫	"				"
46	毛	伦	"				"

(续二)

序号	姓	名	起 义 时 职 务
47	毛	大 喜	少 尉 副 官
48	张	光 海	" "
49	翟	成 温	少 尉 司 书
50	梁	福 庆	" "
51	张	昭	" "

一九四九年成立骑兵保安总队军官名册

序号	姓	名	起 义 时 职 务
1	罗	巴 图 孟 柯	少 将 总 队 长
2	罗	曹 格 图 盖 立 勒	上 校 副 总 队 长
3	罗	永 寿	中 校 总 队 副
4	范	立 宪	上 尉 书 记 员
5	杨	爱 力 佐 陶 格 图 呼	上 尉 副 官
6	王	励 德	" "
7	王	鸿 钧	中 尉 副 官
8	王	宪 文	" "
9	陈	子 升	" "
10	朱	增 德	少 尉 副 官
11	武	如 根	少 尉 教 练 员
12	魏	兆 福	少 尉 司 号 长
13	范	策 林 道 拉 玛	准 尉 文 书
14	司	旦 巴 艾 林 琴	" "
15	于	培 根	少 校 军 需 主 任

(续一)

序号	姓 名	起 义 时 职 务
16	毛 旦 增	少校军械主任
17	任 春 林	上尉军需
18	胡 春 业	" "
19	薛 海	" "
20	彭 次 格	少校医务主任
21	列 格 登 藏 吾	上尉军医
22	列 格 曾	中尉军医
23	尚 巴 敖 斯 尔	" "
24	范 老 迪	少尉军医
25	罗 恩 凯 巴 图	上校军马场场长
26	金 对 岱	上尉军马场副场长
27	张 倚	少校兽医主任
28	图 布 散 那 拉	上尉兽医
29	明 珠 尔	" "
30	劳 来	少尉兽医
31	张 富 存	少校中队长
32	陶 光 锐	" "
33	范 乌 图 那 笋	" "
34	罗 都 古 尔 扎 布	" "
35	罗 步 云	" "
36	马 怀 章	上尉副中队长
37	陶 意 乐	" "
38	毛 德 功	" "

(续二)

序号	姓名	起义时职务
39	罗 福 喜	上尉副中队长
40	左 敬 忠	" "
41	蔡 忠 元	上尉分队长
42	左 明 祥	" "
43	杨 马 希 别 立 格	" "
44	赵 才 旺 甲 布	" "
45	马 敖 其 尔	" "
46	范 图 布 新 布 音	中尉分队长
47	马 允 文	" "
48	罗 江 布 拉	" "
49	杨 殿 魁	" "
50	杨 殿 华	" "
51	岱 沙 拉 扣	" "
52	罗 忠 麟	" "
53	蔡 巴 拉 登 道 尔 格	" "
54	沙 金 德 勒 格 尔	" "
55	布 音 特 固 勒 德 尔	" "
56	罗 丑 路	" "
57	段 塔 拉 腾 岱	" "
58	段 甲 拉 岑	" "
59	王 根 东 段 迪 布	" "
60	岳 图 布 扎 雅	" "
61	伊 喜 淖 尔 布	少尉分队长

## (续三)

序号	姓 名	起 义 时 职 务
62	杨 登 旺 希 格	少 尉 分 队 长
63	宋 布 尔	" "
64	包 德 吉 尔 格 勒	" "
65	罗 旦 巴 甲 木 素	" "
66	罗 克 迪 布	" "
67	罗 尚 巴	" "
68	何 福 全	" "
69	金 藏 吾	" "
70	艾 尔 登 别 立 格	" "
71	杨 宪 忠	" "
72	张 宏 达	" "
73	王 海 山	" "
74	雷 镇 邦	" "
75	段 忠 尼	" "
76	马 斯 格 尔	" "
77	图 门 吉 尔 格 勒	准 尉 分 队 长
78	段 迪 布	少 尉 特 务 长
79	布 仁 巴 依 尔	" "
80	马 维 存	" "
81	杨 巴 音 达 来	" "
82	马 那 笋 敖 其 尔	" "
83	布 音 阿 尔 布 吉 呼	" "
84	谢 宋 布 尔	" "

(续四)

序号	姓 名	起 义 时 职 务
85	张 元 惲	上尉通讯分队长
86	蒙 巴 特 尔	中尉分队副
87	魏 钟 文	中尉台长
88	王 永 仁	" "
89	毛 滑 清	" "
90	罗 正 机	" "
91	散 巴 依 尔	" "
92	谈 国 录	少尉通讯员
93	柴 效 勒	" "
94	苏 光 璞	" "
95	薛 来 瑞	" "
96	李 乌 那 炳	" "
97	陈 希 格	" "
98	齐 旺 昌	" "
99	旺 宝 昌	" "
100	严 宝 卿	" "
101	肖 云 英	" "
102	乔 袁 才	" "
103	袁 纪 尔	" "
104	杜 古 尔	" "
105	王 振 华	勤务分队上尉分队长
106	胡 乌 那 笋	少尉分队副



# 阿拉善旗人民在解放初期的对敌斗争

杨永忠

阿拉善旗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后的最初一年里，在社会治安上面临的重大问题，一是国民党溃散残部和贯匪退入阿拉善旗的贺兰山山区及北部广阔牧区，他们中的少数人奸淫抢掠，残害无辜人民，使阿拉善旗人民遭受了数十年未遇的匪祸灾难；其次是有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特务分子趁人民政权诞生之机，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再次是一些不法分子乘机行凶抢劫，残杀人民群众，制造恐怖局面。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定远营城西附近发生的抢劫案一起，杀死群众二人；一九五零年元月在头道沙子又发生一起抢劫案杀死群众一人；同年春天，我盐务局局长李开同志在春发号执行缉私任务时被七个走私盐贩暗杀；不久，在西关附近又发生持枪抢劫案两起。面对这极为严重的的扰乱破坏，阿拉善旗人民政府紧密配合中国共产党阿旗工委，在兰州、西安、宁夏各级党、政、军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党、政、军、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与匪特进行了大约一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剿匪特的重大胜利，基本安定了社会秩序，为阿拉善旗的和平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旗人民在解放初的对敌斗争主要有三个方面，现分类简介于后：

## 一 解决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残部问题

德穆楚克栋鲁普（下简称德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来阿拉善

旗拼凑“蒙古自治政府”。四月十三日在定远营先开完各盟旗代表大会后，偕同阿拉善旗代表金巴图道尔吉赴广州向败退的国民党政府请愿，到广州后看到国民党已处于即将覆灭状况，因此他把实现蒙古独立寄托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他乘机加紧与在华的美国特务联系，其实在他来阿旗前（四九年春），德王就得到美国陈纳德设在兰州的民航公司负责人斯特尔色的帮助，并给了他一部美制电台带到定远营安置，因达理札雅反对，不得不迁设在乌兰察布盟盟长林庆僧格（林王）处使用。在筹建“蒙古自治政府”时，美国新闻处还派来美国特务白智仁进行公开特务活动。

德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他到广州，曾与美国新闻处马滋联系，得到几部电台，其中有一台是带汽油发电机的大型电台。美国特务机关还给派来七、八名蒙籍报务员，安置在阿旗北部。由达瓦敖斯尔主持搜集情报，向美国新闻处报送。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对他说：“我们美国政府承认你是蒙古的代表者”，并答应，美国大使馆派一个适当的代表，常住定远营。以后，因阿拉善旗解放，这个美国代表未能来成。那些美国培养的报务人员，也只好拿着瓜分了美国人给的金条逃到乌盟的巴彦陕丹去了。

在阿旗临解放前，德王准备西窜时，首先已联络他的旧部李守信等到阿旗北部会集。当他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窜到阿旗北部图克木庙的同时，李守信残部也陆续赶到图克木庙。于是德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的卖国亡灵得已死灰复燃，不同的是靠山改成了司徒雷登。

德王到图克木庙后，起先组织起他的“主席行辕”，接着就改组他拼凑起不到一个半月就垮台的“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会议”，除了他自己任主席外，还保留了达理札雅副主席的位子以示拉拢。同时任吉致祥（吉尔格郎）为秘书长，策仁道尔吉为副

秘书长,阿由尔扎那为内务署署长,韩聿为副署长,王亲扎布为财政署副署长,贺华儒为实业署署长,陶布新为教育署署长,海福泉为“蒙古会议”代理议长,张世杰为议会秘书长。军事方面,他重新打出日伪时期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己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长,将新骑一旅和由察盟、锡盟网络来的零散部队编为两个师,第一师由苏和巴图尔为师长,孙明海为副师长,赵殿臣为参谋长;师下由萨伯音为一团团长,韩萨嘎拉为第二团团长。第二师由吉利占太为师长,塔拉巴为副师长,托克托胡为参谋长;师下由罗布僧巴克什为第一团团长,阿克登阿为副团长,翁盖为第二团团长。

德王为了表明他的“独立性”,在阿拉善旗的土地上重新改用蒙疆时期的三色条旗和成吉思汗纪年,德王直到全国解放之时,还在做着“蒙古独立建国”和当“蒙古帝国皇帝”的黄粱美梦。

德王的政治野心虽然很大,但是他自知势力孤单,因此内心一直很空虚。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份,他到阿拉善旗不久,在他“大蒙古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抱着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也试试看的希望,曾派他的侄子阿拉坦瓦齐尔前往阿旗与外蒙交界的地方,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联络,阿拉坦瓦齐尔到乌盟中公旗(今巴盟乌拉特后旗)停留下来,直到同年八月份才与外蒙方面接上了头。

在德王派去的联络员还未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上头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了争取德王,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份,就派遣旦巴仁钦来到阿旗北部防卡,与阿旗保安队驻该卡的中队长段塔拉腾岱接头,要求提供德王到阿旗搞蒙古自治的情况,并约定在同月三十日到查汗陶力盖防卡碰头。段按约定的时间到查汗陶力盖,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官布盟长见面,述说了德王在阿拉善旗搞蒙古自治运动的情况,官布委托段塔拉腾岱将蒙古人民共和国送给德

王一匹兰色缎子、银碗及一条哈达和德王在外蒙的儿子都嘎尔苏隆的一条哈达、一封信转交给德王。时因德王赴广州未归，段将这些物件交由阿旗协理罗巴图孟柯暂存代转。德王回定远营后接到了礼品和信件时，因阿旗还处在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深恐事机不密，惹出麻烦来，就给他儿子复信，嘱他不要再来信，以免影响他搞“蒙古自治”，仍委托由段塔拉腾岱秘密转交，同时带去德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封信。同年九月初，蒙古人民共和国又派出巴图吉尔格勒进入阿旗北部防卡，要求与德王见面，由段塔拉腾岱于九月十九日带抵定远营住在罗巴图孟柯家里。当时由于宁夏临于解放，德王急于准备出走，忙得不可开交，答应让巴图吉尔格勒在附近草地等候。九月二十日德王由定远营出走，行至距定远营约二十里的库列图井，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的巴图吉尔格勒会了面，巴交给德王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带来的缎子、哈达和信件，并说：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派来罗布僧和他的儿子都嘎尔苏隆等，已在阿旗北部沙尔扎的察汗套力盖等候了一个来月，希望前往会晤。当时德王仍急欲西进，对外蒙尚存有戒心，不想到沙尔扎与蒙方会晤，而想先到图克木庙，然后前往他的联络基地巴彦陕丹，用事先布置下的电台通知集结在内外蒙边境上的锡盟、察盟零散部队来阿旗。于是和蒙方约定让他儿子等在农历八月十八日到巴彦陕丹等候会面。

当德王于农历八月十九日到巴彦陕丹时，外蒙的巴图吉尔格勒又邀他到外蒙境内的哈拉额尔格与其子会晤。德王到达指定地点后只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次长巴雅尔见了面，巴雅尔告诉德王说：乔巴山元帅派来的罗布僧和你的儿子，以为你不来了，都回去了。住了数日后，德王离蒙回图克木庙，临走时德王把桌子上的两个半盒烟装在一个盒里，并说“把这两个合起来好”，以暗示内外蒙合并起来。

德王由图克木向拐子湖西进，行至巴伦沙尔扎时，蒙方又派巴图吉尔格勒通过段塔拉腾岱约德王相见。德王即派贡布到蒙古边境的察汗套力盖，与蒙方的巴雅尔相晤后，巴雅尔又复派巴图吉尔格勒随贡布返回沙扎尔，言称有要事相商，邀德王亲自前往相会。于是德王到拐子湖，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进行联络和治疗腿病之名去蒙古人民共和国。

正当我人民解放军派人争取德王等投诚之际，德王则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晨，同策仁道尔吉、图门德勒格尔、贡布等人前往察汗套力盖转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临走时，由吉致祥派韩萨嘎拉团长率领部队护送到国境线上。从此，德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呆了九个半月，才被引渡回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份，德王在阿旗图克木庙一带集结其军政残部及家属等两千多人，面临这些严重骚扰牧区的匪情，宁夏党政军首长为了和平解决德、李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耿彪、葛宴春、副政委潘自力等于十月十五日给阿旗政府旗长达理札雅来电话：“宁夏全省解放已将近月，各处散兵及建制的武装已均至本部报到投诚，本部均予宽大处理。唯前宁陕边区游击司令李守信、宝贵廷等不明我军政策，仍未敢前来接洽，流窜各地，危害群众，人民纷纷至本部，要求派军前往兜剿。本部为顾全人民利益与该部官兵负作无谓牺牲计，仍愿该部官兵自动积极前来参加新宁夏建设工作，先生与李、宝等相分有素，请即派人至李部，指明前途，晓以大义及我等政策，令其速派负责人代表来宁商谈一切，本军当本宽大精神加以处理，李、宝等亦不难求得人民谅解。如仍执迷不悟，则本军一到，不难剿灭，望李等能听先生劝告，翻然觉悟，不得自绝于人民是盼！”（电文原件藏阿左旗档案馆——编者）

十月十六日，杨得志、李志明又给达理札雅写来亲笔信说：“对前宁陕边区游击司令李、宝等，欢迎其自动前往参加宁夏之建

设，请速派人前往接洽一事，已经函达。近闻德穆楚克栋鲁普先生现在乌盟，亦请派人前往转告。如德先生能与李、宝等部队同来，亦表欢迎，准予自新万勿自误”。（电文原件藏阿左旗档案馆——编者）

达理札雅接到杨得志等首长的电信后，与彭德怀派来的专作政治争取德、李工作的张钦武等研究，指派曾与德、李共过事的洛不登、包国栋二人，带上达理札雅给德王的信及在定远营起义的蒙太等人给德、李部下的信前往图克木庙劝降。

走投无路的德、李部下的思想很混乱，对时局的见解很不一致。大体有三种：陶布新、王亲扎布等人主张去宁夏接受解放；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张去外蒙找出路；德王、李守信、苏和巴图尔等人主张西进找美蒋，但他们却怕内蒙的解放军骑兵和宁夏的解放军前往图克木清剿，为了缓兵之计，德王才决定派陶布新为代表，带上他给宁夏党政领导人的信，随同洛、包二人到定远营，转赴宁夏商谈。信中提了三条要求：一是要求采取公民投票方式，实现内外蒙古合并；二是要求把国民党政府对蒙旗实行分割统治的各边省政府撤销，归由蒙古自治机关统辖；三是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并囑陶布新说如果宁夏方面不答应，你去兰州见彭德怀，如果解决不了，可去北京见毛主席。安排就绪后，于十一月八日德、李便率部西窜抵巴伦沙尔扎庙。陶布新代表到定远营后，由张钦武和阿旗的威涛陪同，于十一月七日抵银川与杨得志等首长洽谈。在洽谈中，陶布新提出要求将马鸿逵存放在阿旗北寺的三万斤粮食拨给新一旅作为给养，其他问题想到北京去谈。杨司令员当即指出：德王必须先放下武器，将部队集中改编，然后才能拨给粮食；政治和个人出路问题，在银川谈或去北京谈均无不可。希望德王亲自来谈，谈毕由兵团民运部、统战部设宴招待，陶布新酒醉回招待所，感慨很多，并对威涛说：回去后，如德王仍执迷不悟，我个人则自图解放。

十一月十七日，德王给达理札雅来电说：他到沙尔扎等候陶代表其间，“极力整饬军纪，以免扰民，惟部队粮食、服装极感困难，祈速予设法接济”。德王还让陶布新向阿旗借用电台和蓄电池等事，均被达理札雅以“自无存余，请向杨司令员接洽补给”等词，予以拒绝了。

德、李残部窜到沙尔扎后，声称整饬军纪，实际上他们在给养断绝、缺粮缺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制止抢掠行为。他们经常出动小股人马，打家劫舍，掠夺民财，抢粮杀畜，奸污妇女，涂炭人民，当地群众处在土匪与异国的夹层中间，进退两难，叫苦连天。当时旗保安队中队长段塔拉腾岱驻守北部防卡，因人少力单只有五支枪，无法对付匪徒的抢劫行为，很多群众自行迁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避难，被对方阻止。为了保护牧民生命财产安全，段队长一面经请示旗政府同意后亲自与旗上派来的黄孟柯乌力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交涉并签定了临时移民协议，将走投无路的四十四户牧民寄居在蒙古。一面发动群众，组织起原保安队的七十多名退伍士兵，用旗政府拨给的五十多支步枪武装起来，进行自卫。但德、李匪徒的抢劫行为并未收敛，还扬言说：“阿拉善八路，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旗政府指示段塔拉腾岱对德、李只阻止其抢劫行为或缴其枪，不要杀害人。起初，段等只用和平方法劝阻抢劫行为，但敌人很顽固，屡劫不息，经常发生战斗，还开枪打掉了段的帽子，引起保安队战士的义愤，当即打死土匪五人，才使他们略有胆怯。为了制止他们的罪恶行径，阿旗保安队负责防守北部的副总指挥罗瑞光，于十一月份，派巴特尔向德王联系投诚事项，德王复派王亲扎布、图门德勒格前去回访罗瑞光，商定了互派代表商谈的时间、地点，罗瑞光则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派左甲木英敖迪布和段塔拉腾岱前往德王驻地，与德王、苏和巴特尔、吉利占太、塔拉巴等进行劝降会谈。



在会谈时，左甲木英敖迪布等先说明阿旗解放后的情况和共产党对德、李的宽大政策，接着说明宁夏省的领导们希望他们早日自动投诚、归向人民的诚恳希望，并向其指明，现正值寒冬季节，这样多的人，没吃、没处住的，靠抢劫人民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弃暗投明，早日投诚，才是唯一出路。德王听了后，很生气的回答说：“我们是为了蒙古民族才这样勤奋努力，而不是什么作贼抢劫、混日子，给人民带来一些困难，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德王还对阿旗的解放进行极为不满的攻击，而且还以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名义要求阿旗承担他们的给养。

经过此次劝降会谈，双方议定了以下几条：1、德、李部队移驻到地势低洼、水草肥美、燃料丰富的梭梭林区拐子湖；2、为免双方部队外出时发生冲突，议定德、李部队外出要打兰旗，旗保安队外出要打红旗，对德、李部下非抢掠者，不许开枪射击；3、双方保持正常联系；4、粮食问题，待移居拐子湖后再行考虑接济。

阿旗保安队前往劝降会谈结束后，德王派到银川会谈的代表陶布新回到了沙尔扎。陶向德王汇报了银川会谈情况及宁夏省方邀德王亲自往银川会谈的意见后，德王便召集科长、排长以上官员会议，由陶布新当众宣读宁夏潘自力主席的复信和介绍赴宁夏洽谈情况，经征求大家的意见，仍为三种，1、投诚，2、犹豫，3、西进。结果决定，仍派陶布新再去宁夏会谈，并增派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一同前往，德王给陶、吉二代表的任务是“催促答复上次信上所要求的事情，宁夏方面如不予肯定答复，你就要去兰州见彭德怀”。

德王第二次使用缓兵之计，派出会谈代表时，又发表了他的民主主义论调，他给达理札雅的信中说：“陶代表返此备道，兄协助商谈热诚及爱护弟至意，古道热肠，无任感荷，至嘱赴定转宁一节，弟本拟前往，惟一因上次请求三事，即未蒙转请，亦未得明确答复，二

因部队正在严明整训，禁止外出，诸需亲自督导，设如骤离，深恐军心动摇，变出意外，或又私出扰民，兹仍派陶布新并加吉利占太为代表，赴宁会商政治问题，请为协助，弟决定率军政员及部队，在贵旗及额旗境内逐水草移动而居，立候回音，现在部队仅有肉食，缺乏粮食，请设法接济，或请杨司令员拨借，以资安顿部队，吾兄所派左主任已来此，关于协同取缔散兵游勇，以及人民认取被征驼马办法，均已办完，详情当由左主任电述，并请吾兄命令附近各村负责人员与敝处紧密联系为祷。弟德穆楚克栋鲁普亥东印。”

二次会谈时，德王又给毛主席发了电，原文如下：“定远营达旗长转宁夏杨司令员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钧签：顷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扶持少数民族，使其自治自决之方针，并由阿拉善旗旗长达理札雅先生转来驻宁夏杨司令员发布之传单文告，更有详确之说明，本人从事蒙古自治运动多年，对于民心之趋向，蒙古之情形，知之较详，兹提陈三事，敬请钧座予以求全承认，不胜企祈之至。

(1)现在内外蒙古限于国界，东西蒙经济形态、文化程度并各种现实情况，各有不同，在目前阶段下，暂应使其分别自治，然蒙古民族无论内外与东西，由于有其共同之语言、文字、血统、生活与风俗习惯，当亦有其民族自决统一之共同愿望，请准予在相当时期以后，即行东西蒙古人民总投票解决蒙古民族自决统一运动问题，俾当属于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践扶持民族自决之主张。

(2)本年八月五日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经一致通过蒙古自治法，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暂以锡林格勒、察哈尔、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青海、新疆各盟旗及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九旗三特别旗为领域，以实行民主政府，发展经济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自治纲领，并规定境内各人民不分阶级、种族、宗教、性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至请尊重人民公意，适

应实际情形，在蒙古民族自治统一运动未实现以前，对于蒙古自治政府予以承认，以示优待少数民族之至意，并安蒙古人之心及西部蒙旗之社会秩序。（3）请命令边疆各省，将所分化统制之蒙古盟旗，划归蒙古自治政府管理，以示尊重少数民族之权利。总之，现在分别自治是暂时的过程，将来蒙古民族自决统一，是永久的目的，为陈请以上事的细节，特派陶布新、吉利占太为代表，赴京晋谒钧座，至愿赐予延见面示一切为禱，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叩戌三十。”

德王在二次派出赴宁会谈代表后，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扣留未归。一九五〇年一月毛主席访问莫斯科时，德王曾想要求蒙古人民共和国转送他到莫斯科见毛主席，但他又觉得，这样去不就是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了吗？向共产党低头，他仍不甘心，因此就没有向蒙方提出来。一九五〇年二月底，蒙古人民共和国答应他给拐子湖部下写信，召集他的主要头目到外蒙的察汉套尔盖见面，当他派随员贡布回拐子湖送信时，他也于二月二十八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秘密逮捕，随后，被德王用信请到我国边境外的李守信、宝贵廷、都固仍仓、托克托胡、苏和巴图尔、敖木巴图尔等六人，也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扣留。至此，与人民为敌将近二十年的战犯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归宿。

一九五〇年二月四日陶布新等代表，带上宁夏政府主席潘自力等首长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劝降书回到了拐子湖，但此时的德、李残部已经变成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降与不降的大事已无人作主拍板，由于粮食断绝，他们只靠抢劫民财，杀食牲畜来维持残生。

二月底德、李部下得知德王已被蒙方扣押和德王来信同意部队缴械的确实消息后，长期套在愿意早日得到解放的德、李部下头上的紧箍咒才算解除了，除了少数极端反动分子外，多数人已积极

准备投向人民的怀抱。

德、李残部军政各方头目代表二十余人在拐子湖开会三天商讨投诚事宜时，驻甘肃酒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一人及阿拉善旗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就缴械问题，去向问题，给养问题进行了反复争论，最后对投诚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见解，并组成了“接受解放委员会”，文职处长以上、武职少校以上官员均为其委员，并设常务委员会，其成员有：吉尔格郎、孙明海、陶布新、赵殿臣、达理札布、白晶泉、特格希、塔拉巴、王亲扎布、秦风鸣、韩嫩等二十人。阿旗政府于三月二日收到他们于二月二十五日分别给宁夏潘自力主席、内蒙古乌兰夫主席发出的投诚通电后，阿旗政府当即分别向兰州、内蒙、宁夏的诸首长进行了转报，并对接受投诚的安置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请示，同时要求上级派人来旗与对方商定有关事宜。

“接受解放委员会”给乌兰夫的通电中说：“陶布新代表返此带到钧座及宁夏潘主席手示，并备道，钧座领导蒙胞走向解放光明道路，树立蒙古自治基础，并对吾们宽大，不胜感激之至。敝前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敝前副司令李守信先生，亦由外蒙来信指示吾们接受解放，除敬将钧座手示，向随人民，全体军政人员士兵宣布，并电潘主席等外，对钧座手示中所示三点，敬谨接受，服从领导，现已组成解放委员会……以便集中众意，究讨优满接受解放及集中地点，沿途所需粮食问题中，俟有具体结果再行电陈。敬先电闻，祈赐指导，并恳转报毛主席、周总理、李主任委员为祷。”

“接受解放委员会”给阿旗政府的电称：“达旗长锐荪、罗协理相臣兄勋鉴：敝等前于宣传流亡塞外，既承殷切关怀，今接受解放，走向光明，尤蒙诸多指导盛意隆情，无任感极，兹有乌、潘两主席接受解放电报，请迫身转发，尚有数事，敬陈于后：一、究于何地为宜集中整训地点，敬请代为考虑，希望予以指

示，酒泉方面致其代表信中云：德王问西北军政委员会交由宁夏处理；二、到达集中地点所需食粮请予设法；三、一部老弱兵及人民，希望承发解放，愿在贵旗或乌盟、额济纳人民，请分神商请并予以居住耕种及畜牧上之一切安置，员兵愿入贵旗、乌盟及额济纳保安队服务，亦请并事收容。以上各项固属不情之云，请弟请兄等，爱护同族不遗余力，既宠怀于前，必成全于后，今后敝等深愿依赖兄等领导，信任兄等之指示，依赖兄等之协助，谨此电达敬候示复。”

德、李部下虽然决定宣布投诚，但在去向上尚有很大顾虑，特别是作恶多端的少数人更为忧虑，如第一师中的一些人，怕阿旗、磴口地区的人民群众，揭发清算他们好淫、抢劫杀害无辜人民的罪行，故想离开阿旗；第二师的很多人，担心曾在内蒙地区打过仗，怕被送回内蒙受惩罚。既有严重罪行，且反动思想较顽固的匪团长韩萨嘎拉声称要投诚，实际则于三月四日晨偷偷带士兵一百二十多人，胁迫非军事人员八十余人向额济纳逃窜。该团副团长嘎瓦拉喜率部二百〇三人，声称东去接受乌兰夫的改编，流窜到阿旗查盖扎得格和宝勒敖包一带继续进行抢劫。对此行为，旗保安队杨富存中队长，当即于四月率部一百多人前去进剿。

根据德、李部下宣布投诚的情况，宁夏省政府和省军区于三月七日给阿旗政府和中共阿旗工委来电指示：“一、德王、李守信匪部若依吉尔格郎等通电精神及罗瑞光二月二十七日电所报各节再无变化时，你们应争取全部和平解决，我们亦拟派负责同志到定远营直接商谈此事；二、若匪部发生其他变化，你们应用各种关系展开争取瓦解工作，必须争取瓦解其大部或一部和平解决；三、除以上两点外，你们应令罗瑞光大力加强对该匪的侦察工作。”

三月十日，潘自力主席又来电指示阿旗达理札雅和白海风委员说：“一、德王、李守信部如有投降诚意，最好你与他约定地

点见面，或你派代表与他联络，同时给他指出以下数点：（一）指明蒋、美反人民阴谋全部失败，解放战争已在全国取得胜利，不应再抱任何幻想，如再继续顽固反对人民，必遭惨败后果；（二）叫他幡然悔悟，率部投诚，集中指定地点，进行整编改造，使之成为蒙古人民革命武装，可保德王、李守信财产安全；（三）德王、李守信愿走西安、兰州或住银川听其自愿，我设法帮助。二、尽力多方争取，进行瓦解工作，争取其中部份；三、请将所了解当即详细电告。”

三月份以来，受降与投诚工作进入紧张阶段。德、李“接受解放委员会”的吉尔格郎、孙明海等不时向阿旗和宁夏省汇报情况，洽谈投诚的代表陶布新等除了到我方联系具体事项，还向德、李部下宣传已经解放了的银川和定远营的所见所闻，讲解顽抗或投诚两条道路的利害关系，做了大量的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通过双方代表反复宣传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后，德、李内部开始分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多数人逐步走上了缴械投诚的道路，只有约四百人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流窜抢劫。

经过武力兜剿、政治瓦解和平争取的艰苦斗争工作，截至三月二十二日，已向我缴械投诚的有塔拉巴部八十一人；米王部十四人；阿巴格旗马希巴图二十四人。正在集中待降的有第一师所属五百多人。

根据当时的情况，旗政府向宁夏省请示了三条意见：“一、请省上速派负责同志来定远营与陶布新等代表共同商讨投诚的具体问题；二、请速拨供粮食给已缴械投诚者和准备接济正在集中准备投诚者；三、因贺兰山匪有股匪，为防止发生意外，投诚部队须在就地缴械后，暂行集中本旗达理克庙和沙里湖路素两地，俟省府派负责人来再商定集中整训地点。”

宁夏潘主席当即回电同意阿旗的三条意见，并于三月二十五日派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来旗协助解决有关问题。经过几方

会商，拟定了具体解决办法，三月卅一日，以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阿旗工委书记曹动之、阿旗政府旗长达理札雅名义给阿旗保安总队副总队长兼前线指挥官罗瑞光发去急电，让其转给德、李“接受解放委员会”吉委员、孙委员等。急电内称：

“为处理你们接受解放过程中各项困难问题，经我会商决定办法如下：

一、你们如果幡然来归，政府决以宽大为怀，对以往行为绝不追究；

二、接受解放员兵须就地缴械完全缴给阿旗罗副总队长暂为保管，俟整训后再予发还；

三、官兵编迁可按志愿，愿为军人者，可编为阿旗保安队，中央人民政府可按解放军地方部队标准补给一切；愿回原籍者，可资迁回籍；

四、愿在阿旗落户为民，可以分别予以帮助和安置；

五、喇嘛官兵愿继续当喇嘛者，无论在阿旗或他往，均可听其自愿；

六、前自治政府人员，经短期学习后可予工作；

七、集中地点为定远营，南来时沿途所需食粮可设站供应。

以上各项希望你们转达给全体军政人员，毫无顾虑的按照上述办法执行为盼。”

曹副司令等的七条决定发布后，第二师塔拉巴等在哈尔扎干率三百三十五人集结在达力克庙投诚，计有军人一百五十二人，“蒙古自治政府”职员等二十一人，眷属男七十六人，女八十六人。共缴各类步枪一百〇五支，机关枪十挺，各类子弹一千五百八十粒。

盘据在古尔乃一带的第一师，由孙明海、秦风鸣率领投诚时，有三十七名顽匪不愿投降，携带步枪三十七支，手枪十三把，机枪一挺，向北逃窜，经阻击无效。四月三日，孙部四百二



十余人和眷属，行政人员一百二十四人，迁至哈尔札干一带集中待命。至四月七日第一师三百六十九人缴械步枪八十三支，冲锋枪八支，机枪四挺，各类子弹二百十四发。

四月三日，在另一个地方的吉尔格郎、王亲扎布、达理扎布等，率领“蒙古自治政府”人员十一人，士兵十四人，眷属男六十四人，女四十人，伙同哨兵八十人，共计二百〇九人，在巴斯苏来投诚，并缴三八机枪一挺，并类步枪、手枪十六支。

为了妥善安置缴械投诚人员，阿旗政府在曹又参副司令和曹动之书记的具体领导下成立了整编委员会，下设军事、文职、人民、供给四个组，分别处理调查、登记、编迁、供给等事宜。阿旗政府还决定用九十峰驼骆运送两万斤粮食到集结地点进行接济。由于德、李残部的衣着破烂不堪，曹副司令和曹动之书记向宁夏军区要来五百套单军衣为他们换装。

为了耐心争取拒不缴械的巴、宋股匪四百多人和温盖、鲁布桑股匪一百七十人，旗政府又电令投诚首领孙明海派人前去劝降，并表明如能来降，仍同前一样宽大对待，但这些顽匪不听劝解，继续流窜，又持续了约四个月，最后被我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

至四月中旬，德、李残部共向我人民政府投诚归来的军、政、民等共计九百四十人，除了因换粮、换衣或变卖而遗散在牧区的武器外，共缴各类枪械二百六十六件，电台二部，其中：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十四挺、冲锋枪二十一支，手枪二十把、步枪二百〇七支。

对投诚人员的安置问题，经各方协商研究后，曹又参、曹动之、达理札雅于五月三十一日向宁夏省党、政、军首长进行了电告：“查德、李投诚部队文武职人员及民户大部份已到达定远营，现经整编委员会与阿旗政府双方会商推定处理办法如次：

甲、部队方面：一、除落户、回原籍及学习人员外，其余二百五十六名，控请整编为两个中队、一个分队，隶属阿旗原保安总

队，餉项服装按地方部队规定由宁夏省按月拨发；二、拟请将带领部队投诚有功的主要军职人员分别在旗保安队留用并量才任职。

乙、文职人员：一、拟将学能俱佳，熟悉蒙情，历经险阻劝导投诚贡献较大的陶布新等人，分别予以适当安置，以示奖励；二、志愿参加学习的有四十三人，其中军人三十二人，文职人十一人，拟准按其志愿分别迁送西北民族学院和张家口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学习。

丙、落户回籍问题：愿在阿旗落户为民者有一百三十三名，愿回原籍者共二百四十六名，拟准照办。唯布里雅特人拟请资助路费由阿旗草地集体自行还乡。

丁、尚未到达定远营的人员，共约二百名，均为就地落户和回原籍者，拟请照准。”

宁夏党政军领导同意按以上各点执行。

至此，德、李残部的问题基本解决，阿旗人民政府于四月十八日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报告了战果。

## 二 剿除零散股匪

一九五〇年初，国民党新疆残部以乌斯曼为首的哈萨克匪徒约二千多人，盘据在额济纳旗境内马骝山一带，不时以百余人左右的小股出动，进行残无人道的抢掠杀戮。

阴历腊月底，哈萨克匪徒约三百余人窜入阿拉善旗的古尔乃地区，腊月二十一日，有二十多个匪徒对我防卡进行抢掠后，又窜至西尼呼都格防卡抢劫，我卡长蔡灵及卡兵二十一人残遭杀害，当地居民十之八九也遭抢劫，并掳去我群众男女各一人。正月初七日，哈匪再次抢劫，掳去男女小孩八名，抢去民驼五百多峰。月底，又有哈匪二十五人出动，抢去我大量民财，抓走喇嘛一人。他们共抢去小孩十几名，多是十几岁的女孩，有的在匪患平息后才从新疆的哈密找回来。

阿旗人民政府得知哈萨克匪徒窜入境内，进行抢劫杀害罪行时，一面电令阿旗保安总队，驻守北部地区的副总队长罗端光，进行严密防范和监视，同时派罗福喜通知驻南部的中队长罗步云到喀什哈一带进行防范；一面于一九五〇年元月五日，分别向西北军政委员会一野总部、宁夏省政府和省军区汇报了匪情，并要求上级从甘肃张掖地区就近派解放军围剿。元月六日彭德怀副司令员和张宗逊副司令员给达理札雅回电说：“已令驻张掖高台部队向古尔乃围剿哈萨克。”二月二十四日，兰州一野总部给达理札雅来电通知说：“哈匪抢劫，本部已在部署进剿中，望贵府加强防范为盼。”

阿旗政府接到上级已进军剿匪的通知后，无比欣慰，除电令驻防北部的旗保安队严加防范外，还及时将情况转告额济纳旗旗长塔旺扎布，并请额旗“派员严密监视哈萨克匪徒的实力及动向，随时电告前往剿匪的人民解放军。”此后不久，哈萨克匪徒很快就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铲除。

一九五〇年十月初，阿拉善旗保安队杨富存所率的第一中队，在巴音套海地区驻防时，发现在沙金套海、图克木、哈鲁乃一带有番号不明的股匪流窜，号称张麻子的匪徒约三百来人潜匿在哈鲁乃巴格境内不东毛道一带的山中进行骚扰，似向贺兰山流窜。

十月六日，我保安队杨富存率部进行阻击，张匪八十余人逃至绥远境外，被当地解放军全歼。在阻击中，旗保安队指战员奋勇击敌，无一损伤。为了激励士气，副旗长陈爱尔德尼巴图代表旗人民政府前去慰问。此时尚有股匪四十余人逃至阿贵庙一带山中流窜。

十月十三日宁夏军区通知阿旗政府说：“接陕北剿匪部队报，张德彦（张麻子），贾教其率匪百十余人，在太阳庙附近分区骑兵连围剿，击毙匪团长贾教其、高连长以下七十人。俘匪连长以下二十一人，余三十多人西逃阿旗境内。匪首张德彦化装后骑骆驼逃窜，希你旗组织足够兵力，迅速清剿，并注意捕获匪首张德

彦。”阿旗政府遵照上级指示，进行了严密布防，匪徒无处藏匿，遂窜他地。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底至一九五〇年九月底的这个阶段，由于德、李残部和哈萨克匪徒及张麻子匪徒大批窜入阿旗北部，大肆抢掠民财，杀害无辜，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使阿旗北部的牧民群众遭受了空前的洗劫。被匪徒们抢掠一贫如洗的群众，为了逃生，都搬到远处居住，使阿旗北部国境线一带几乎成了荒无人烟的土地。据事后统计，仅被匪徒抢去的牲畜达五千多只，为了逃避匪徒的蹂躏，被迫迁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寄居的群众有一百一十一户，五百三十五人之多，并带走骆驼二千八百七十峰，羊四千二百九十五只，蒙古包一百一十五顶。

由于经过匪徒的骚扰，阿旗北部国境线一带，直到一九五一年还是人烟极少，寄居邻国的大部分群众以后才逐渐归返故土，他们来时带的蒙古货币和国库券，因蒙方不予兑换而作废。

### 三 剿灭郭永胜匪徒

郭永胜乳名郭栓子，解放前即为贯匪，马鸿逵为了利用其反共反人民，委任郭栓子为“贺兰山警备司令”。宁夏解放时，经地下工委通过黄渠桥开明人士李冲和先生多次劝说，郭匪倒戈投诚，被改编为宁夏贺兰山保安队，驻黄渠桥。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郭栓子胁迫共同党叛变上山为匪，改称黑虎军，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无辜群众，偷袭人民解放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三月十日宁夏省潘自力主席电告阿旗政府：“郭永胜已叛变，希注意防范”。

一九五〇年四月初，郭匪一股百余人，活动在阿旗贺兰山境内，宁夏军区于四月五日决定清剿郭匪。为了防止郭匪逃窜，宁夏省政府和省军区通知在阿旗的曹又参副司令员，请其最好派遣部队占领南寺以南要道，必须在六日上午前到达该地。此后的几

个月，阿旗保安队积极配合宁夏军区，进行了艰巨的剿匪斗争。四月十四日，潘自力等五位首长给曹又参、达理札雅来电说：“郭永胜已大部份被瓦解，现他本人带二十余人在大鱼口以北，钻土梁一线，困难较多，请你尽一切力量争取他回来，人民政府仍可宽大处理。”曹副司令与达理札雅商议后，以达的名义，通知阿旗宗别立总管杨宝山（大呼藏吾），令他“趁此机会，尽一切力量去说服他（指郭栓子），把他争取过来，人民政府和军区对他还是宽大处理的。”

杨宝山接令后，于古历二月二十五日出发，深入贺兰山中，遍地寻觅，经十余日之久，未曾找见，当于古历三月十三日派妥二人，将劝降书转送郭永胜。杨宝山回旗后，又往宁夏军区汇报了匪情。七月一日，杨宝山回旗时，宁夏军区给曹又参、曹幼之的信，让他们继续派杨宝山尽力争取郭永胜归来。

杨宝山接令后，于七月七日从定远营出发到水磨沟一带打听郭匪的住处，当日与郭匪的部下接上了头，杨即说明来意，让其邀郭永胜于七月八日在阿旗与宁夏交界的大石沟梁见面。七月八日当杨到约定地点，只见到了自称张队长和刘参谋的两个匪徒说：

“郭司令现在不在此处，到原子布置队伍去了。”于是杨宝山对他们说：“宁夏省军区说，郭永胜此次出走，主要是受了地方个别干部不负责任的言语刺激，因而引起了误会，省方对郭的苦衷非常谅解，希望郭永胜回来，绝不追究既往；如果郭愿意回来，在宁夏住也好，在定远营住也好，省方绝对保障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杨宝山并要求张、刘二人转告郭永胜很快表明态度，并约定在香池交接回信。几天后郭匪派人将回信交给杨宝山住在水磨沟的勤务员，原文如下：

“协理仁兄勋鉴：杨总管奉命来部谈判本部与贵旗合作，受政府编制领导，日后省府潘等做他阴谋，该由贵官负全责任，上情讨列如下；潘等令协理谈接本部与旗合作，受旗领导，潘等倘

有他计，由兄负责，此条绝不接受；若有真意商谈，请贵旗王爷亲身前来谈判，负责盖章均可；在未谈判前，沿山解放军完全撤退百里外，给弟召集属部余裕之时间及整理之功夫。尚望仁兄再与潘等商讨，令王爷出席亲谈做保，未有做不到之处。此意期望速与潘等讨论函答，郭永胜，失借五月二十六日（指阴历）。”

经两次派人劝解郭匪归来，均未收效，此时达理札雅已赴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议和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议。曹又参决定暂停对郭匪的劝降工作，七月份内，郭匪趁隙在乌达至三关的贺兰山中流窜，到处抢粮劫财，用武力威胁手段，胁迫了一些沿山群众加入匪伙，经过一段时间的罪恶活动，于七月中旬传出了攻打定远营的谣言。

七月中旬宁夏省通知阿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前去银川市参加宁夏省第一次党代会。在开会中间，因定远营发生匪特谣传，人心不安，曹动之书记为安定阿旗人民情绪，布置防匪措施，急忙返回定远营。布置完工作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又返抵银川，听取省委传达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同时于七月二十八日给旗政府罗相臣、云祥生、陈宝峰三副旗长来电告知“三日后动身返定”。

七月二十八日，旗保安队杨宝福队长由哈拉乌探到郭永胜、谢占遼二匪纠集约几百匪徒，盘据在水磨沟、哈拉乌一带，阿旗工委得此消息后，向宁夏请示是否可派部队前往围剿，以安民心。后因驻旗兵力不足，再加匪情不明，而未轻举出击。为了防御郭匪的突击，通知旗保安总队和有战斗力的机关，加强戒备，注意防范，并从盐警队抽调四名战士协助国营贸易公司的防卫工作。七月三十日宁夏省党代会结束后，曹动之书记即与警卫员杨万山、张永祥二同志骑马由苏峪口小路返定远营。三十一日晨途经离定远营三十多里的樊家营子防卡时，曹书记还以保安总队政委身份，向该卡卡长孟巴特尔布置了防匪任务后，出发来定。孰

知孟巴特尔等人早已叛变投敌，变成了郭栓子的匪徒。在我曹书记由银川出发的当天，郭匪副司令谢占逵就派去八人与孟匪联系，让孟匪“派队伍堵口子”。三十一日晨谢匪又派去十六人堵拦小路山口，当曹书记离开防卡下山时，该卡即鸣枪两响，给郭匪报信。于是曹书记等三同志在一个山崖峡道处遭匪伏击，经力抵弹尽而光荣牺牲。为革命奋斗二十三年的动之同志，为阿拉善旗人民的事业将鲜血洒在了贺兰山上，两位年青的共产党员警卫员同志也在英勇抗匪中光荣牺牲。

七月三十一日，谢占逵带领六十多名匪徒和四十多支步枪及一挺机枪，趁夜深人静之机，窜入定远营市区，兵分三路，有十多人占据了后营盘山；谢匪带领主力占据南梁碉堡；第三路二十多人由河沟窜入南大街，先到电信局，约在十二点钟，掳走电信局长周明富及电台一部（未带天线），之后即围攻贸易公司和银行（同住一个四合院），因遭我干警奋力反击，十几名匪徒在房顶上占据到五点钟才撤离到南梁上。在夜间激战中，我金库主任李克金同志大腿负伤，盐警排长张俊才同志腹部重伤，由于他们团结一致，英勇反击，保住了国家的财产安全。三十一日凌晨约二时许，匪徒主力集中火力进攻我盐务局。当时住在城外的贸易公司、银行和盐务局等单位与外面失去了一切联系，也未得到其他武装力量的接济，在枪声中，工委副书记云祥生与郭全德、张信等同志三次到副旗长兼保安队总队长罗巴图孟柯家里，要求打开城门出城接援盐务局等单位，罗巴图孟柯怀疑旗保安队内有不稳定分子，深怕城门一打开，会发生意外的混乱，后经查实，保安队中确是有十多个通匪分子，他们准备里应外合，开城夺抢，号班的杨志一竟然躲藏在朱子春副政委的床底下，企图等郭匪来后杀害朱副政委，当被发现质问时，他还声称是为了保护朱政委的安全。直到晨八时许，罗才同意工委的同志打开城门出城援战，经与匪激烈抗击，匪未得逞，到十一时，匪渐东移，缓慢撤至五、六里



处窥测，黄昏时才退进贺兰山边藏匿无迹。

三十一日晨，旗政府向宁夏省政府和军区电告匪情，并要求派两个连的兵力快速前来剿歼。下午四时收到宁夏党政军首长给罗、云、陈三副旗长来电说：“镇静的、勇敢的抵战。”下午五时，宁夏军区派出一九五师的一个营乘汽车由银川出发来旗剿匪，因道路难行，于次日晨八时到旗，并给阿旗保安队带来步枪弹一万发。八月一日宁夏首长继续来电询问曹动之的下落，于是工委带领四十多名同志前往樊家营子寻找，途经孟巴特尔时，捕获被我击伤的土匪和叛变的卡兵各一名，又行至距防卡约十里之处，发现曹书记等三同志的遗体及抗匪战场。大家在万分悲痛中从草滩上找到曹书记携带的“习仲勋同志关于传达三中全会的报告”、“宁夏省第一次党代会议决议”、“朱敏同志在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告”，党内通讯第十五期及笔记本和工委组织部的公章等物。

此次御敌，我贸易公司、盐务局干警与土匪进行了十多个小时对击，在阿旗工委干部的英勇配合下，毙匪二人，伤匪数人，俘匪一人。我金库主任李克金、盐警唐连明、王德民负伤，唐因伤重，半月后牺牲，匪徒掳走周明富及抢去电台，企图与潜伏的反革命组织“西北救国军”联系，因周明富局长故意未带天线，使土匪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周也乘隙逃出了虎口。事后才查清该局副局长尤剑秋也是通匪分子。八月七日，宁夏首长来表扬和慰问了在抗匪战斗中英勇抵抗的指战员。

八月七日，达理札雅由西安开完会后回到阿旗，对阿旗发生的诸多不幸惨事深表激愤，召开了旗政府委员会议，对郭匪袭击定远营事件，总结了四条教训：“一、必须加强团结，粉碎匪特挑拨我政府负责人之团结和民族团结的阴谋；二、必须时刻警惕匪特活动，思想上万万麻痹不得；三、必须加强军民团结，宣传动员人民群众，清除顾虑，大胆向政府报告匪特情况；四、必须

尽速彻底剿匪肃特。”

八月十二日，定远营两千多名群众，怀着对土匪、特务异常愤恨，对革命烈士万分哀痛的心情，在西花园集会追悼曹动之、杨万山、张永祥三同志。在追悼会上，省军区曹又参副司令员对烈士致以深切哀悼，并号召各民族各界人民，提高警惕，紧密团结起来，坚决剿匪。达理札雅主席讲话说：曹动之同志的死是中国人民和阿旗的损失，工委云祥生副书记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剿匪肃特，为死难烈士复仇。八月二十三日，达理札雅将阿旗的情况分别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习仲勋、汪锋等首长做了汇报。西北军政委员会接到阿旗关于剿匪情况的汇报后，彭德怀主席于九月十六日给达理札雅亲笔写了回信，内容如下：

锐荪主席：

两次来信，都收到了。您将西安会议精神向干部传达，使他们了解政策，稳步进行工作，对于增强团结、安定社会秩序，是有很大帮助的，望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额旗偏僻贫困，亟宜协助发展，塔主席如能来西安面商，尤所欢迎！阿旗剿匪任务，已由省军担任，是否再拨子弹，请考虑见复为荷。

此致

敬礼

彭德怀（印）

九月十六日

为了保卫阿旗政府所在地的安全，旗政府派出一个保安分队

西北军政委员会  
 锐荪主席：  
 两次来信都收到了。您将西安会议精神向干部传达，使他们了解政策，稳步进行工作，对于增强团结、安定社会秩序，是有很大帮助的，望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额旗偏僻贫困，亟宜协助发展，塔主席如能来西安面商，尤所欢迎！阿旗剿匪任务，已由省军担任，是否再拨子弹，请考虑见复为荷。  
 此致  
 敬礼  
 彭德怀（印）  
 九月十六日

此信是彭德怀主席给达理札雅主席的回信，原信在阿旗政府档案中，现由阿旗政府提供。

驻防在哈拉乌沟口，又从磴口调回一个分队，增强定远营的防卫力量，同时下令南部六个巴格和三大寺庙换班士兵于八月二十五日前集中，带上自己的武器来定远营上班，配合解放军剿匪。根据宁夏省首长指示，阿旗派出剿匪部队，统归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师赵师长指挥，一切被俘、投降之匪，亦统由该师管训。

八月十九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五八三团由赵永胜团长率领，进军阿旗水磨沟一带，拂晓时与郭匪激战约二小时，我战士不顾行军的疲劳向敌人发起猛攻，占领了东山制高点，击溃了敌人，并俘匪三人，缴步枪二支，子弹四十发，二匪首谢占遼的左腿被我重伤。我战士受伤七人，牺牲一人。为了鼓励解放军英勇剿匪，旗工委和政府定在定远营发起慰问解放军的活动。

自水磨沟一战，匪徒化为小股向北流窜香池子、塔尔岭及宗别立一线，九月十日，宁夏军区党委决定，从一九三师、一九四师、一九五师共抽调八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连的兵力，全面进山剿郭匪。不久，五八四团团团长史秉廉、政治处主任刘长治率领两个营，在阿旗木仁高勒黄土梁一带搜剿时，亲自审问被阿旗保安队抓获的一名匪徒，从中得到了一些郭匪的线索，经顺藤摸瓜，于十月十六日拂晓深入深山老林大峰口，经激战数小时，一举揣了土匪窝，活捉主要匪徒郭拴子等三十多名，同时俘获了马鸿逵的一六八师参谋处长、美蒋特务梁明（梁文祖），挖回了土匪埋藏的一个电台，一挺轻机枪和十四支步枪，并从平罗县乔家寨子搜出蒋介石给郭拴子的“宁夏军区司令员”委任状。树倒猢猻散，杨嘎瓦等十九名入匪者向平罗县五区政府自首。谢占遼于十月十四日带七名匪徒向解放军投降。我剿匪部队在阿旗保安队及民兵的积极配合下，与散匪周旋苦战两个多月。杀害曹动之书记的罪魁孟巴特尔于十月十二日被旗保安队捕获。叛徒陶图巴衣尔（陶卡长）也被保安队中队长马木撒捕获。至十月底，漏网的散匪已基本捕获归案，对捕获的匪徒由宁夏省法院进行了审讯处理，匪首

郭栓子等在宁夏被我人民政府镇压，谢占逵、孟巴特尔以及旗保安队内的叛徒等共九人，经省法院判决，分两次押送到阿旗定远营执行了枪决。

为了悼念曹动之、杨万山、张永祥三同志，宁夏省党政军民五百多人，于十一月十四日在西马营人民会场举行了追悼大会，并与动之同志的遗体告别。十一月十五日，动之同志的灵柩由省府李景林、孙殿才副主席，中共宁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增润及各机关、学校团体的执挽代表百余人，从西马营送灵至南门外，停立良久，目送灵车远去后始返回。

阿拉善旗人民的对敌斗争，如此艰苦持续，最后取得了胜利，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得以加强，新生人民政府更加巩固。

---

## 百 灵 庙

百灵庙，今内蒙古达茂旗旗府所在地。有人说，因当地盛产百灵鸟而得此名，是为误。

百灵庙，蒙古人谓贝勒庙，于一七〇三（康熙四十二）年建。事后有人写成“白林庙”。因归绥地区方音“贝勒”与“白林”音相近，所以德王自治时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始），有关国内外报刊也写作“白林庙”。当时参加自治运动的蒙古贤达们多谓此“白林”蒙语中意义不甚吉祥，提议德王更改。有些人提出成语“百灵相助”的“百灵”两字，意义吉祥如意，用此二字为好。德王同意，并把此成语改句为“百灵相助，民族兴旺”，取其“百灵”二字，而把“百灵”的“灵”字，解释为“人杰地灵”。从此“百灵庙”三字中外定型，百灵庙地名由此而得。

---

注：本辑利用的图片为朝格图同志搜集提供。

---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阿拉善盟文史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1 6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